

疯狂岁月

——「文革」
酷刑实录

● 刘兴华 华章著

酷刑



这是一本公开发行的书籍，我不知当某些“革命家”，“领导人”看到书中的某些内容会作何感想？他们或许已经麻木，文革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这十年在我看来它将中华文化五千年所沉淀的历史文化中最丑陋，最肮脏，最无耻最荒诞的一面一展无遗，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却没有真诚的悔过之意，只希望通过区区一本《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将历史定格，将罪孽遗忘，这是一种怎样的做贼心虚的心态！苦难的大众啊千千万万的你们被历史所蹂躏被强权所屠戮，被无知所遗忘，你们的冤魂飘荡在历史的天空，却无人祭奠；你们屈辱游走在春秋的田野，却无人反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纵容罪恶，现实中我们不能为你们光面正大的缅怀，就让那些心存良知的人们，在心中，为你们建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证明罪恶还在继续，但公道自在人心！

(京)新登字 138 号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刘兴华 华幸著

出版者：朝华出版社

北京车公庄 35 号

邮政编码：100044

邯郸地区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10.25 印张 字数 22.8 千字 印数：50000 册

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54—0378—8/K·0010

定价：6.98 元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卷首语 1

第一章“文革”将地狱之火燃遍中国 6

●有关一支“大军”的一组镜头
●“文革”冤魂知多少
●炼狱中的特写镜头
●“红色恐怖万岁”
●“文革”大杰作——冤狱
●酷刑——一台造假的机器
○滴血的手指头
○情报员名单
○信号枪信号弹
○袖章的妙用
○一声口哨一条命
○收破烂的“国民党特务”
○剃光头也有罪
○刘少奇拍着膀子对我说……
○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马上选举出来的“国民党县党部”
○冤声呜呜的 63 号“牛”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棚”○炼狱中的魔影○现代“赛娥冤”

第二章酷刑——魔鬼的盛宴

75

●“大屁股女人”就是地主婆
●一根绳子吊死一对夫妻
●上床还是上梁
●“还俺的鸡巴……”
●她每天吃一顿抹着人尿的窝头
●摧残女犯的酷刑——推磨
●“淫刑”在“红色恐怖”下执行
●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凳
○地狱里的刀光
○卫生纸之祸
○一口没人敢用的棺材
○来自婚床上的“过电”
○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
○从儿童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游戏到“瞎马闯阵”○“文革”将
“跪刑”无限地“发扬光大”○下
辈子也“难以忘怀”的“站刑”和
“坐刑”○血水飞溅的“学习班”
○“文革”医院——冤魂的“屠
宰场”○一幕“假验尸”的丑剧
○喉管在临刑前割断○杀红了
眼的“革命”恶魔○中国的传统
“国粹”——“游街示众”○“文
革”的专利——“阴阳头和喷气
式”○施加在心灵上的酷刑○
母子命运天壤之别○“国民党”
健身操

第三章 血淋淋的“忠心”

173

●母亲将儿子送上黄泉路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他亲手挖出自己的心●她怀揣着一颗赤胆忠心●“炼狱”中的铮铮铁骨○以死喊冤的一家七口○他在遗诗中向“老人家”献上一瓣心香○砍头只当风吹帽○地为真理而活着○被死神拒收的“昔日宠臣”●共和国主席饱尝臣民的“老拳”●昔日横刀立马今日含冤九泉○从陶铸工人到工贼○翻译家的悲剧○“人民艺术家”老舍惨死

第四章“文革”冤狱之最

——文字狱 237

○“李玉和招了”○“红宝书”与旧黄历○“写错地方”的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少年反革命○错看一个字被打
入地狱●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
者○一句话招来天大横祸○污
蔑“指路灯”罪○祸从口出○新
“半夜鸡叫”说○语录对错招来
祸○改名也有祸与福○“比个
葫芦画个瓢”○张木匠的花开
花落●“三家村”冤狱●“山药
蛋派”鼻祖留遗恨○尸骨难存
魂荡何处○名门之后坠楼身亡
○他突然失踪被秘密绑架●骇
人听闻的千古奇案○野火烧不
尽的小草

目录

《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第五章 “文革”酷吏脸谱	287
--------------	-----

●他光着腩躺在被窝里
“升堂”提审○旦夕难测的“打
手”●他要突破四十个女人的
“大关”○他的身后紧追着愤怒
的冤魂●从“河东”到“河西”

结束语	319
-----	-----

附录	320
----	-----

卷首语

上帝耶和华在一天清晨醒来，突然孩童般地兴致盎然。他用水和泥，七捏八捏地故捣出个“怪物”，取名叫亚当；又从亚当的胸腔里抽了一根肋巴条，给他造了个叫夏娃的老婆。从此，亚当和夏娃便成了人类的祖先，繁衍了人类。

·这是《圣经》里的一种说法。

后来，一位生物学家的《物种起源》有力地驳斥了上帝耶和华的梦呓，一个伟大而英明的论断被全世界所公认：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

·谁能否认猿不是一种野兽呢？

难怪一位西方哲人常用苍老的声音反复唠叨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中国的一位圣人曾告诉学生：“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的另一个圣人却断言：“人之初，性本恶……”。按照他的说法，天生的好人是没有的。所谓的好人坏人，只不过是人的另一半人性与另一半兽性相斗的结果。人性胜利了，就是好人。兽性占了上风了，就是坏人。

充满兽性的人在肚腹空空的时候，必定会利用血淋淋的口舌去舔咬他的同胞。

从“文革”炼狱中走出的中国人，有谁没有亲眼目睹那一张张野兽的血盆大口呢？

公元1966年，正当中国人民高歌猛进、意气奋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了。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一批批干部群众被揪斗，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成批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千千万万人受到摧残。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文明的伟大祖国冤魂萦绕、冤狱遍地，浸透了人民的血和泪。

这就是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

十年啊，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华大地上，疯狂肆虐了整整十年！

劫后余生的巴金先生愤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作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

这种看法非常具有普遍性，它反映了人们从心底对“文革”种种暴行的义愤和阻止类似悲剧在中国大地重演的善良愿望。确实，“文革”的种种野蛮行径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这种

“善性”的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仅仅从“人性善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显然是不够的，它容易使我们把一种抽象的概念加于复杂的事物之上，反而削弱了认识事物的深度。

人性向着兽性转化的个别例子，局部性的反社会暴力行为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任何时候都是可能存在的，但象“文革”中这样普遍的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则只有在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才可能发生。

这并不是说，党和毛泽东选择了暴力作为“文革”的方式之一，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多次表达了自己不赞成打人、戴高帽子和武斗。例如，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在批斗过程中打人、罚跪、揪头发、污辱妇女等非法行为的事件。对此，中央于6月20日批发了北大文革简报，肯定了北大工作组制止这些行为的作法。但是，陈伯达、江青等人利用这一事件大作文章，将乱打乱斗行为当成革命行动要予以平反。江青却在一次会上当众拥抱殴打工作组的女红卫兵。而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更是网开一面，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人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然而，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与制造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而当时的宣传机器无视这些血腥的事实，反而大声称赞说：革命群众的行动好得很！

“文革”中发生了无数起野蛮的残害无辜、草菅人命的行

径,但在当时真正受到惩处的凶手却很少,这不仅是由于法制受到破坏,同时也因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上海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曾这样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的成长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是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读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着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的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成为被驱使的工具。”

这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疯狂的岁月,深化了一个民族“喜欢窝里斗”的劣根性,重铸了一个民族“长于盲从”的不幸性格。

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

不堪回首,又必须回首。

古有酷刑:墨、劓、宫、大辟、笞杖、徒、流、赎、斩、绞、腰斩、枭首、弃市、车裂、磔、焚、凌迟;更有法外酷刑:活埋、活烹、抽筋、剥皮、炮烙、杖毙、坠涯、沉江……然而,其花样翻新和对人身心的摧残,与“文革”十年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在没有一缕星光的“文革”夜色中,人性预支给了魔鬼,人格被野兽吞进了肚腹。坚贞即是背叛,谎言意味着忠诚。鲜血染红了黄河,泪水填凸了长江。共和国的上空飘荡着成千上万屈死的冤魂!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写有这样一段文字：“二十世纪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

巴金先生也庄严地向世人呼吁着：“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为的是让这桩“文革”惨剧不被世人在不知不觉中淡然忘却。因为“文革”的幽灵——“左祸”，仍然没有在共和国的土壤上被完全铲除。

不去自警，中国人就不会自醒！自强！

不去反思，中华民族就会与新世纪的太阳失去拥抱！

笔者通过数年的实地采访和印证，收集了大量“文革”时期鲜为人知的酷刑内幕，录入成文。

愿充作一把锋芒四射的匕首，刺破“文革”十年黑暗的夜幕！

愿化为一片六月的雪花，掩盖“文革”冤魂怒睁的眼睛！

第一章

“文革”将地狱之火燃遍中国

●有关一支“大军”的一组镜头●“文革”冤魂知多少●炼狱中的特写镜头●“红色恐怖万岁”●“文革”大杰作——冤狱●酷刑——一台造假的机器
○滴血的手指头○情报员名单
○信号枪信号弹○袖章的妙用
○一声口哨一条命○收破烂的“国民党特务”○“为人民服务”也救不了他○剃光头也有罪○刘少奇拍着膀子对我说……○蒋介石囚犯大陆是我指挥的○马上选举出来的“国民党县党部”○冤声呜呜的 63 号“牛棚”
○炼狱中的魔影○现代“赛娥冤”

不知地狱中是否有国界之分？

假如地狱里有一方标在中国名下的空间，那里一定会水泄不通地挤满了屈死的冤魂！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盛产“厨师”的国度，它的“吃文化”早就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称雄称霸。都说“满汉全席”是中国“厨师”的金字招牌，却不知“人肉大餐”才是他们的压轴好戏！

一九六六——一九七七，中国人引来了地狱之火，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摆上了丰盛无比的“人肉大餐”！

●有关一支“大军”的一组镜头

镜头之一：

这是座不大的县城，只有一条大街。此刻，不逢集不过庙会，却突然拥挤着成百上千衣衫不整、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却闪烁着哀怨和仇恨光亮的百姓。县革委会大院立刻被这些布衣百姓塞满了，显得拥挤而狭小，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交汇成一曲震撼灵魂的悲鸣。

招待所的通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缺指的男人；

会议桌上，横躺着酷刑致残的老者；

四方通往县城的黄土小道上，一辆辆“吱吱呀呀”的独轮车不断向县城涌来，车上坐着的，不是手拿状纸的老妇，就是手抹眼泪的孩子；

主持县革委会大院工作的头头脑脑，信息特别灵通。在这

群布衫百姓涌堵住大院门口前，早已退避三舍，寻无踪影。几位经过一而再，再而三，认真筛选出来的态度和蔼、能应付各种事态的男女干部，便成了这群布衣百姓的中心。他们用血和泪向这些“留守大使”们吐诉苦情和仇恨，有的竟泣不成声。女人来寻丈夫，老妇来找儿子，孩子来要爸爸……他们的丈夫、儿子、爸爸已早带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太残、太冤、太匆忙，没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竟尸骨埋葬何处也不知道。他们直呼其名，要寻×××算账。要平反、要昭雪、要讨还血债！

接待干部一个个训练有素，尽管内心不无同情怜悯，但出言却十分得体：

“都先回去吧！要相信组织，会按政策妥善处理的！”

这话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听者早听腻了。

“啥时处理，说个准话！”

“这，还得研究研究嘛！”

饱孕着深仇大恨的人，似乎都有些神经质。虽然他们不懂得“制造舆论”的重要性，但却本能地见人就说。看见一个穿四个兜制服的人，便当成干部，立刻会围上一群人。他们无休止地申诉、谩骂、哭泣，不管你能否解决问题。

跑累了。

站乏了。

说困了。

该歇息，吃饭了……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年月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布衣百

姓算是又一次免费吃食堂了，而且无人敢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无滋无味，似乎吃下的是苦涩的泪水。

毕竟惜多粥少。

夜幕低垂，寒气袭人。

奔波怒吼了一天的汉子也觉得累乏了。他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树下寻觅搭地铺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来枯草树枝。

霎时间，“大院”大门两侧，炊烟缭绕，一片云雾。叫声、骂声、哭声不绝于耳。墙角角、屋檐下、排子车底盘下、刚搭的草棚里……都挤满了愤怒呼号的冤民，那醒目惊人的诉状，就挂在窝棚口上，权作这临时住家遮风挡寒的门帘！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一群诉冤的人流，同样搭着遮风避雨的窝棚。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用红笔勾勒出的醒目标题仿佛在滴血：《×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刑法之全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皮肉刑、绳鞭刑、棍棒刑、头刑、耳刑、眼刑、口舌刑、脖刑、骨刑、四肢刑、火刑、水刑、冻刑、晒刑、闷刑、坐刑、压刑、滚刑、轧刑、跑刑、夹刑、跪刑、吊刑、针钉刑、电刑、刀刑、尿管刑、男女低级刑……琳琅满目，看上一眼便令人毛骨悚然，想到巴士底狱、纳粹集中营、日寇七一三秘密工厂、歌乐山下的渣滓洞……一位老者跪伏大门边，叩首呼喊，令每个进门者心颤：“冤枉啊！冤枉！……”

镜头之二：

坎坷不平的黄土大道上，一位头箍脏儿巴几乎巾的壮年汉子，心急火燎地骑着辆破旧自行车，在匆匆赶路。他是远近闻名的村支部书记，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一直是带头人、领头雁。追溯到上一辈，他叔父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地下党的村支部书记呢！无论多难做的工作，他都没皱过眉头。然而今天的任务对他却是完全陌生的，他知道这任务的艰难，更明白这任务的紧迫。凭着强烈的责任心、正义感，他把这并非组织委派而是群众举荐他干的差事，舍着老脸揽了下来。他走村串户，去筹集钱和粮票，为那支持发的伸冤告状的队伍解决盘缠和口粮。有人不解地望着他，他就晓以大义：“唉，出门上告难哩！谁出门能背着锅？坐车得买票，住店得掏店钱，咱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可不兴要二百五呀！有钱凑钱，有粮票帮几斤粮票，咱自己的事还得自己办啊！”走出一户户破草烂屋的农舍，走过一个个村庄，他攥着那散发着汗腥味的皱巴巴的钱和粮票，心在颤抖，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是荣耀？还是耻辱？上告，去告谁呀！”

镜头之三

一列客车，带着早春抖峭寒风，呼啸着、飞驰着。车厢里，拥挤着满满当当衣着不整、面色惶惶、已极度疲倦劳累的人们。有人睡去了，打着沉闷的鼾声；有人呆痴地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电线杆，还沉浸在悲痛的苦海里；有的用颤巍巍的手，打开那已经卷皱破裂的诉状，神情恍惚地凝视着。他大

字不识一个，诉状是请人代写的，他那压抑多年的积愤，此刻似乎全握在手上，全印在那浸透汗渍已经变黄的纸上。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

他们离家几百里，几经周折，体力已经耗尽，现在正利用这奔波的间隙，思索要说的话该怎么启口。也在利用这列车飞驰的当儿，重新积聚力量，如同临战前的小憩一样，一声令下，便将爆发一场恶战。

突然，有人惊恐地叫道：

“不对呀，这车不是朝北开的呀！”

车厢立刻炸了窝，睡意惺忪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也被人拥起。车窗的玻璃上，立刻贴满了一张张枯黄的脸。

平生头次出远门的庄稼人终于醒过神来，辨认出了方向，意识到上了当了。天知道火车啥时候调着往回开呀！经受不住这种无情奚落的汉子冲到车厢门口，用拳头砸着那已经锁死的门，疯狂地喊道：

“停下！停下！我们不回去！”

可是，这喊声比起火车的呼啸轰鸣，实在是太微弱了。

“妈的×，谁搞的鬼？我操他八辈！”

“拉哪儿咱都别下车，死就死在这车上！”

“骗子！骗子！……”

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车厢门开了，上来的是他们熟悉的面孔。似乎在嘲笑这群土头土脸的庄稼人。他们想说：“咋样？不让你们去你们非要去，这不，又回来啦！进京告状那么容易吗？”但他们却把这些激怒人、刺伤人的话咽回肚里去了，换成另一副面孔，仍旧是

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先回家吧，问题慢慢会得到处理的。处理也得有个过程啊！……”

他们本来发誓死也不下车，但那狭小的天地实在太憋闷了。于是不得不下车来，伸伸酸疼的腰腿，换口新鲜的空气。而那一拨又一拨的劝说者真有股耐劲儿，任你死缠活缠也不再让你登车。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镜头之四：

这是个中等县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之便。这天，令人震惊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几十名徒手群众，静坐在铁道上，迫使一列客车不得不停下来。条件很简单：“把我们上告代表捎到北京……”

镜头之五：

一位头发灰白的妇女，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祭黑发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悲痛的呢！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很近，她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城一圈，喊冤申诉，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再拉着排子车出来……她记不清几天了，孩子的尸首已经腐烂变质，那又腥又臭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人作呕反胃，令人目不忍睹！人死不能复活，入土为安。但她孩子的灵魂却不能安生，每天要经受颠簸和暴晒，他不想早日安卧黄土地，

早日步入那冥冥中安宁的天国去吗？

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良知告诉她，仇有主，冤有头，孩子不会白死的！

这奇异的大军啊！

是伸冤告状的队伍！

善良的中国人有句俗话：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这朴素无华的语言道出了告状的艰难。不是不想告状，而是告状太难了！难于上青天！有冤而不告状，把冤吞进肚里，化做泪水暗暗流淌，这该是多么善良的心灵啊！

然而，现在要摆开阵势告状，拉起队伍告状，成群结队告状，捐钱捐粮告状，拦截火车告状，拉着尸体告状……不是千古奇冤，谁会去受这份煎熬？

●“文革”冤魂知多少？

谁能准确地告诉世人“文革”冤魂有多少？

在“文革”的炼狱之中，从堂堂的共和国主席，到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从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到万人瞩目的电影明星，都不能幸免生还。中国以亿万为单位的布衣姓们的草芥之命，又能有多少逃逸在蓝天白云之下呢？

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文革”冤魂有多少！

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的《党史通讯》中载有这样的文字：“据

不完全统计,‘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一万零四百零二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两万三千九百二十一人,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这是冤假错案中后果最严重的一部分。在这些被专政机关以“反革命罪”正式处决的人中间,有张志新、遇罗克等一批民族的优秀儿女,但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的社会环境下,那些被种种千奇百怪非法手段,残酷迫害致死的冤魂又何止成千上万!

让我们再读几行有关的数字:

A、1966年8月27日,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到9月1日,仅仅三天,这个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为325人,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出生只有38天。

B、1968年2月初,康生在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诬陷20年代被批准过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至今还在地下活动。他下令:“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这样,“内人党”案就成立了。自治区革委会立刻行动,电台广播,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天之内(后延期至10天)到各级“革委会”登记,否则,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许多不明真相的原内人党党员真的登记了。事情还不完,在康生的指使下,许多基层党组织被说成是“内人党”支部。第二年2月4日,康生又发奇想,说道:“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要把它搞掉。”结果,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内蒙古全区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经统计,涉“内人党案”受诬

陷者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C、1967年12月26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唐山的一次讲话中，大放厥词：“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突然袭击，点名诬陷杨远（唐山市委第一书记）、白芸（原唐山市市长）、张达、吴良俊、方飞等，说他们是“叛徒党”的核心。很快，“杨白反党集团”立案，一边上追根子，涉及“冀东党问题”；一边下挖社会基础，在全省展开“肃反动流派运动”。还组织了280人参加的“冀东专案组”，历时两年，内查外调，涉及中央29个部、29个省市的干部，共1604名，其中737人被评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殃及普通群众，受到迫害的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死亡，七百六十三人致残。

D、1967年初，康生旧事重提，把在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张治中协助而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狱中获释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一百多名党的干部，诬为“投敌叛变”，是一个“叛徒集团”。对其中健在的50人立案审查，投入牢狱，其中20多人被迫害致死。

E、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样，当初由中央决定被拘押的安子文、薄一波等61人办理出狱手续以求被释、参加革命工作的旧事，被完全推翻，转眼

之间变成一个“叛徒集团案”。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认定：当时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康生就此一箭三雕：既涉及到刘少奇的罪行，也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又动员起群众展开更广泛的“揭发叛徒”运动。这成为中共党史上最重大的冤案之一，并进而涉及到建国前所有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和党员，衍生出31件“叛徒集团案”，涉及到数十万人，大批干部涉嫌被投入监狱。

F、1969年5月，林彪针对叶剑英等同志对其所采取的抗争，横生毒心，他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10月12日，黄永胜（时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闻讯而动，大笔一挥：追查华南地下党问题。”不久，成立“一〇九专案组”（即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由江青直接操纵，后来，黄永胜直接出任组长，加快迫害、诬陷的步伐。他们乱捕党的干部，搞刑讯逼供、诱供，迫使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又要挖后台，揪黑手。因此案受到迫害者，前后达7200多人，其中85人被迫害致死，包括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以及彭湃烈士的许多亲属。

G、1967年，张春桥、王洪文出于全面夺取上海控制权的需要，对一大批市领导干部施展阴谋，欲置死地。他们在许多公开场合讲：“上海地下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并为审查“上海地下党”，专门设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845个卫星专案组。对凡是建国以前在上海工作过的党员干

部逐个审查,被审查对象高达 3600 多人。他们以各种罪名,实施迫害,如把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诬为“红皮白心”特务;把撤往解放区的党员,诬为“受敌人派遣”,把曾经被捕过的党员,诬为“叛徒”;把没有被捕过的党员,诬为“被敌人秘密策反”。结果“文革”前在上海市、县、局以上领导岗位上的 99 名原上海地下党员全部被打倒,其中 65 名被拘留、隔离审查,4 名被迫害致死。

H、“文革”正式爆发以后,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在狂热串联的 1966 年 11 月,进入北京的部队院校师生达 10 万,冲击国防部的事件频频发生。到 1967 年 1 月 10 日,王力等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矛头直指军队高级将领,之后在 2 月“怀仁堂碰头会”上,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党政干部对“文革”的混乱提出严重质疑,就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涉及到四位元帅,三名副总理。同时,地方上军队领导也受到冲击,军权的夺取早在 1966 年底就被提出来了,先是“砸烂总政阎王殿”,致使 95% 以上的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干部被撵出去。极“左”倾向还在发展,到 1967 年 3 月,军队高级将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突然的莫须有罪名批臭。在康生列出的诬陷名单上有元帅 8 名、大将 7 名,上将 18 名。军队中也出现大批冤案,有 8 万多人遭到迫害,1169 人被迫害致死。

I、1967 年 2 月,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强占了《青海日报》社,并制造了打人事件,据说数人被打死。2 月 14 日,省军区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和“八·一八”总部。2 月 23 日,省军区调 13 个连与“捍卫队”、“火车头”等组织一起对被包围的

报社采取行动。宣布取缔“八·一八”，令其退出报社。随后，发生武装冲突，双方都开枪射击，动用了步枪、机关枪。部队战士伤亡 30 余人，对方被打死打伤 300 余人。随后，“八·一八”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受到围剿，被抓起的成员近万人。得势一方的群众组织用同样残酷的手段回敬对方，老虎凳、活人打夯、烤干鱼（揪住头发烤脸）、手指穿针、过电等多种刑法全上，又打伤打残一大批人。

J、根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湖南道县，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涉及 10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被迫自杀 326 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 10 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

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被迫自杀 1397 人，另外，致残致伤 2146 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 3576 人，占 39.33%；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占 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 人，占 11.54%；其他成份者 411 人，占 24.20%。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 78 岁，最小的仅 10 天！

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一万四千余人！

杀人手段有 10 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杆、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镰刀、菜刀、稿棵等;

(3)沉水,含沉塘、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投岩洞,一般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埋在度客里,又称“下窖”;

(7)棍棒打,含锄头、月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应用于未成年孩子。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何朝何代同时制造过如此众多的冤魂?

一个人成为“上帝”,千万人坠入深渊。

本来就十分神奇的东方大陆,又一次被涂上了阴森骇人的色彩。

天大?冤大?

答案是冤比天大?

●炼狱中的特写镜头

镜头之一:

一位女青年被诬陷为“内人党”,在严刑拷打之下,宁死也不承认扣在头上的罪名。她太顽固、太倔强,激怒了专案人员。

几个暴徒扑过去，将女青年按倒在地，脱光衣服，一件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了：他们将一根木头楔子钉进女青年的子宫里。

这位女青年被活活折磨摧残而死。

镜头之二：

一位男青年被怀疑为“内人党”。

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他怎么也不招供。

专案人员使出了绝招：

几个暴徒把他按倒在地，用锋利的刀子将他的生殖器割下来。只听一声惨叫，这位男青年满身是血，昏死了过去……

镜头之三：

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被定为“内人党”嫌疑犯。他的前胸、后背被皮鞭抽打出惨不忍睹的斑驳花纹，而在这些皮开肉绽的伤口上，专案人员又突然放上一块通红的火炭，“嗤”地一声，一股刺鼻的糊味儿，夹杂着血腥气，随着一股黑烟骤然升起。

这位小伙子，紧闭双目，剑眉拧成了疙瘩，牙齿嵌进了嘴唇，一阵难忍的撕心裂肺的巨痛，使他乱发蓬松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

“泼水！”

一个暴徒提来一桶凉水，当头浇下，小伙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快交代!”暴徒大声吼叫。

小伙子无力地摇摇头。

两个暴徒在小伙子两只手腕之间的绳索上，穿上一根木杠子，将木杠的两头高高抬起来，小伙子便被悬在闪着火苗的火堆上。火舌咬嚼着他的皮肉、筋骨和心灵。

中世纪的火刑又复活了。

小伙子的灵魂在熊熊烈火中飞出了他的躯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小伙子终于被活活地烧死了。

●“红色恐怖万岁”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盛赞红卫兵的“伟大功勋”，称“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场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在“官方”的暗示怂恿下，以暴力为特征的大潮顿时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

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在私设的审讯室中，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雪白的墙上书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句标语，为后来“文革”出现的各种野蛮暴力行为提供了注脚。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中曾描述说：“到66年红

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一个民族发展到了死比活着还美丽，死比活着还有吸引力。

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期间的各种暴力行为都被上了“革命”的外衣。

革命领袖号召革命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对于许多头脑简单而又陷入狂热之中的革命群众来说，“打倒”乃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式的“打倒”。

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酷刑——魔鬼之手，阴惨恐怖地伸向了被“打倒”对象！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各种名目的“群专指挥部”、“民兵小分队”、“封闭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取代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的招牌。专案组、“牛棚”、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充斥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据内部统计，在“文革”中仅公安部机关，就有225名干部、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47人被捕入狱。部长级干部，除谢富治与另一名兼职副部长以外，全数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干警，遭受打击迫害者达 34400 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者 1100 多人，打伤致残者 3600 多人！

地方情况仅以陕西省为例，1968 年 4 月起仅几个月，全省先后有 281 个公安机关、111 个检察院、61 个法院和法庭被砸，被抢走档案 141250 卷，枪支 5800 多支，子弹 50000 多发，有 11 个法院财产被抢一空。

1967 年 1 月 13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了《公安六条》公告，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其中家喻户晓最著名的规定是：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及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原空军某军付军长赵登程，在“文革”中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负责人。在他负责国防科委工作时，在下属 9 院 211 厂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 9 个，反革命组织 78 个，并成立了相应的专案组。在制造假案过程中，私设监狱 40 余处，自制手铐 200 余副，先后关押 2000 多人，连同受牵连的人在内，共有 4000 多人受到迫害。他们大搞逼供信，谁打人越狠，就说明谁“无产阶级感情越深厚”，相反，则是“右倾”，“对敌人恨不起来”。酷刑之下，59 人丧命，致伤致残达 200 多人。

原沈阳医学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残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假案，私设公堂，打死和迫害致死 19 人，逼疯多人。令

人发指的是，他们把有的人逼死后，竟惨无人道地将死者肢解作“标本”。

这就是革命吗？

这就是社会进步吗？

嘶嘶不止的“文革”冤魂亡灵，用他们含血夹泪的声声怒鸣，控诉着披着“革命”外衣的“红色恐怖”。

●“文革”大杰作——“冤狱”

从无中生有之中，能折腾出一桩天大的“冤狱”，是挂着“文革”商标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的版图上，M县不过是块弹丸之地。这是个只有十三、四万人口的小县，在“清理阶级队伍”冲击波的强辐射之下，被威逼致死者三百七十九人，伤残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后遗症死亡一百九十人。

清理阶级队伍，如同一场龙卷风，它涤荡一切，它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将“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扫、大揪斗，以达到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目的。

这场令人震惊的“清查国民党”运动，给M县带来许多令人震惊的东西。“文革”中，在M县革委会安排群众生活情况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惊人的数字：“……拆房、卖门的有一千五百零六户，拆房一千二百二十五间，卖门六百七

十合，先后外出讨饭的八百五十一户，一千八百二十八人，其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六十二。”“文化大革命”意在“反修防修”，旨在为使广大人民群众免受二茬苦，免遭二茬罪，而这些拆房、卖门，外出讨饭的芸芸众生的境遇又说明什么呢？

这惨痛的数字注脚着什么？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串数字吧！

M县称得上老区，据M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寇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土地，在“三光政策”下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有三百多名我地下党干部被残害。而M县刮起的这场清查国民党的政治台风呢？竟相当于M县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两倍！在被活活打死的“国民党”中，有县委副书记，有农工部长，有公安局长，有法院院长，有银行行长……无疑，M县又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扫荡！

这是一串滴血的数字啊！

在这块先烈们挥洒过热血的土地上，在人民群众所拥戴的政权建立之后，这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被“共产党”残害，难道不令人瞠目、令人深思吗？

今天，许许多多将“文革”中的怪人奇事视为天方夜谭的年轻人，一定会吃惊地发问：“为什么会在一夜间挖出那么多的‘国民党’？为什么那些本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这发问不难回答。M县一位老共产党员曾对此有过一句概括：“‘文革’时的‘国民党’都是打出来的、咬出来的、领导指定出来的！”

在残酷的刑罚威逼之下，M县“清查国民党”的狂风，拉

开了战幕。

是一本旧县志帮了“造反派”的忙。

旧县志上清清楚楚记载着：现任 M 县中学校长的×××，曾任“国民党县教育局委员”。

于是，“造反派”头目们灵敏的大脑，展开了逻辑推理：“国民党的县教育局委员”，自然是国民党了。他们窃窃暗喜，认为终于捉了一条大鱼。

更为震惊的是，老校长的儿子解放后一直担任 M 县的县委书记。虽然他在“红色风暴”来临之前就已调离 M 县，但已被冠以了“走资派”。

一个老牌“国民党”的儿子，当了 M 县那么多年的县委书记，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这一发现和推断，对当时 M 县的头脑人物来说，无疑于麦哲伦发现了新大陆，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老校长被抓、被关押起来。

这位思想进步，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投入地下党怀抱的老教育家，受此不白之冤，当然要据理力争了。

他那个已调往外地的儿子也被揪回 M 县。这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 M 县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为 M 县经济生产发展抛洒过血汗的共产党员，当然也要矢口否认强加在头上的种种不实的罪名。

于是，戏曲舞台上县太爷审案的情形出现了。对死不认帐的主儿，只要大喝一声：“大刑伺候！”一切复杂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

那年月的戏剧舞台，才子佳人被扫荡得干干净净，取而代

之的是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更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代楷模，面对鸠山的法西斯酷刑，宁死不屈，凛然一身豪气，笑赴刑场。

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却不是全能与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媲美的。这位M县的原县委书记，在刑讯逼供之下，终于受刑不过，被迫地、也是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谁介绍他的呢？自然应是他的生身父亲。时间：一九三九年。

我们无法描绘这位老书记当时的复杂心态。如果是写小说，可以任凭作者去开掘、去描述、去刻画，但这却是纪实文章。尽管是纪实文章，我们仍不妨作一点剖析式的描述。他知道，自己压根儿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这顶帽子怎么会突然扣到自己头上来了呢？谁诬告的？他清楚记得自己入党的日子，那在鲜艳党旗下宣誓的场面时时在眼前闪现。在M县工作多年，兢兢业业，虽谈不上政绩卓著，但也没犯过啥大错误呀？批评、批判都可以接受，扣上这项“国民党”帽子，连做梦也没想到啊！自己入党就是要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奋斗呀。再看看眼前整自己的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还曾受过自己（组织）的器重。他清楚，他们大多是解放后参加工作入党的。现在，批准他们入党的一级党组织负责人，竟成了“国民党”，这是怎么啦？他不理解，更想不通，明明是“共产党”在整共产党，怎么冠以清扫“国民党残渣余孽”呢？

老书记的父亲也未能幸免。老校长受刑不过，也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并发展自己的儿子也参加了“国民党”。

承认不过是恶运的开头。他万万没想到，他一承认会带来如原子辐射冲击波似的反应。他任教多年，本来是桃李满天

上，现在竟成了“国民党”满天下了。简言之，老校长最后是惨死在棍棒之下的。令人惊颤的是他的尸体被浸泡在福尔玛林防腐液中。M县“三代会”头头大言不惭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反动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将这具国民党的僵尸抬到北京去，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儿子承认了，老子也承认了，但还是缺乏说服力。当时流行一句话：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有了口供，还须人证物证。于是，又找来M县两个人人皆知的名牌国民党。在严刑逼供之下，他们也写了交代材料：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老校长发展介绍的。

霎时间，一条爆炸性消息笼罩了M县，令老百姓震惊、迷茫、后怕。呵，老天爷，这些多年受我们尊敬的人，原来全是“暗藏的国民党”！

又到了运用逻辑推理的时候了。

既然县委书记是暗藏的“国民党”，无疑地是M县“国民党”的总后台了。那么这个县委自然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会了。照此推理，便得出结论：M县表面上是共产党掌权，实际上县委牌子一翻过来就是“国民党的县党部”。

丑剧敲响了开场锣鼓。

造反派心最“红”，对毛主席最“忠”，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刑讯逼供逐步升级。那位显然被酷刑征服了的M县“国民党”总后台，又违心地供出经他手发展的十名“国民党”，有副书记、有部长、有局长……。

于是立即扩大“战果”，对其中八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刑讯逼供，一下子咬出“国民党”二百多人。

雪球越滚越大。

经过七天七夜的鏖战，“国民党”名单一下子上升到四百八十多人。

M县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名曰“爆炸点”。在爆炸点上召开全县规模的广播大会和现场会，一场清查“国民党”的运动，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遍及M县每个角落。

多么惊人的速度啊！可谓“战果辉煌”。

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本能地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这怕是动物普遍具备的本能吧？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地位日增，其覆盖面不亚于阳光。儒家最崇高的理想境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休管国事，只去保护自家性命财产，这可用一句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另一方面乞求当权者手下留情，施以仁政。

想保护自己，未必就奏效。

在“三代会”特设的刑讯室里，几个体格魁梧的专政队员，将两个挖出的“国民党”分隔在里外两间屋，谁也不见谁的面。每人面前都摆着部手摇电话机子，电线将他们的身体紧紧缠裹起来。于是开始审讯了，交代问题，揭发别人。看谁不老实？看谁交代的不彻底？两个人虽然互不通话，但专政队员来往传递信息：“×××揭发你××问题，有没有？快交代坦白！”这时，自我保护意识立刻占了上风，为表现自己，为表示对对方的愤恨，手摇起电话机子，让令人麻木难忍的电流通遍对方全身。双方都有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你摇我也摇，而且拼命地摇，

摇得越快越老实，越能表示忏悔！专政队员们坐在一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个“国民党”折腾个半死。浑身全是灼烧的伤痕。

这种电刑有个美妙的名子：敌打敌。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党”营垒。

这种背靠背的互相揭发，这种分化瓦解，个个击破，对涉世深久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哪回运动能少了这种传统项目？

“吃一堑，长一智”，挨过毒打的人会慢慢变得聪明起来。封建官吏把刑讯谓之曰“大刑伺候”，现代文明的隐语则是“帮他清醒清醒头脑”。

离M县五十里的J县。

一位公私合营企业的经理被打成“国民党”。对他严刑逼供，让他交代揭发问题。他咬一个，打手们摇摇头，表示不对。招来的是一顿皮鞭毒打。他再咬一个，还是没咬准，又是一顿毒打，反反复复不知打了多少遍了，他恐惧的目光忽然发现打手的手上，有几行小字，打他时那巴掌有意来了个近似电影中的慢镜头动作。写着字的巴掌慢慢地朝他抡过来，越近越慢。他这才看清，手掌上写着几个人的名子。再审讯他，他咬一个，打手们满意地点点头，再咬一个，人家更是满意。他突然觉得可悲，这不是自找苦吃么？谁是同党，需要你咬谁，人家手上写得清清楚楚啊，你为何不早发现这秘密？何苦受这般皮肉之苦呢！

他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咬出好几个同党。

准确无误。令审讯人员满意非常。

最后，又让他看过审讯笔录，斥问道：

“是你说的原话吗？”

“是，是！”他战战惊惊地点着头。

谁能说这种审讯手段不高明呢？是“指供”，但又不留痕迹，如果用录音机录下口供，完全是受审者的真实口供，“指供者”只将手洗净就万事不关已。纵然日后相互结下冤仇，也结不到他的头上，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是×××咬的你呀！

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就是这样奇迹般地被“挖”了出来。

●酷刑——一台造“假”的机器。

据说最早的人类是不知道疼痛的。

没有痛苦的生命，无疑是非常地欢愉、非常地幸福……

每时每刻都陶醉在欢愉和幸福的人类，只有透明的纯真，而没有混浊的虚假。

一切都是无限地美好，人类要虚假还有何用途？

一个法力无边的魔鬼，尽管他万分地丑陋，可是，他却异常地喜爱虚假的赞美。

为了使人类的纯真用虚假来代替，这个魔鬼绞尽脑汁地发明了一种名为“疼痛”的感觉，强加在人类的肉体上。可以产生“疼痛”的酷刑，便成了魔鬼造“假”的机器。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个专门怂恿造假的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民为愉悦君王要造假，否则，君主就会给臣民“拉下”脸色。儿子为糊弄父亲也得造假，否则，父亲就会捶胸顿足地大骂：“逆子！”

“假”显示出它特有的“效应”。

这种“效应”的结果就是：“顺者昌、逆者亡！”

“假”成了中国人流行不衰的保护色。

有人说假话，就有人说真话。真与假在较量，说真话的人与说假话的人在搏斗。一旦假的东西，假话、假事、假材料“胜利”了，必然构成冤狱，在这点上无须置疑，假与冤是对孪生兄弟。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病死。这时掌握朝政实权的宦官赵高，不想让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继位，意欲扶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上台。于是，他严密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并假传圣旨：赐死扶苏，立胡亥为太子。于是，刚当上皇太子的胡亥继承皇位，人称秦二世。

赵高利欲熏心，不甘心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地位，妄图篡权，但又怕众臣不服，便苦思冥想搞了场试探性的检验。

他趁众臣上朝朝拜的机会，让下属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说：

“这是匹难得的千里马，献给陛下吧！”赵高笑着说。

“丞相弄错了吧？这是只鹿，你怎么说是千里马呢？”

赵高没有理会秦二世的话，高声问左右的大臣们：

“你们说，到底是鹿还是马？”

鹿和马谁不能辨认？但许多人惧怕赵高的淫威权势，不敢

做声，有人为讨好赵高，阿谀奉承道：

“是马！确实确实是匹千里马！”

仍有人不愿违背良心，也看透了赵高的险恶用心，毫不含糊地说：

“是鹿，不是马！”

赵高看出来，凡是说实话的人，是不甘心服从他的指挥的。他给这些人罗织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监牢，惨遭杀害。

鹿变成了马。事非被颠倒，黑白被混淆。
假的变成了真的。

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些坚持说真话，捍卫事实的朝臣，被处罚绞杀，一桩桩冤狱都是由假构筑而成。

谁都懂得，定案手续是应该很认真、严肃、严密的。

“造反派”也懂得这点常识，光有“口供”怎么行？还得有人证、物证。

两千多年前“指鹿为马”的丑剧又重演了。

“人证”前文说到了，找那些“明牌国民党”做人证。因为他们的人事档案里，记载得很清楚，现在向“专政组”补充交代，也算态度老实，向无产阶级“低头认罪”。

物证呢？

还须费一番周折。

……对，还得靠“群众专政”的威力。

为了查找物证，挖地不是三尺，而是七尺、八尺。费力徒

劳，一无所获。当“革命群众”向上级汇报情况时，遭到的是严厉的斥责：

“再找！再挖！挖出个坑也行，把坑照上像也算物证！”

“坑”算什么物证？

他们四处搜寻，到处挖掘，貌似盲目，实则是动过脑子的。要拿到“国民党”的物证，就得找到藏匿的场所，“国民党”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的，一定躲在阴暗的角落，所以要挖地七、八尺。这主意似乎比三岁儿童要高明，但想想看，在偌大的版图上，M县虽是弹丸之地，但能整个翻个个吗？

上司的话就是圣旨，拿到物证是硬指标。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被轮番审讯逼供，光承认是“国民党”不行，你的“党证”呢？你们联络用的“电台”呢？

老天爷，原想说通假话磨塞过关，谁想还要交证据。“国民党党证”“通讯电台”，去哪儿弄这些物件？咱可是连见都没见过呀！

不老实就吊起来，用三角带制成的皮鞭，沾上水，向血肉之躯肆意抽打。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可“物证”还是想不起来呀？再上老虎凳，刹时间，腰脊象断裂似地疼痛麻木，黄豆般的汗珠滚滚往下流淌着。最后，又罚他光着膝盖跪在一根三棱橡子上。

他实在支撑不住，一阵晕旋，跌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醒过神来，但仍然神情恍惚，口干舌燥，眼前金星狂舞，他记不清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嘴里语无伦次地喃喃着：

“水，……水，鸡、鸡窝……”

审讯的人一愣神儿，鸡窝？他们认为，他受刑不过，招供

了。

没人给他端水，一个“国民党囚犯”的性命形同草芥，谁会去怜悯他？

审讯室里只剩下他一人。他又一次昏厥过去。

他哪里知道，他昏迷中的一句胡话，意外地向“造反派”们提供出查找物证的地方。

客观地说，当时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全可用“雷厉风行”四个字概括。“三代会”司令部立即下令，组织五个村一百多名基干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他们村，找到他家，扒掉鸡窝就挖。

一百多名青壮年民兵，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深切的仇恨，手持铁锹、洋镐，“吭哧吭哧”地挖着，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劲头冲天。一气挖下去五尺半，奇蹟出现了，挖出一截虚土掩埋的地道。认真清理地道，找出几本化成烂泥的本子和一架已经腐朽的铁架子。

年轻人敛声并气，不知挖出的是何物。

还是“头头”路线斗争觉悟高人一筹，马上判定：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印制反动传单的油印机。”

人们瞪着惊愕的眼睛，默认了，相信了！这物证足以表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灭亡，在大陆的活动是多么猖狂！面对两个敌对阶级的生死较量，他们亲眼目睹，领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阶级斗争现场教育。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这个村曾住过区党委一个宣传机关，行动是绝秘的，村人大多不知根底。只到解放后才有所闻。那机器架子也确实土造的油印机。它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标记。现在落在“专政队”手里，把它“鉴定”为“国民党”地下活动的物证，再妙不过了！

深埋在地下的这架油印机啊，你没有知觉，更不会说话，但你为解放这块土地、为拯救这里的百姓出过力，你有过光荣的一页啊！你本该进革命博物馆的。历史被玩魔术般地颠倒过来，你若有知，该产生怎样的感叹呢？

你遇上个“指鹿为马”的年月呀！

物证被庄重地带回到“三代会”驻地。

上级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亲临M县，了解和指导这里的“清查国民党”的运动。M县“三代会”“头头”邀功似地搬出从地底下挖出的“国民党反动派”罪恶活动的物证，请上级领导过目。这位领导必经有资历，城府颇深。面对那锈蚀斑斑、模糊不清的破旧机器架子，皱着眉头转着圈看了一遭，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他内心是否有疑虑？不得而知；他当时心里是咋想的？无可采录。笔者不敢杜撰，但这位领导的的确确说了句很有“水平”的话，既表示对下级工作的肯定、支持，又不失严肃和认真。他说：

“呃，嗯，反正不象是共产党使用的物件！”

妙哉！怪哉！

党证呢？

一位供销社的基层干部，被打成“国民党”，关押在“三代会”大院里。

这是位文化人，身上有艺术细胞。在单位里负责宣传工作，办黑板报、搞宣传栏，得心应手。设计版面、绘个题头插图，还真有两下子。

他已经受过几次大刑了。在专政组眼里，向谁逼要哪方面材料，都心里是有底数的。审讯他不是让他朝外咬“国民党”，而是向他索要“国民党党证”。

可他的头脑一直没有“清醒”过来，他想：抓我个草民百姓做甚？我压根儿就不是啥“国民党”呀！

他被关押的屋子，较其它“国民党”高一个档次。受刑过后，便是写检查、交代。再写还是那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一天，他呆痴痴地坐着，忽然发现，除了给他写检查的纸，另有一沓厚厚的白报纸，已裁成特殊的规格，另外还有几张红纸。

他突然清醒过来，关押他，反复刑讯逼供，向他要“国民党党证”，是因为他会画两笔。

自己画！

审讯人员曾跟他比划过，这样宽，这样长……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国民党党证”的样子还是让他想出来了。

“党证”的文字好画上，“党证”的印鉴却让他发了愁。“天生我材必有用”，没多久，他就想出了解决方法。

他用筷子蘸着清水，在白报纸上工工正正地画了一个圆形的印鉴，然后马上将大红纸摺在上面，当时的大红纸极易褪色，片刻，取下红纸后，白纸上便留下红红的印鉴。

他创造了“奇迹”。

他为自己造了伪证。就在这一刻，他也许想了，也许没想，他客观上成了“专政队”的帮凶。

他端详着面前的“国民党党证”，心里涌起极复杂的情感。这回该过关了吧？他揉揉酸疼的手腕，在“党证”上一笔一划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里，他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识，落款的年月日，没写民国纪年，而是公元纪年。

一伙狂徒，谁会去注意这点纰漏？

谁说缺乏物证？“国民党党证”就这样面世了。

艺术是人类高尚的活动，它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在知识极度贬值的年代，一位土生土长略能勾画两笔的民间艺术才子，被逼迫伪造证件，是时代的悲剧，还是艺术的堕落？

○滴血的手指头

这是一位曾被诬陷为“国民党”的M县县委干部讲述的一件令令人心惊肉跳的往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春寒抖峭，残雪斑斑。不见花香，不听鸟语，不闻春的气息。疾风暴雨式的横扫“国民党”的高潮已经冷却下来，但压在人们心头磨盘般的重负并没有解除，如同早春的气息远不能抵御严冬的淫威一样，人们在胆颤心惊中渡过了一个悲凉死寂的传统春节。

他被从“牛棚”解放出来。一天，他去办公室取报纸，忽然发现窗台上有个玻璃瓶，上面落满了灰尘。他信手拿过来一

看，不禁惊愕地张大嘴巴，一股透心的凉气直冲丹田。

玻璃瓶里，浸泡着一节手指头。

现代医学解剖学是高超和先进的。通过各种病理解剖，向人们展示人体的五官、内脏、四肢；这些实物标本，装在特制的玻璃器皿里，用药液浸泡着。还有胎儿发育各个阶段的标本及各种怪胎，还有完整的男人体、女人体……科学帮人们揭开许多神秘的面纱。

这里非病理研究，保存这节手指干什么？

可是，科学一旦让魔鬼利用，便会产生巨大的摧毁力。

事情还得倒回去叙述。

M县有一位被打成“国民党”的干部，多次受刑，命其交代“国民党”反动罪行。六月天已经很热了，空气显得沉闷压抑。这位干部浑身伤痕累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三代会”虽有个医生，但却是个完全丧失救死扶伤医德的狂妄之徒。对受刑人员，他不是真心实意地为其治伤，而是出谋划策，让你更惨痛地受刑，真谓是为虎作伥。伤口撕裂，他不给你缝合，用剪子四下一剪，伤口更大更难愈合，刚刚结疤的伤口，他会残忍地用剪子再给你揭开，让你疼上加疼。这位干部已气息奄奄，还被逼着写交代。一份交代没写完，便吐尽了最后一口气。

“三代会”头头心急火燎地问专案人员：

“他的揭发写完了没有？”

“大部分还没写完。”

“把他写好的较有用的材料全按上手印，再盖部分空手印备用。”

专案人员遵命而去。据说，单空白手印就盖了厚厚一本稿

纸。

人死总要掩埋，专案人员为了“方便”今后的办案，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割下他的大姆指头，装进玻璃瓶里，用福尔玛林药液浸泡起来，啥时需要他的手印，随时即可捞出来使用。

他的死是悲剧，但悲剧并没有因为他死了就结束就闭幕。谁都懂得，世上人的手纹绝少相同的，鉴别指纹是公安侦破定案的重要手段，在重要的材料上按手印比印章要准确可靠得多。但死人的指印居然在死后还能长久发挥效用，让悲剧继续演下去，的确是亘古未有的。

用这根指头按下的手印，不是蘸着红红的印泥，而是蘸着鲜红的人血！

○情报员名单

谁都知道，群众路线是我们的组织路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不论干什么事情，总热心有计划地层层组织，即表明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又有严密的组织保证。

以条条为线，上下左右形成网络。

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样做对促进工作确实带来过“轰动效应”。

灾难也由此而生。

从一位在老管理区担任过会计的人家中，抄家时抄出个旧笔记本，翻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情报点名单

下面，整整齐齐写着姓名。一数，二十六名。

专政组立即提审老会计。

“这二十六个人是干什么的？”

时间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记忆早已减退，猛听这没头没脑的斥问，老会计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装什么蒜！”笔记本“啪”地甩到他面前，“快老实坦白交代！”

老会计仔细端详着笔记本上的名单，又看看上面的标题，终于想起来了，忙解释道：

“是这么回事。这二十六个人是当时管理区确定的各村负责向公社汇报虫灾情况的人员。是根据上面要求搞的。保人保畜，防虫灭虫，尽早掌握各村虫情，是管理区建有的‘情报点’。”

“胡说！”

一声怒吼，老会计被捆吊起来。

旧笔记本被送到县革委会，主任看罢名单，厉声说：

“哼，虫情人员名单？咱们头脑里可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处处、事事从‘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看待一切问题。我看这份名单大有来头，不信审审看！”

按照名单，二十六个人被逐个提审。

可叹他们稀里糊涂便身陷囹圄。

本来，一切是非曲直，当以事实为依据。但在那疯狂年月，事实并不重要，“审讯”却是万能的。不少人压根儿不知道为啥被抓、被审，先挨一顿揍，先从精神上压垮你。于是，审一阵，整一顿，变着法子折磨你。

革委会主任果然“火眼金睛”，酷刑审讯之下，二十六个人全招认是“国民党”情报点人员。

○信号枪、信号弹

火药、罗盘、印刷、造纸四大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以此引为骄傲，荣耀着一代又一代子孙。

可是，最早发明火药、罗盘、印刷、造纸的文明古国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消沉下去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将自己禁锢在一道无形的危危高墙内，如同蜗牛，背负着沉重的荣耀，在迷朦中艰难地爬行着。突然有一天，西方的洋枪、洋炮“轰隆”一声巨响，摧毁了那危危高墙。从中央当权者，到庶民百姓，一下子全被震惊了！

“火药是我们发明的，怎么用来打老祖宗？”

文明被魔鬼利用，反过来野蛮地践踏文明！

外夷冲入国门，烧杀、抢劫、奸淫。面对洋枪洋炮的屠戮，自己的发明反过来被人用来绞杀自己，是惩罚还是报应？文明古国显得那么苍老和凄凉。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古老的文明又一次被自己的子孙所“强奸”！

“揪出了那么多‘国民党’，他们是靠什么来联络的呢？”

这个问题急煞了当时M县的县革委会主任。他毕竟是军人出身，很快联想起部队的联络工具——信号枪、信号弹。

曾有人在交代材料中提到过信号枪、信号弹，但始终没有挖出实物证据来。要有“追穷寇”的精神，经他点拨，对写过交代的人又分头进行突击审讯。

“信号枪藏在哪儿？”

“……？”

“见过信号枪吗？”

“见、见过。”被审者嗫嚅着说。这句话不能算谎言，他是退伍军人，在部队的确见过。

专政人员发布命令道：

“你放老实点，一定得把藏信号枪的地点交代出来。那怕你造，也得交出信号枪！”

他绞尽脑汁，哪能凭空臆想出藏信号枪的地方？看来只有一条活路：自造。

M县没有大工业，只有小型的机械修造业。所需材料、工具找来了，在“三代会”专政人员的严密监视下，他开始造信号枪。

单准备就花去了三天时间。第四天传下革委会主任的“圣谕”：“抓紧时间造，明天我要验枪！”

第五天晚上，“信号枪”出世了！

同时，另一个“国民党”在另一个地方也被逼着造信号弹。火药是老祖宗发明的，其配方遍布民间。火硝，木炭，硫黄，雄黄纸，一应俱全，在信号枪造成的同时，信号弹也造好了！

验枪、验弹的场地，是秘密而寥无人迹的。各路“头头”应邀前来观看。头一枪没响声，信号弹落地，爆闪了一片火花；第二枪有响声，但信号弹没有升空，在地平面上“哧溜”一串，留下一道彩色光亮；第三枪打出的信号弹，升到旁边那棵桃树顶那么高，随着“叭”地一声脆响，信号弹在空中划出个半弧，悄然落在草丛中。

各路“诸侯”欣喜若狂。

其实那些造出来的信号弹，不过是民间春节、元宵灯节常放的烟火而已；起花、地出溜、炮打灯……。

此后，这种“信号弹”便做为该县“国民党”的一大罪证，每当有上级领导和友邻县来M县参观挖出的“国民党”成果展览时，该县“头头”就命人晚上在野地里偷偷地燃放“炮打灯”，故意让来参观的领导看见，使这些“领导”及“参观者”无不为“国民党”的猖獗活动感到胆颤心惊！

科学的文明在兽性面前，也变得如此渺小、苍白、软弱、无力。那位当年发明了火药的先人如果在天之灵有知，对这“炮打灯”的妙用不知该有何感慨和感想？

○袖章的妙用

一九六三年，连绵淫雨，江河横流，洪水泛滥成灾。

M县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之中。

人民子弟兵赶来了，用橡皮艇、木板船，临时赶制的木筏子，从被洪水围困的村庄向外疏散群众，人民空军的直升飞机，在一片汪洋中搜寻，盘旋，向受灾群众涌动呼喊的聚集地投扔食品、药品和医疗、防寒用品。公社所辖各村的基干民兵被组织起来，仿照子弟兵的样子，紧急组成连、排、班建制，按照“战时”特殊需要，任命了连、排、班长。

民兵毕竟不是正规军，虽接受过训练，但赶上这样的紧急情况，还是显得慌乱不堪。谁都有妻儿老小，面对滔滔洪水，面对倒塌的屋舍，面对狂风恶浪中挣扎的大牲口、猪、牛、羊，面对被卷走的锅碗瓢勺，这支散兵游勇队伍行动犹豫迟缓、笨拙

莽撞，哪象正规部队，灵巧、敏捷、无牵无挂。为了增强民兵队伍的权威，公社赶制了一批红袖章，红布白字，印着连长、排长、班长。

袖章就是标记，秋收起义的农民队伍戴过，南昌起义的义军戴过，青纱帐里的儿童团戴过，白洋淀的雁翎队戴过……能戴上那样的红袖章，是荣耀，是胜利，是力量。

洪水消退了，抗洪救灾胜利告捷。言不尽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之情。这种深情，源远流长。一场抗洪救灾，使人民和子弟兵的鱼水深情变得更深、更牢固了！

当年的古镇，是抗洪救灾的前沿阵地。

……一场横扫“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龙卷风，搅碎了古镇的安静。清查暗藏的“国民党”的斗争在深入、升级。突然有一天，在 M 县刷出一条惊人的特大标语：彻底清查和粉碎“国民党”暴乱集团！

这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给骚动不安的 M 县又增添几分惊悸和惶恐。

一声令下，全县开始了紧急大清查。

抄家封门，惊扰得鸡飞狗跳。

在古镇一个“国民党”家里，从破旧的衣柜中，翻出一捆袖章，抖开一看：连长、排长、班长，字迹清晰鲜亮。

袖章藏匿在箱底，显然是专为“国民党”举行“暴乱”准备的。

袖章被送到县革委会主任办公室。

革委会主任原是武装部政委，素与部长不和。突然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机会。他胜利了，当上了革命委员会的一

把手，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

他是真正的军人出身，对部队的衔级建制太熟悉了。他望着那一叠袖章，惊喜若狂，满意地说：

“哼，这就是‘暴动’的铁证！”

仅仅是健忘吗？那场刻骨铭心的抗洪救灾斗争才过去三个多年头，忘也不该忘得这么快，这么干净呀！现在想来，只能感到遗憾。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同样都有连长、排长、班长，这些级衔本身并没有阶级性，通用一下为“我”所用又何妨呢？

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凝结下的水乳交融的深情，在这里比水还淡。

○一声口哨一条命

骚动不安的县城总算安静了下来。

夜，很静。

夜色似乎很慷慨，美好、丑的、善的、恶的、欢乐、希冀、狂妄、恐怖，一切的一切，都溶进它的荫庇之下。

在“三代会”的西侧，有条不宽的马路。家家户户落黑便关门插栓。现已路断人稀。

突然，一声口哨声划破了夜的寂静。

大路上，慢慢悠悠走来个人。那时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看不到电视，瞧不上戏曲，偏僻的县城更显得冷落。这位夜行者是去南街串门回来，无聊至极也会产生盲目的发泄。他是想用口哨声来冲淡夜的孤寂和沉闷，或许是想消除一下恐惧心理。口哨声婉转抑扬，与沉闷的夜色极不协调。

“干什么的？”

一声突然的喝问，口哨声嘎然而止。

几个手持棍棒巡逻的黑影从路边窜出来，拦住了吹口哨的人。

吹口哨人被突如其来的拦阻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用颤抖的声音想说清楚。

“我、我、我……”

他吓得什么也没说出来。

“哪村的？”

黑暗中，他朝前边指指。

“黑更半夜去哪儿？”

“去南街。”声音尽管胆怯怯的，但还是说清楚了。

“吹口哨干啥？”

盘问本身就具有威慑力量，且不说拦路的是几个手持家伙的壮汉。他就住在附近，早就耳闻过“三代会”的威严，今晚路过“禁地”吹口哨，委实是轻率之举。

“走，到里边说说清楚！”

吹口哨者被带进“三代会”大院。

进院者，不是上宾，就是阶下囚。

吹口哨者被带到审讯室，先一顿拳打脚踢，来了个下马威。

“你在外边吹口哨，是不是想和关在里边的‘国民党’联系？”

“哪能呢，瞎吹的呗！”

“胡说！联系上了你想干什么？”

“原原本本交代劫狱暴动计划!”

审讯人员这回到干脆,直奔主题,没绕圈子。

吹口哨者是个农民,一个与世无争的农民能坦白交代出什么?

最后,他惨死在酷刑之下。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县里那么多干部成了“国民党”,他说不上一个名子,落得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冤魂就长眠在当年“三代会”大院围墙外边。他不是坐地户,是外乡客,妻小不敢在这块阴森森的土地上久留,卷起铺盖卷,往原籍投奔亲友去了。直到七八年后落实“文革”政策,也无人出来为长眠的冤魂昭雪。

○收破烂的“国民党特务”

从河南过来个收破烂的。

他拉一辆破旧排子车,一路收破烂,收了随时就地变卖。这天,他来到 M 县,排子车上,堆拥着收来的破烂,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儿。

他一定不识字,怎么将破烂肮脏的车子停放在“三代会”的大门口呢!

他伸伸酸疼的腰,捶捶走累的双腿,深深喘了口气儿,然后伸长脖子,放开了嗓门喊起来:

“收破铺陈烂套子……”

“旧鞋烂套子换火柴哎……”

喊声粗犷、低沉,流露出长途跋涉后的劳累。

这时,从“三代会”大院走出一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干什么的？”

收破烂的不是当地人，一时没听懂问话。出自买卖人的职业习性，他忙点头哈腰送上个笑脸。

“卖破烂吧？……”他讨好地问。

那汉子阴沉着脸，围着装破烂的车子转了一遭，又在车上“咣哩咣当”翻了一阵，拍拍手上的灰土，招呼道：

“走，跟我来！”

收破烂的一扫满脸疲劳之色，以为遇上了大买卖。忙弯腰去拉车。那汉子喝斥道：

“车搁这儿，你跟我来！”

M县县城的人都知道，“三代会”大院是块禁地，谁也不准接近。曾几何时，被誉为“红色政权”的“三代会”怎么“怕”起人民群众？自打围剿“国民党”开始，“造反派”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革命警惕性”也特别高，大院四周有围墙，除定点设岗守护外，还有流动值勤人员不定期巡逻。

曾出现过一件冤而又冤的事：“三代会”后头一排房子都开有后窗，窗外就是围墙，围墙外是农田。一位年轻人从围墙外农田经过，急忙忙蹲下来解了个“大手”，偏巧让巡逻的人碰上，于是被抓进“三代会”大院。挨了顿鞭抽棍揍，先触及皮肉，后触及灵魂。罪由是：妄图用臭气熏染“红色政权”。今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见怪不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任何事情都要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分析。那位在“三代会”围墙外拉屎的青年被触及灵魂（灵魂附于肉体，刑讯逼供就是触及灵魂，不是为触及皮肉），也就顺理成章了。

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为保卫“红色政权”，值勤人员是见生人就抓，抓进去就审。

县城的人宁肯绕道走远路，也不从这块禁地旁通过。

一个收破烂的外乡人，怎能知道这些“隐情”？

大院里关着不少“国民党”要犯。他的几声吆喝，那奇特的外乡口音，用“阶级斗争”的“照妖镜”一照，当然要“原形毕露”了。

收破烂的被带进“三代会”大院，如何“加工处理”的，不得而知。他那架破排子车，在外边扔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收破烂的一瘸一拐从大院走出来。一夜功夫，本来的旧衣服又绽开一道道口子，浑身沾满尘土和草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神色惊恐，目光呆痴。只见他战战兢兢一步一回头望着那大开的门，竟疑心自己鬼使神差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只听他心有余悸地自言自语道：

“俺们哪里兴抓‘走资派’，这儿连收破烂的都抓！”

值得庆幸的是，他从十八层地狱走出来，保了条命。

○“为人民服务”也救不了他

无知总是伴随着愚昧生存。

按照常理，要先有事实证据，才能有分析、判断、结论。但“文革”年月不这样，帽子先扣到头上，再去凑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证）？

一天，群众专政组抄家时，抄出支电笔，在场者谁也不知是何物。拿给村革委会主任看。村革委会主任将电笔置于掌上，审视把玩良久，仍猜不出是何物。无知又不愿露出憨相，

“领导”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总比群众高明，于是断言道：

“嗯，我看是‘国民党’使用的玩意儿，不信审审看！”

窝主立刻被揪到村群众专政办公室。

电笔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什么？”专政组长喝问道。

窝主胸有成竹地说：

“电笔。”

“电笔是干什么用？”

“电工用的。”

呃，原来是电工用的。电工虽不能和电台划等号，但都带“电”字，二者之间肯定有牵连，肯定是一路货色。

“你藏这电笔干啥用？”

“这是在部队时，领导上奖给的。”

“哼，说得多轻巧，领导上会奖这玩意儿？你老实坦白，你想用这电笔干什么？联络？暴乱……”

“不、不是。”窝主被这阵势吓愣了。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面对一堆愚昧无知之徒，浑身是嘴也辩不清呀！“电笔确实是领导上奖给的，不信你们看，上面还刻着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呢！”

专政组长拿起电笔，凑到眼前，转了一圈一看，上面果然镌刻着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一看不要紧，更激怒了专政组长，跳起来，恶狠狠地说：

“不许你诬蔑伟大领袖。你以为把毛主席语录刻到电笔上就能掩盖你们的罪证，逃脱革命的大清查？别白日做梦！看来

不触及灵魂你是不会老实的，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

在那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年月，“为人民服务”出人意料地不起作用了。因为它刻在一群愚氓们不识为何物的电笔上。明明不认识，但却敢断定是“国民党”用的，岂非咄咄怪事？正因为窝主胆敢将“最高指示”镌刻在“国民党”使用的物件上，所以，他除了“国民党”罪之外，又被加上一条“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剃光头也有罪

“文革”中搞斗批改，大批干部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再教育。

M县的清查“国民党”运动，使得干校的干部一个个心惊胆颤，生怕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干校，说不清干啥体力活，每天起床后是早请示，紧接着吃早饭；吃了饭就出工，没一点空闲；晚上劳动回来，还得晚汇报。不少干部嫌头发长了没功夫洗，干脆找理发匠剃成光头，剃光头到挺方便。

这天，“造反派”头头到干校做形势报告，发现新大陆似地看见几个干部都剃了光头。报告会后，他对干校的头头说：

“你们这里也不是避风港呀！也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那是，那是。”干校头头点着头说。

“清查‘国民党’运动干校进展如何？”

干校头头心一惊，不知咋回答。

“……”

“阶级觉悟太低了!”“造反派”头头说,“我刚才在上边做报告,就发现下边有好几个‘国民党’!”

“啊!……”

“不是有几个都留着光头吗?”“造反派”头头说,“留光头干什么?向往蒋光头嘛!全是‘国民党’!不信审审看!”

干校头头领旨,突击审讯几个留光头的人。果然“战果”辉煌。几个留光头的人忍受不了酷刑折磨,全招认自己是“国民党”。

从此,再没人敢留光头了。

◎刘少奇拍着肩膀对我说……

某公社在批判上要求上挂下连。一次“攻心战”上,让公社书记胡炳山交待问题。

“胡炳山,你包产到户大刮单干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你与刘少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革命造反派是不会饶过你的!”

队长说罢以后,“革命群众”接着开火逼问:“快交待你与刘少奇的联系!”

“我和刘少奇又不认识,怎么和他联系呢?”胡炳山抬头看了看围着他的“革命群众”,战战兢兢地辩解。

“你胡说!不交待你与刘少奇的联系就砸烂你的狗头!”

“快说!快说!”众声附和,声势浩大。他们还举起了棍棒摆出了要打的样子。

胡炳山早已领教过了棍棒的厉害,于是赶紧说:“我说!我说!我老实交待。”这时革命造反派们放下了举起的棍棒,开始

听他慢条斯理的交待。

“那年我去北京，在路上遇到了刘少奇，他下了小卧车拍着肩膀对我说：‘小胡呀，资本主义还得搞哇！’我说：‘怎么搞法？’刘少奇说：‘我给你本黑修养，你回去就按着上边说的去搞吧！’我回来后就按着黑修养搞起资本主义来了。”

○“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在邻近 M 县的 J 县。

县剧场一个管业务的，旧社会跟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当勤务兵。这个军官是个绝户头，无儿无女，便将他收为义子。他拜这位国民党权贵为干爸爸。解放后他流落回乡，在县剧场找下份差事。“文化大革命”“清队”一开始，因为他是明牌国民党兵痞，便被群众专政组专政起来。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过不了关。态度不老实就进行“加工处理”，“加工”是刑讯逼供的代名词。吊打一顿，他瞎编几句；再吊打，再瞎编。打手急红了眼，怒斥道：“别象挤牙膏似地磨嘴皮子，捡最主要的说！”他左思右想，啥“罪恶”最严重呢？自小苦出身，给人家当勤务兵，是个受气的差事。当了干儿子还是受气。没杀过人，没抢劫过，没赌没嫖过，哪有最“严重的罪行”？无奈，捡最惊人的先交代过关再说。“那年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头儿，指挥他窜犯大陆，颠覆新中国，不是“十恶不赦”吗？这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居然被认为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谎言比真话有效应。打手们接着又问道：“你怎么和蒋光头联系？”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答不上这句问话，前边的将被否定，又要挨打受刑。他说：“我家有两部电台！”于是去抄他

家，果然抄回两台废旧收音机。不言而喻，收音机就是“电台”。现代人看了一定会发笑，连三岁小孩都哄不了，大人怎么会信？

无独有偶。

在“文革”的高压酷刑下，一位共产党的县委宣传部长，竟招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姜××是H县的县委宣传部长，他是被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抓进“专案组”的。

在“专案组”中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开始“专案组”对他还算照顾，对他没有严刑拷打，只是采取一些体罚，然而，那一连串名称怪异的体罚方式，也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忍受住的。

“专案组”先是让他“搭独木桥”。具体方法是：在坑沿前放一把椅子，让他双脚蹬着坑沿，两手按着椅子，用头顶着椅子背，把腰拱起来……

这种“搭独木桥”让人坚持几分钟还可以，若是整小时整小时地让人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许动，而且还得不停地回答“专案组”的审问，用不了多久，被审者就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被审者刚摔下来，“专案组”就逼着重新搭起，稍有迟误，就会说被审者“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上下几次，被审者就会被摔得鼻青脸肿。

姜部长搭了几次“独木桥”就坚持不住了，他索性开始胡说八道。

“你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快老实交待大的问题！”“专案组”的成员厉声问道。

“我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转移革命群众的视线。”姜部长说。

“都挑动谁了？说！”

“李庄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说大问题！”

“县里‘东方红’和‘八·一八’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再说大的！”

姜部长觉得没法再大了，可是，他实在坚持不住“搭独木桥”了，就颤抖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的！”

魔鬼是谎言的祖师爷。在那疯狂年月，兽性膨胀，真假颠倒，谎言越说越大，荒唐事越编越离奇，一切都见怪不怪了。

○马上选举出来的“国民党县党部”

震动 M 县“朝野”的“国民党”案，还缺点什么材料呢？

一位上级领导的讲话提了个醒儿。他说：“M 县的党政财文大权，被一小撮‘叛徒’、‘国民党反动派’所篡夺……”政权已经变色，缺就缺一个“国民党的县党部”。

搞了那么多人的逼供信，这“县党部”难道还落实不下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干吧！召来专案人员，来个先公议后选举，“选”也要选个“国民党县党部”出来。

世上竟有如此咄咄怪事，滑天下之大稽！

上级公检法、军管会派来两位定案专家，在 M 县住了四个月，看了数不清的交代揭发材料，又查验了有限的物证，一位军管会的“高级干部”感慨道：

“这些交代，确实是千真万确啊！”

一锤定音！

至此，人证、物证都已齐备，又有上级领导核实、审定、表态，经过精心谋划的一场大“冤案”、大“假案”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从“构思”到“定型”，而且天衣无缝，波及四面八方。

M县革委会的一个“头头”，四处介绍M县的经验，并依据讲话归结出一篇充满火药味儿的檄文：《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

如同瘟疫一样，大抓“国民党”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十六个县市。它辐射的冲击波则更强烈，竟株连到全国十六个省、市，五十三个县，十个部队，中央八个部委。一百多名领导干部祸从天降，一夜间就成了“国民党”。被隔离、被专政、被关押、惨遭迫害。

受M县这颗“原子弹”辐射冲击波残害的人有多少，已经无法统计了。单是就近的十六个县市，就有三万一千七百多人被扣上“国民党”的帽子，一千三百七十多人含冤九泉。

一位在海南工作的高级干部，回家乡M县探亲。抗日战争期间，他当过敌工站站长，出生入死，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谁知此次探亲竟是“自投罗网”。一踏上故土便身陷囹圄。他被扯进“国民党”要案中，脱不得身，完全丧失了自由，还被逼着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妄图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国民党”来。家属盼他探亲早归，但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他已被家乡“造反派”的专政组织扣压起来。于是单位不远万里，派人前来联系，希望这里放人，表示如真是暗藏的“国民党”，回到单

位一样会处理。M县门关得很死，就是不放人。他爱人见丈夫蒙受不白之冤，便四处投诉，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秉明冤情，托人转交。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转下来总理批过的信件，M县革委会的“头头”似乎还不服气，忿忿地说：

“他怎么知道他不是国民党！”

还有难以数计的人，受此冲击波的辐射，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创痛，又怎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表达呢？

“文革”狂潮中，“假”倍受青睐。“假”可以保护自己不挨整；“假”可以嫁祸于人，借机排除异己；“假”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飞黄腾达；于是，“假”成了那个“疯狂”年代自我保护的流行色。它的流行同样是伴随着那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降临人间的。

○冤声呜呜的 63“牛棚”

谁能回答：

历史为什么那么相似？

作假的伎俩为什么那么相似？

酷刑的手段为什么那么相似？

……。

让我们将时空交错，先来看看“文革”中发生在东北×地的一桩冤狱。

一桩冤狱拴着两个无辜的女人：

冤狱仍然是从造假开始的。

六八年“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 63 号。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面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

十年后，“四人帮”垮台了，不久，63 号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以昭示后人。在 63 号里，酷刑稀世罕见，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令人发指。

展览早已撤除，遗址改建宅用，荡然无存。

它的原址是这个大工厂的一个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是个大筒房，将近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叫来瓦匠木工将大筒房断成许多小间，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涂满，外边装上铁栏杆，靠里的只留一枚硬币大小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监视孔用。

这一个个小间就成了牢房，清查出的坏人统统关在这里。63 号实际上是“牛棚”。在那个荒唐年代，“牛棚”与“监狱”不能划等号，但二者有多大差异，也说不很清楚。

为什么叫 63 号？63 号是“牛棚”的内线电话。

63 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与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名子，只能叫“这个”和“那个”。走路必须低头，目不斜视。谁在里面关着，互相并不清楚。一对老夫妻同时关进 63 号，男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了，老伴还不知道，还托人给他捎过火柴呢！

近在咫尺，生别离死，互不相闻。人间少有的怪事！

63 号的看守分三班，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个人。

大案有两个，一是“裴多菲俱乐部”；一是“三党”。“三党”指共产党、国民党、还有什么党也不是的。共产党不言而喻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已坠落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先将 63 号整人的刑罚拿出亮亮相。

63 号酷刑实录

旱鸭凫水：叫人趴在地上，脱掉鞋子，用钢丝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刑人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象旱鸭子凫水。

后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下去。谓“后门吸烟”。

指头钉针：将大头针钉进人的手指头里。

踩靶：人的肋条好象靶地的靶，选壮汉在人的肋条上踩。一位工程师的肋条全给踩断了。

喂臭虫：63 号里又臭又脏，臭虫十分多。但在这里不准用药治臭虫，任臭虫叮咬人，吸人的血。谓之喂臭虫。

钢丝缠人：用钢丝将人绑在椅子上，再用钢钎绞紧，钢丝嵌进人的肉里。时至今日，受过此刑的人身上还有有钢丝勒过的深深的印痕。

冻豆腐：将人扒去衣服抬到室外冻。一个人被冻了一天一夜，抬回来时，已冻得不醒人事。

坐飞机：由人举着将犯人吊半空，然后飞快旋转。一边问：美不美？谓之坐飞机。

做按摩：将人扔在地上，然后上去乱踩，谓做按摩。

黑斗黑：被关押的人互相批斗。

吊四角：用四根绳拴住人的两手腕两脚腕，扯在

四个墙角上，然后中间吊起，任意拷打。

唱样板戏：63号里刑讯逼供时，怕“牛鬼蛇神”的残叫让外人听到，便一边打人，一边放样板戏唱片，声音特别大，盖住了受刑人的惨叫。只要一听63号里唱样板戏，就知又有“牛鬼蛇神”在受刑了。

世界上的事怪吗？63号在北方，而“文革”期间在大西北×农场，整人的刑罚竟与63号大径相同。63号喂臭虫，×农场让“牛鬼蛇神”喂蚊子。

喂蚊子：大西北盐湖边生满芦苇，天傍晚，将“牛鬼蛇神”赶到芦苇滩边，手捆着不能动，任成群的蚊虫在脚、手、脸、脖子上叮咬，痒痒难耐。

相隔数千里，没通信息，更没现场交流，何以酷刑如此相似？

还是来看看63号两个女人的命运吧！

头一位女性我们权称她K女性吧。

K女性的丈夫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一直做技术工作，可老刘出身不好，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属旧官僚。

刘×和K女性注定是挨整对象了。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文革”闹起来之后，刘×家当即被抄。用洋镐将屋里的花砖地、院子里和屋顶上，全挖了

个乱七八糟；沙发被用刀子割破。家用的旧床上有两上洞，“造反派”硬说那是子弹打下的眼，非要枪和子弹。

第二天是二次抄家。

最后，将他们夫妻二人拉出去游街。并在他们脖子上挂上小锅或小盆，拿棍敲，边敲边喊：“我是牛鬼蛇神！”

党委书记也拉出来了，他是“走资派”。“造反派”用大红纸糊个大伞，上面贴着他们夫妻的名子，叫“走资派”举着，意思是这夫妻俩是“走资派”大红伞保护下的“牛鬼蛇神”。

他们被扫地出门，撵到新居“垃圾大楼”里住。

刘×被扣上顶帽子：组织反动的“裴多菲俱乐部”。

刘×和妻子到厂时间长，又都是技术干部，工资高点。又没别的花销，就和另几位工程师经常凑一块玩玩，照相、滑冰、打网球，K 女性又爱唱歌。由于居住宽敞，常到他们家聚会。

就为这，就认定你搞“裴多菲俱乐部”。

刘×被关进了 63 号。

没过多久，K 女性也被带进刘×的厂子，又进了一座厂房，就是 63 号。K 女性被关进一间很小的屋里，当天半夜就审讯她。

一边问，一边打，头发被大把大把地揪掉，让她揭发丈夫搞地下反动组织。

“造反派”还逼她交待在家制造发报机的情节、根本没有的事怎么交代？K 女性家成立“裴多菲俱乐部”，开过黑会，还搞过反动宣誓。

K 女性交代不出，就拿屎尿灌。在小牢监里放着尿和屎，不“老实”就用屎尿灌。又打又骂，说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一次，三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将 K 女性推倒在地，三个人围起来用鞋乱踢一气。

“造反派”在 63 号整人的办法很多。叫 K 女性手捧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能停，一停就打。她累得晕了过去，两个小青年又将她举起来，一个抓头，一个抓脚，象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她，说要“拧肉麻花”。

在 63 号里，还有饿刑。一连几天不让你吃东西。K 女性饿得没法，就将草垫子的稻草塞进嘴里嚼，象牲口一样。

吃一堑，长一智。K 女性不硬顶撞，学会胡说了。

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

答：“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

答：“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造反派”看出 K 女性是胡说，整她更狠了。一天，对她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她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是在工厂外边的空地上乱转。然后拽下车拖进一间破屋。屋中站着一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问话十分蛮横：

“你的发报机呢？”

答：“扔进河里了。”

“发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

答：“在新华书店买的。”

“造反派”认为她又是胡说，上来三个壮汉用棍子抽打，还用刀背剥；然后又吊起来打。

第二天一个打手进来说：“发报机既然没有，转天会弄清

楚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我学过医，给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K 女性真以为这打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那打手哪里是给她治病，他借给她看伤，百般侮辱她。她呼救，可无人搭理。

到了七一年春天，“造反派”突然告诉 K 女性：“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

K 女性惊怔住了。天呐，老刘已经走了二年多了，我还蒙在鼓里……她大哭大叫，可谁理她呢？

后来，是一个守夜的女工告诉她：刘×住进 63 号三个多月，熬不住了，用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

“造反派”将她放出来：“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在这里住着，花这么大代价……”K 女性不愿回“垃圾楼”住，看见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造反派”让她去另外地方住，又派两个女工日夜看着她，怕她自杀。因为有人追查 63 号的事，怕 K 女性死了，又多条人命。

刘×死后，火葬场不给烧，63 号的人就架起柴烧。然后钉个盒子，将骨灰放在里边。

“造反派”有一天来到她的住处，扔下个布包儿，对她说：“他死有余辜！”

K 女士打开布包儿，是刘×的骨灰盒。她瘫在地上，呼天抢地：

“救命呀！天爷！……”

刘×死于“自绝”，罪名是组织“反动地下黑俱乐部”，人证呢？物证呢？都没有。主观臆想你是啥罪，你就是个啥罪。这

与当年延安整风时康生那一套，不恰恰如出一辙吗？

再说另一位女性，权称她D女性吧。

D女性的丈夫姓钱，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供应管理，连家里使个螺丝钉都不从厂里拿，廉洁得很。

夫妻二人的生活清贫而有骨气。钱×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D女性是普通教师。他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了。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他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东西。箱子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倒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造反派”认定它是匕首。窝藏凶器先定了钱×个罪。

钱×真正的罪名是到刘×家去参加“裴多菲俱乐部”的反动活动。

真是空口胡说呀，舌头底下压死人。同志间平时串个门，“文革”运动一来，说不准定个啥罪呢！

钱×也被关进63号，D女性是后来听说丈夫进“牛棚”了。

当时，D女性的态度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照发不误。看来事情并不严重。虽然见不到丈夫，但D女性经常给钱×送东西，烟、牙膏、肥皂、点心、换洗衣服。厂里发了工资，每月都送四十块钱去。

D女性从来没去过63号。既然工资照支，肯定问题较轻，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的。

一九七〇年春节后，D女性到学校去，一个老师问：

“老钱有信吗？”

D女性说：“没有呀！”

“不会有啥事吧？”

D 女性说：“不会的。厂里每月还照开老钱的工资呢。”

又过了三四个月，63 号开始往外放人。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恍恍惚惚。D 女性怕给人添乱，没问谁。

六月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了人，学校工宣队也跟着人。他们神情严肃而紧张，坐下好大会儿才告诉 D 女性：

“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

“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怎么死的？”

来人不肯讲，只是说：

“你丈夫死了，可问题没弄清楚，所以暂时不能平反，厂里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从今日起停发。”

真是晴天霹雳，D 女性还幻想着丈夫问题不大，总有一天要回来的。这下好，幻想彻底破灭了，她早上盼、晚上盼，盼来的却是老钱的死讯！

D 女性不明白，钱×到底定案是什么罪？凭证是什么？我的老钱呀，你死半年了，也不托个梦回来，难道你也和“造反派”一样，有意捉弄你的妻子、孩子？

这时，军宣队进驻了工厂。

恰巧 D 女性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闯进 63 号，才问出钱×惨死的情况：

一次钱×被四条绳子拴在手腕上和脚腕上，固定在四个墙角上，就象上古最残忍的车裂酷刑。然后吊起来打。打手们

打累了，找地方喝酒去了。一帮打手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把钱×还吊着的事早忘到脑后去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钱×四肢全弯着，抽缩到一起。放下来一看，人早已经死了。

封建社会里也明令禁止私设公堂。当堂打死犯人，县官也是要革职的。怎么吊打死人，半年不通知家属呢？怎么还向家里要钱、要衣服呢？

在那“疯狂”年月，人命又算得了什么？

D 女性一副善良之心，眷眷情怀，终落个肥皂泡，破灭了！过了很长时间，几经周折，才找到钱×的骨灰盒。

她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局！

○炼狱中的魔影

“文革”年月是个疯狂年月，走遍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哪里没有屈死的冤魂？

夜，黑得象煤。

没有路灯。没有星星。

路灯打碎了，星星躲在云中。

没有光怪陆离、没有灯红酒绿、没有轻歌曼舞、更没有热闹的夜市和疯狂的迪斯科。

千家万户早早便关死家门，困在家中享受天伦之“忧”。大街上，不时传来威严的吆喝声。

1967年9月，淮北。

卷宗上记录着具体时间：28日晚上9时许。

市委三楼会议室里，窗户用毯子蒙着，灯泡用绿纸包裹着，墙上靠着好几根木棍。十几个“红卫兵”，有的手拿电线缠

的鞭子，有的握着套上皮管的钢筋，有的操着私制的刑具铁条。站在中间的那个壮小伙子，袒胸露背，肚皮上还画着长长的毛。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阴森而充满恐怖。

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副市长孟庆林；淮北矿务局常委副书记王振林，三人均被蒙上双眼，绑架到这里。

市委会议室一下子变成国民党的“白公馆”。

“哐”地一声，刑讯室的门被踢开，破门而入的是“红三司”的司令李××

他扫视下一张张熟悉的脸，稚气隐隐，杀气腾腾。这么大的事也不报告“司令”一声。

“谁抓来的？”李××问。

“王振林和孟庆林是我带人抓的！”刘×拍着胸脯说。

“高心泰是我带人抓的。”一个14岁的“红卫兵”说，他叫袁×。

“要革命的请过来，不革命的滚蛋！问什么！”胸脯上画着长毛的小子看着李××，不耐烦地吼叫道。他从徐州到淮北来串连的。自称是“无产阶级造反兵团”的“飞虎队长”。

尴尬中，“胸脯毛”念起了语录。顿时，十几个“红卫兵”扯着嗓子念起了时代最强音。在“最高指示”的统一下，李××的情绪镇定下来，他蔑视地看了“胸脯毛”一眼，又看看“副司令”张×，用命令的口吻对刘×说：

“你把王振林、孟庆林带到隔壁去批斗，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高心泰。”说着，坐到主审席上，“袁大头，录音。把现场录下来！”

“高心泰，你参与‘九·八事件’的策划没有？”李××逼问高心泰。

“没有。我不知道‘九·八事件’是怎么回事。我是两派都打倒的对象，怎么会参与策划呢！”市委书记解释着。

“妈的×。不老实，揍！”“胸脯毛”一拳把高心泰打倒在地上。

留在现场的七八个“红卫兵”一起跺着楼板嚷嚷道：“揍！揍！”

手掌、脚掌、“铁沙掌”、皮鞭、钢鞭、铁丝鞭，一个个天真烂漫的青少年霎时间变成凶神恶煞般无情。

李××拍着桌子喊道：

“不要打，不要打！让他自己说！”

“胸脯毛”走过来，桌子敲得更响：

“打！狠狠地打！在我们徐州打死好人都没吊事，何况是个臭‘走资派’！”

高心泰身材魁梧，却外强中干。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对于这场暴行，他毫无思想准备。当他眼睛被蒙上的时候，当他被绳索反绑的时候，他还笑着向学生们宣传“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大概是忘了，他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和省委书记、直至国家主席，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时代”需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皮鞭高高举起了！

棍棒凶狠地打过来了！

高心泰被四马倒悬蹄吊在空中，“胸脯毛”还坐在他身上

悠悠自得打秋千哩！

他发出一声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隔壁，王振林、孟庆林同样在酷刑中熬煎着。

李××看到这场景，心里害怕了。但他制止不住，他迅速离开现场，给“支左”部队首长打电话，请求派兵来解危。

“我们怎么处理？出了问题，就找你这个头头负责！”首长一声喝斥，电话挂断了。

李××又走回到刑讯现场。高心泰已经休克，一个小“红卫兵”正给他做人工呼吸。

隔壁的刘×跑过来报告：

“王振林生命垂危！”

李××立即到隔壁，只见王振林手指心脏，一句话也说不出。

心肌梗塞。

李××立即向矿工医院打电话，找医生前来急救。无奈医院总机与他们不一派，她“嘿嘿”一笑，挂断了电话。

李××再次打电话向“支左”部队首长报告情况，要求派军医前来抢救高心泰和王振林。

40分钟后，部队派两位基层干部和一位军医来现场巡视一番，没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其中一位参谋向李××发表一项口头声明：

“你们制造恶果，却推给我们处理。想嫁祸于解放军，我们不会上你的当！”

言毕，匆匆离去。

9月29日零时，王振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小时后，高心泰那高大的身躯也永久地倒了下去。倒下之前，他还断断续续说着：

“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不，不是……走资派……”

孟庆林没有死，肋骨被打断两根。

这场残酷的审讯，“胸脯毛”下手最毒最狠。他带人将高心泰的尸体送回家中，在他肚子上压了块小石头。石头下面压了张纸条，写着：“为刘邓路线卖命，死了轻如鸿毛……”

随之，他逃离了淮北。

遗憾的是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有人说他叫“卫东彪”。那个年代叫这个名字的太多了。“笔名”，革命的“笔名”。

在后来的落实政策中，也没查到此人。

他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却一直逍遥法外。

可叹高心泰、王振林冤死酷刑之下，真正元凶还不知是谁。

他们的游魂能安息吗？

○现代“赛娥冤”

蔡铁根的名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名册上被除去，是在1959年4月。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大校军衔，被撤销军事战史教授会主任等职，工资降为15级，被分配到江苏常州市工业局工作。对强加给他的帽子，他从未承认过，到“文革”前，先后七次申诉，但石沉大海。

这位前军官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风暴会把他深深地卷进去。

1966年8月27日，蔡铁根所在单位人保科长、派出所人员偕同红卫兵，冲进他的家门，一气翻箱倒柜，名曰“扫四旧”。结果，当场搜出40多本日记和一把在“抗战”时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指挥刀。

蔡铁根正色对搜查人员说道：

“这日记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

但是，搜查者如获至宝，将日记席卷而去。其实，蔡铁根早就被人出卖。一个以前和他过住甚密的人已经交出蔡铁根给他的十多封私人信件。公安局据此来收集进一步的材料。

在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自己对被划为右派的牢骚，对国民经济生活、党内政治生活和一些政策的不满，还有一些批评毛泽东主席的言语，不用说，蔡铁根在劫难逃了。

第二天开始，他被公开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子弹，从早到晚，直到口吐白沫，昏厥在自己的家门口。

对他的无端迫害被认为是“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出卖他的人又一次提供长篇材料，题名是《蔡铁根是只蛰伏在阴暗角落里妄图颠覆人民江山的反革命野心狼》，其中极尽诬陷之能事：

蔡铁根和朋友的来往，被说成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

蔡铁根谈论打游击，被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共产党政权；

蔡铁根游览“善卷洞”被说成是为打游击看地形……

于是，在1966年8月19日，这份荒唐至极的诬陷材料，居然作为《蔡铁根案件情况专报》正式上报了。过了不到一个

月，常州市委即成立“蔡铁根专案办公室”，与他有过来往的同事、朋友先后遭到逮捕，定名为“蔡铁根黑帮分子”。据不完全统计，一类对象有7人，二类有8人，三类有32人。

蔡铁根终于被戴上镣铐，锒铛入狱。但他坚决不屈服。在第一次审讯时，他大声说：

“我根本不是犯人，犯罪的是你们。根据十六条，我够上哪一条？要我考虑什么？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据什么法律？”

审讯员忍不住了，吼道：

“是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

蔡铁根没降低声调：

“我也要讲，你就是要我来讲的。你们用反革命的框框，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

这位曾经在中央军委核心部门工作的老红军，为了抗议对他的逮捕，先后三次绝食；曾经试图越狱申诉，结果被事先察觉，于是，罪加一等，还钉上了镣铐。

长夜漫漫……

蔡铁根的手脚被铐住，但他的思想却在自由地驰骋，他甚至想好了出去以后申诉的每句话，他在期盼着、期盼着……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案子被严重地升级了。到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有关涉及人员集中到一起，深挖狠追。名曰办“学习班”，但空气极度紧张，所有窗户被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得半点风，每天搞威吓、批斗、诱供、串供。被押来的15名“蔡铁根分子”最后连同蔡铁根本人，一起被用“喷气式”押上台。为此，专门调来100名民兵，把会场包

围起来。

1970年3月，宣判书下达了，认定“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3月11日早晨五点，最后的时刻到了。蔡铁根被用麻绳紧紧地捆了起来。然后被带到一所房间里。

先宣读的是“逮捕证”！

蔡铁根嘴角现出一丝苦笑：被关押了6年多，要处决了，才宣布逮捕！天下奇冤！

当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他狂喊起来：

“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宣判者蛮横斥道：

“不准上诉！”

“不可思议！”

他喟然长叹，“我革命几十年……”话还未说完，脖子上的麻绳被突然抽紧了，他再也发不出声音了，要说的话只说了半句。

同案的吴翼知道蔡铁根想要说什么，在等候判决时，他说过：“活着，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常州西门外的西公墓，沉闷的枪声响了……

当天晚上，常州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淹没了这位老红军的血迹。

第二章

酷刑——魔鬼的盛宴

●“大屁股女人”就是地主婆●一根绳子吊死一对夫妻●上床还是上梁●“还俺的鸡巴……”●她每天吃一顿抹着人尿的窝头●摧残女犯的酷刑——推磨●“淫刑”在“红色恐怖”下执行●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凳○地狱里的刀光○卫生纸之祸○一口没人敢用的棺材○来自婚床上的“过电”○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从儿童游戏到“赌马闯阵”○“文革”将“跪刑”无限地“发扬光大”○下辈子也“难以忘怀”的“站刑”和“坐刑”○血水飞溅的“学习班”○“文革”的医院——冤魂的“屠宰场”○一幕“假验尸”的丑剧○喉管在临刑前割断○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中国的

传统“国粹”——“游街示众”

○“文革”的专利——“阴阳头

和喷气式”○施加在心灵上的

酷刑○母子命运天壤之别

○“国民党”健身操

蛇。

蝎。

蜈蚣。

壁虎。

蟾蜍。

是为五毒。端午节在床下、屋角喷洒雄黄水，据说可以避祛五毒。

岂知人世间还有比五毒更毒的，那就是从强盗、野兽堕落成魔鬼，紧接着又从魔鬼蜕变成恶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商纣王就是一个暴虐型的昏君。

纣王可以说很聪明，他的智慧使他常常驳倒臣子们的谏言，也经常用狡辩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加之他身强力壮，可赤手空拳打死野兽。在他眼里，天下无人能胜过他。

纣王和宠妃妲己住在金雕玉砌的鹿台上，过着淫荡而奢侈的生活。

纣王巧取豪夺，压榨老百姓，为了压抑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纣王采用高压政策，他苦心积虑想出一种“炮烙之刑”。

在熊熊燃烧的炭火台上，架了根涂了油的铜棒。虎视眈眈

的官吏们，用皮鞭逼迫一丝不挂的囚犯通过铜棒。由于铜棒上涂满了油，囚犯们稍有不慎便会坠入火中，活活烧死。纣王和妲己经常观看这种酷刑，见有人坠入火中烧死，他们便乐得哈哈大笑。

纣王有三个忠心耿耿的大臣，西伯昌、九侯、鄂侯。其中，九侯的女儿便是纣王的王妃之一。她象她的父亲一样，不喜欢这种荒淫残酷的生活，常常违逆王意。最后，被纣王处死，连她父亲九侯也在劫难逃，父女的尸体还被剁成肉酱。看到此情此景，鄂侯便向纣王提出谏言，没想到又触怒纣王，也被杀害，作成了肉干，分送给许多诸侯。

纣王的叔叔比干连续三天在早朝时向纣王上谏，也激怒了纣王，纣王生气地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上有七个洞，叔叔一再劝戒我，一定是圣人吧？我到想看看，你的心脏是否有七个洞！”

于是，比干被杀死，心脏被挖出来，切成了碎片。

多么残忍，多么令人发指！

酷刑无疑是魔鬼的盛宴。

●“大屁股女人”就是地主婆

这个世界本来是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然而几千年的大舞台，却被男人统治着。女人成了附庸。附庸即表示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然而附庸却要承担主宰者的过错。为什么？

因为女人是“祸水”。

在中国，历代君王大都是酒色之徒。不管是谁坐了龙庭，

头件事就是广选美女，充实后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任天子蹂躏，享乐，但这只是定制，实则远远大于这个数。

后宫嫔妃最多的，要数隋炀帝，有人估计他后宫的女人在六万名以上；其次是唐玄宗，多达四万人；而汉灵帝、晋武帝、陈后主等人，后宫嫔妃也达万人。

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将淫放在万恶之首。可是，淫者无罪，被淫者却罪恶昭彰。不管怎么说，从魔鬼坠落而来的恶人，同样对“祸水”特别感兴趣。

在恶人面前，人格形同草芥。

柔弱的女人，更连草芥不如。

一个女服务员，臀部发育良好。在造反派眼里，大屁股女人都风流、都骚情。那时，“性感”这个词还没有流进国门，一伙人眼望尤物，垂涎欲滴。

他们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何况是面对一个大屁股女人。他们终于想出办法，将这位女服务员传到专政办公室，开始了审讯。

别看她在 M 县工作已经六、七年了，还压根儿没来过这地方。是办公室？是仓库？是宿舍？还是……都不象。她一迈进门坎，便嗅到一股血腥气。

她忍不住打个寒噤。

一位专案人员坐在椅子后面，腿高高地翘到了桌子上。由于光线暗淡，她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听对方拖着腔调，亮着公鸭似的嗓子问：

“知道找你来干啥吗？”

她疑惑地摇摇头。

“怎么，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

“我有啥问题？”

“哈哈！”审问人员狰狞地大笑着，令人毛骨悚然。“好啊，常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内环境，看得清楚了些。那审问大员将腿收回去，正襟危坐，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一眨不眨。对于一个女性，是受不了这种审视的，何况那目光里闪射着一股搜身似的淫邪。

这叫目审。

她羞涩地低下了头。

他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于是又拖起腔调问：

“你啥出身？”

“贫农。”

“贫农？不对吧？”审问大员阴阳怪气地说着，背着双手，从“宝座”上起身，围着她，踱着步子。转了几圈后，在她背后停下来，用手拍着她的屁股，反问道：“……贫农？这屁股像不像？”

她猛地感到一股羞辱，感到那只手的力量。

“老实点，快说！”

旁边的壮汉急不可奈地斥喝道。

她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了。但一个柔弱的女人，面对野兽，又能咋样呢！只要能守住清白，别的侮辱都可承受，那怕肉体的疼痛，挨几鞭子，打几棍子，她都愿领受。

她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审问大员沉不住气了，拍着桌子，怒吼道：

“好你个地主婆，还敢软磨硬抗！快老实交代！……”

“我不是地主婆！不是……”她被吓懵了，她见过地、富分子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请罪，象猪狗似地在街上爬，这顶帽子太可怕了。忙争辩道。

“大屁股就是地主婆！”审问大员一锤定音。

两个壮汉如饥渴难耐的恶狼，主子一声喝，便立刻扑上来，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在她的乳房、腰眼、屁股、大腿上，肆意揉摸起来。嘴里喘着粗气，语无伦次地叫着：

“叫你不老实！快，快坦白！……”

如若在平时，拧摸女人的屁股、大腿、乳房，是要承担下贱坯子、流氓、二流子骂名的。彼一时，此一时，尽管同样是猥亵、调戏妇女，但此时是“革命行动”，摸、抠、掐、拧，全是革命坚定性的表现。几个壮汉此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庆幸，还是“革命”好，但愿这种“革命”长住人间。

面对几个壮汉肆无忌惮的粗野调戏，她忍受着羞愧、恐惧，敢怒而不敢言。她知道，面对凶残的野兽，她的自卫只能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的，最后的。

“不，不！别，别这样……”

“别这样？该咋样呀？”一个壮汉怪声怪气地调笑着，顺势在她那高耸的乳房上又拧了一把，另只大手，朝那丰满的臀部滑去，又朝下滑去……。

转瞬间，审讯室的灯被罩上兰色复写纸，室内一片幽兰。给人一种恐怖感。孰不知这也是刑法的一种：名曰“下阴曹”，人为地造成一种地狱气氛。

几个壮汉真象地狱的恶鬼，动作更粗野、露骨、下流。

“大屁股地主婆，你给谁看呀！等着蒋光头回来吗？哈哈，大屁股地主婆，把它露出来让造反派瞧瞧呀！”

“对，搞个阶级教育展览！那大屁股，全是贫下中农养肥的呀！……”

她本能地反抗着，挣扎着。

当一个壮汉发狂地去拉她的腰带时，她不顾一切地自卫着，紧急中，她将那壮汉的手腕咬出了血。

“哎呀！你他妈的咬人，是狗，狗……”

另外一个壮汉淫荡地眯起眼睛道：“既然她像狗一样咬人，我们就找一条狗来制一制她。”

说罢，他让几个同伙按住女服务员的四肢，从屋外叫来了一条看门的大狼狗，他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服务员的裤子扒光，从桌子上找到一块中午吃饭剩下的玉米面窝头，把窝头放在狼狗的鼻子下嗅嗅，狼狗张嘴刚要把他手中的窝头咬下，他马上就将手躲开，并迅速地塞进了女服务员的阴道中……

早就饿红了眼的大狼狗“唰”地就扑了过去，张开尖厉的嘴巴就向女服务员阴道中的窝头咬去……

女服务员早就吓破了胆，恐惧的叫声让任何人听后都会胆战心惊的！

……

这个壮汉此后经常利用狼狗给女犯人上“刑”，最后，竟发展到让雄性狼狗扒在赤身裸体的女犯人身上，自己亲用手将雄性狼狗的生殖器刺激勃起，然后，再令雄性狼狗奸污女犯，他们在一旁按着女犯，并不住地审问着。

什么是兽性？

女服务员的遭遇无疑是一种兽性的直接答案。

●一根绳子吊死一对夫妻

这是个小村庄。

他本是名有前途的教师，五七年的“反右”，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他被遣返回村，劳动改造。

右派属“五类分子”，加上他出身成分高，便成了被打入另册的人。在村里，他规规矩矩劳动，不敢越雷池半步。

“文革”的风暴没有忘记这个边远的小村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在这里仍有雷霆万钧之势。

首先被列入专政名单的，是“五类分子”。

他本来就是“黑人”，已经打翻在地，只须再踩上一只脚就行了。而他的妻子却是新打进另册的。罪名是：右派分子的臭婆娘。

“臭”是政治术语。

她，非但不“臭”，应该说很香。

臭与丑同音。她非但不丑，而且生得很美。

他们结婚多年，她没有生育过。是怕“造就”出一个“黑根苗”，像他们一样永世不得翻身？还是任何一方有毛病而不能生育？这是个谜，天地难知。只见她浑身肌肉一点也不松弛，还象大闺女那样水灵。白净的皮肤，浓眉大眼，胸脯高耸，腰肢柔韧，只是坎坷人生在她脸上罩着层永远也洗不掉、吹不散的忧郁。谁也没见她笑过。现在，她和“五类分子”一起，早早便起来扫街，然后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数

说自己的反动罪行。再后来就是下地服役，接受专政组的监督劳动。

一对苦命人，夫走妇随。

女人的感觉，要比男人灵敏得多。

她只是个家庭妇女，丈夫背黑锅，她自矮人三分，平时绝不多言，地里活干完就回家，忙完家里就下地劳动；家里、地里是她活动的两块天地。对她实行管制，完全因为她姿色姣美。她已经从专政组长那双勾人的眼睛里看出端倪，那眼里闪射着淫邪刺人的恶光。她不敢告诉丈夫，怕他精神上承受不了这压力。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不二。大丈夫不能保妻室平安，那不是枉为人身吗？兔子急了也咬人。她怕丈夫做出丧失理智的事。她不对丈夫说，暗自留意而已。她很清楚，只要她放松警惕，附炎趋势，暗暗给专政组长个眼神儿，然后裤腰带一松，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丈夫会变成遵纪守法，改造彻底，已脱胎换骨的“右派”；她的“臭婆娘”名子也会被一笔勾销……但那还算女人吗？女人立世之本就是贞洁呀！

她下了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是劳动家庭出身，派什么活干什么活。农村的各种体力活难不倒她。如果和丈夫派到一起干活，她还能帮助孱弱的丈夫。

她要负担沉重的劳役，而且还要承受各种摧残精神的体罚。女人比男人多一种体罚：凌辱。

这天，她被派去收玉蜀黍杆。

专政人员坐在田垅上，监督她劳动。

几个半大小子凑过来，围住这个“右派臭婆娘”。

不知是出于自发，还是受人指使挑唆，这伙半大小子硬逼迫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式各样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爬街、敲着锣游街……但人的尊严还深埋在心底。现在，硬要逼迫她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她不甘凌辱，本能地缩成一团，手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小子见她不服从指挥，便一窝蜂似地拥上来，你推我拽，又撕又扯，衣服被撕破了，条条缕缕，她最终没能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

洁白的女性裸体充满着诱惑。

也许这就是说女人是“祸水”的根源。

如果说妖女淫荡的勾引是祸，那么粗暴地对女人施虐，与魔鬼又有何异同？

监督她劳动的专政人员就在旁边。那淫邪的目光凝固了，一眨不眨，恨不能将那白净而富有弹性的肉体吞下去。用“垂涎三尺”来描述他的神态太恰如其分了。此时此刻，只有他这样身份的人，才能有如此“享受”。

这幕丑剧是不是他导演的，不得而知，反正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

丑剧，没有到此完结。一个半大小子更坏，他顺手折下根又粗又壮的玉蜀黍杆，朝她裸露的阴部又戳又捣。

她惨叫着，哀求告饶，发疯似地扭动着身子，本能地用双手去遮盖那隐密处。片刻时间，两股间、手腕上到处是鲜血淋漓。

近在咫尺的专政人员，如同一个性虐待狂，在一边发出欢快满足的狞笑。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象变成一片死寂的荒漠。她承受的凌辱比遭受奸淫还要惨，还要悲！可是，她求生的欲望还没有泯灭，纵然这样，她还要忍辱活下去。她穿上被撕得条条缕缕的衣服，凭借暮色的掩护，忍疼含辱地爬回了家。

她不愿向丈夫吐露全部真情，只说在地里挨打了，正巧“身上也来了”，太难受，要丈夫去向村专政组请个假。

丈夫去了大半天才回转来。他说他挨门哀求，竟“感动”不了“上帝”。专组长的口谕是：

“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革命群众。改造就是要脱胎换骨，褪层皮流点血算个啥？明天照常扫街劳动！”

夜，漆黑一团。

她和丈夫蜷缩在破旧的土炕上，抱作一团。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如果能大放悲音，内心的积郁愤懑或许能得到一些排遣。可眼下连哭也不敢哭出声来，万一让在街巷巡逻的专政人员听到了，那又是一条罪状；对专政不服气。他们只能掩面而泣。他们脸贴着脸，哽咽低诉，思前想后，哪里有活路？她将白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丈夫的牙咬碎了，嘴唇在滴血。罪已经受够，侮辱也该到头，生活也该结束，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来世吧！

他们紧紧抱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不眠之夜。

雄鸡报晓，太阳就要降临人间。

“五类分子”扫街的时辰已过，怎么还不见“老右”和他的婆娘？”

专政人员破门而入，立刻惊住了：

屋梁上，悬吊着两具尸体。

两口子用的一根绳子，一人一头，脸对着脸，好象还有话要说，但永远也说不出来了。

惊慌旋即化成义愤，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

专政人员命令其它“五类分子”，从屋梁上卸下死尸，男的已经气绝，女的还有口气。

由专政组长主持，在现场开了个斗尸会。“五类分子”一个面如死灰，筛糠一般。

专政组长指派几个“五类分子”去埋尸。

女的似乎还在动呢！谁敢去干这埋活人的事？几个五类分子“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我们有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

专政组长气汹汹地从旁边人手里夺过铁锹，朝女的头上直劈下去，立刻，头脑碎裂，鲜血四溅。

周围是围观的革命群众，他们胆颤心惊地举着拳头，在专政组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参差不齐，毫无生气。

人死一万次也不能赎罪吗？

这对夫妇的死，的确没能将他们的“罪恶”赎尽。他们的尸首被拖到村外，朝乱水沟里一扔，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完事。等人去场空，几只野狗便窜过来，用尖利的爪和牙，刨出尸首，撕裂了皮肉，扯断了筋脉，狂妄地大嚼大啖。野狗眼睛瞬间变得血红，嘴巴上滴着血……

他们连具尸首都没留下来。

●上床？还是上梁？

面对愚昧、野蛮、疯狂、凶残，男人不幸，女人更不幸！

M县有一位女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

在“牛棚”中，她得每日写检查，检查自己的罪行；她得交代，交代“国民党”的复辟活动；她得揭发，揭发谁是同党。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事，她检查、交代、揭发，回回却过不了关。

这天晚上，专政组将她单独传到审讯室。她听人说过，单个传讯就是帮你活动活动脑筋，让你头脑清醒。

虽说要去清醒头脑，接受帮助教育，她还是有些怕，心“咚咚”跳个不停。

当她走进审讯室时，不由倒吸口凉气。

她恐惧地扫视着灯光暗淡的审讯室。一张桌子胡乱搁在墙边，边上有把椅子，墙角扔着棍棒，另一面墙边，支着张床。当她偶然一仰脸，心立刻收紧，呼吸也短促起来，屋梁上吊着根粗细的大绳，象条僵死的巨蛇，沉闷地垂悬着。

“听说你交代得不好！是吧？”

“我没啥交代的呀！”

“你也不揭发别人，对吧？”

她颤抖地说：

“我不敢乱说，那又要犯错误啦！”

“哼，你倒原则性挺强啊！”主审官瞪着眼珠子说。

一边的打手嚷嚷着：

“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少跟她罗嗦，不触及皮肉她是不会松口的，灵魂长在肉里，先让她尝尝滋味儿！”

“这臭婊子嘴到满翠啊！”

主审官喝住众人，反剪双手，围着她转了一遭。立刻，这位“坚定的革命战士”心花怒放了，骨头开始酥软，一股无名火直冲天灵盖。这女“国民党”还真有姿色的呀，圆滚滚的屁股，鼓胀胀的奶子，比自家娘们那水桶样的腰柔软得多了。他舌头一卷，舔掉嘴角的口水，淫荡地说：

“对女‘国民党’我们采取优待政策。你说吧，是先上梁还是先上床？”

她颤栗着，牙齿都在打战。

“不，不，不知道！”

主审官说：

“是不知道？还是不明白？”停了片刻，主审官才自我解释道，“上床就是脱光衣服，躺在床上，轻轻松松、舒舒服服交代问题；上梁就是吊起来交代问题。懂了吧？”

是羞辱？还是恐惧？她简直要萎缩成一团。战战兢兢地说：

“不，不……我什么也不上……”

“哈哈，那好，我们帮你选择！”

主审官和打手们得意地狂笑着，恶狼似地扑了上去……

几年后，她平反了，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地。晚上，两口子相拥相抱，泪如泉涌，泣诉着这些年的压郁、不安和悲凄。她死死地搂着丈夫的脖子，说：

“我，我对不起你呀，那天晚上，我上了床，也上了梁……”

一面在诅咒女人是祸女，一面又疯狂地蹂躏女人。“祸水”并没有祸及危害“革命”，倒是嘴上高唱“革命”的人，蹂躏、

践踏着“祸水”。

●“还俺的鸡巴……”

那日、艳阳高照。

那日、碧空万里。

在艳阳、碧空之下有一群满脸污垢、衣衫破烂的乡下妇女正挤坐在街道旁的路沿子上。

路上的行人对她们这群上访上告的乡下人早已熟视无睹，那个年代人们无所事事，最怕天下“太平”，没有热闹可看，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弯一下腰，都会围上一群人。

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焦躁、忧伤、凄苦和愤怒。

如果家中没有大怨大辱，她们怎能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孩，从家中的粮缸里刮出仅有的一斤半两粗粮，背着铁锅，带着柴禾，去敲城里高高的“衙门”？

她们中间有一个妇女叫年××，带着一个三岁多的男孩，男孩已能满地跑了，却还把手伸进她的怀里要奶吃，她的奶水早就干了，那年月，孩子什么零食也吃不到，吸吮母亲干瘪的奶头，恐怕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件最甜美的乐事。

年××轻轻地将儿子揽在怀里，撩起肥大的粗布衣襟，将乳头塞进儿子的嘴里。

围观的行人中有不少坏小子的眼睛，都齐刷刷地叮在她那还算白嫩的乳房上。

她的脸颊飞上了一朵红霞……

突然，她的眼睛闪亮了起来，她猛地将怀中的儿子推在一边，像疯子一样向围观的人群扑去，用一种仿佛响自地狱的尖

厉声音喝骂道：

“还俺的鸡巴……你个小骚×，你还没有使唤够啊！”

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满脸羞红地拼命向后逃去。

年××一把就揪住了她的头发，一边用手撕抓着她的脸，一边不停地哭骂着：“还俺的鸡巴……还俺的鸡巴……”

围观者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人群中有人认识那个年青女子的人，他们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地革委的李××吗？”

“李××就是从 W 县抽调上来的，这群上访告状的也是 W 县的……”

原来，年××的丈夫是 W 县某公社的一个小干部，同公社的副主任被打成“国民党”后，因受刑坚持不住，把一贯老实厚道的年××的丈夫也咬了出来。当时“英姿飒爽”的李××响应领袖的号召，“不爱红妆爱武装”，在这个公社一个下属的村子里担当女民兵连长，由于根正苗红，执行上级指示总是奋不顾身，充当急先锋。当公社成立抓“国民党”专案组时，她不仅被抽调了上来，而且还充任专案组组长。

李××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年青后生，总是喜欢三更天开堂，这天夜半她又命令手下将年××的丈夫提上堂。她审人的刑堂是公社的一个两间房大小的会议室，两扇窗户此时都已用被子捂得严严实实，她美其名是为了保密，实际上是怕行刑时犯人喊叫被他人听见。那时，她所在的公社还没有通电，屋里燃了一盏煤油灯，把她们气势汹汹地身影投射在墙壁上，活象一群阎王殿里的小鬼。

这样的“大堂”虽然没有过去的衙门威风，却也是无比地阴森惨人。

年××的丈夫被带上堂后，就被一个打手一脚踢跪在地下。

……

“交出你的国民党党证来！”

“我是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员，那里有什么国民党党证？”

“×××你不会不认识吧？”

“他是公社的副主任，我怎能不认识他。”

“他就是一个深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老牌国民党特务，他交待是他亲自介绍你加入了国民党，还给你发了一个印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党党证，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吗？”

年××的丈夫吓得脸色灰白，他平时就不善言辞，此时，更是不知该如何解释。

李××朝手下的几个打手使了个眼色，几个五大三粗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用一根长长的粗绳把他的双脚捆绑了起来，并将绳子的一头扔过当屋的园木房梁，“哐溜”一下子就将他头朝下地吊了起来。

“说！国民党党证藏在哪里？”

“冤枉啊……”

没等年××的丈夫再说下去，那个拽绳子的打手猛地一松绳，年××的丈夫就头朝下地摔下来……

这种刑法被当时的专案组称作“空中降人”。人头朝下地被吊上房梁，头部就会大量地充血，再猛地把头往下摔，受刑人的小命就多有不保，一般人受这种刑法都会胡说乱咬的。

当时，W县有一个也被打成“国民党”的县干部受过此刑，专案组的打手把他头朝下地吊上高高的房梁，命令他向东南方了望。当时，黑天瞎火地他能了望到什么？当他如实告诉专案组他了望不到什么时，马上就被松绳，头朝下地摔了下来，紧接着又被吊上去，仍让他向东南方了望，这时他才开始用心地琢磨为什么让他向东南方了望，连摔下几次，直到他的脑袋已青紫肿大，他才想起台湾正是在东南方。

“这次我可算了望到了！”

“你了望到什么了？”

“我了望到台湾了。”

“在台湾你了望到什么了？”

“我了望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干什么呢？”

“让我再仔细了望了望，噢！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亲嘴呢！”

打手们哄堂大笑，县干部才被从房梁上放了下来。

年××的丈夫全然没有这位县干部机灵，不一会儿功夫他的脑袋就被摔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

“对待这种死不悔改的国民党特务就得斩草除根！”女组长李××咬牙切齿地发了话。

“是不是把他孩子干掉！”

“不！把他的骚根子绞了，让他永远也制造不出来小国民党！”

一个打手找来了一把剪刀。

当时还不曾出嫁的李××，竟然亲手将年××丈夫的生

殖器连根铰断……

年××丈夫的尸体被家人领了回去，在入土掩埋换衣裳时，年××才发现丈夫的生殖器没有了。

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刑法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宫刑”，也称“去势”。这种刑法对于男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毁灭性地打击，其心理和肉体上的痛苦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一位清末太监叙述自己被“去势”的经过和感受的回忆录中，或许略窥其中一斑。

他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去多少次。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我并不害羞，实在是太痛了”。“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的要命的器官从他的身上割下来，那个孩子该多么疼啊！心疼得简直到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从那一天起，我的整个生殖器官便同我分家了，动完这种手术，要在尿道上安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了，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要经过一百天，让它偎脓长肉，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那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父亲只准我仰面朝天，有的时候，脊梁象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也是湿漉漉的。”

太监在“去势”过程中所遭受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被这份史料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年××的丈夫被自己一位年青未婚的异性同胞铰断了外生殖器，他痛楚岂止是撕心裂肺啊！

“还俺的鸡巴……”

这一声含血夹泪的呼喊字眼，虽然不太文明。可是，在那文明全部被魔鬼吞咽进肚腹的社会中，弱小无援的年××，又能怎样把心中的愤怒发泄出去呢？

“还俺的鸡巴……”

是一个草民对“红色恐怖”的控诉！

●她每日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当她谈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时，她那双已经昏花的眼睛早已泪水滂沱。

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神品的《毛主席语录》。

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

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

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

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

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子——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

“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

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

“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

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自身的罪一样。

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

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浆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

待蓝色的火苗舔上女教师阴处的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游散了整个房间……

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唤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

接连受了几次诸如“火烧曹营”的酷刑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她能很快地将一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而不会吐出丝毫半点。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苟地往窝头上抹人屎……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受人敬爱的乡村女教师的尊严，就这样被每日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碎了！

●摧残女犯的酷刑——“推磨”

笔者在Q县采访时，曾听一伙受害者讲述了一种“文革”期间对付女犯的酷刑——“推磨”。

这种“推磨”酷刑与中国古代的“骑木驴(马)”有些相似。日本学者森川哲郎在《拷问》一书中曾对日本室町幕夜时代(1338年—1573年)的“木马”刑，有过详细的记载：“用木头作成马的形状，其脊梁削成由两傍斜上并如峰状尖利。(施刑时)将剥去下体衣服的女子吊起，使之骑于木马背上，女犯的阴部正好触及峰状木马脊梁，因而受伤出血。至此，如果还不招供，便牵拉木马。由于木马的下部装有轮子，(在牵拉的颠簸中)下体的伤口被挤深、扩大。不知有多少女犯的血，把木马的

脊峰沾染得乌黑。仅此一端，便可明了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拷问！有时，甚至还故意倾斜木马，使女犯滑向一侧，致使伤口撕裂。”

“文革”期间，Q县的专政队发明的“推磨”酷刑，比古人使用的“木马”刑更加凶残无比。

在Q县“红满天”造反司令部里有一间专门审讯犯人的“黑屋”。屋中有一个方桌，方桌的正中央钉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木橛子，这就是实施“推磨”的刑具。

当时，“红满天”造反队经常把对方造反组织的成员或者家属“偷袭”过来，严刑“伺候”。

这天，他们又提到了一个对立面造反组织头头的女儿，这个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红满天”中的几个壮汉抓胳膊按脚地将女孩的衣服剥光，把赤身裸体的她抬上方桌，面朝下，再将方桌中央钉着的木橛子插入女孩的阴道，然后，推动着女孩的头部和脚部，让女孩的躯体以那根插入阴道的木橛子为圆心作旋转运动……

女孩失声地痛哭着、哀求着，狼心狗肺的壮汉们却不停地推着女孩的身体旋转、再旋转……

女孩终于被折磨死了，就因为她的父亲是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到世上，没有来得及体验一次当母亲的欢愉，就被折磨死了……

悲夫！苍天何在！人性何存？！

●“淫刑”在“红色恐怖”下执行

性爱是人类一首古老的“歌谣”。

在花好月圆之时，两情相悦的男女或拥或抱，将充满生命激情的躯体相融在一起，唱着古老的“歌谣”，创造、孕育着新的生命。

当“红色恐怖”笼罩住古老的黄土地，黄土地上这首人类古老的歌谣，就开始“走音变调”了。

施展“红色恐怖”的“群专队”员们，总喜欢将兽性的目光盯住人类的性爱器官。此时，性爱就不再是人类古老的歌谣，刹那间就变成了灾祸和耻辱的化身。

在Q县的一个“群众专政队”中，一伙丧心病狂的淫魔，发明了一种“五人同颤”的酷刑。

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酒足饭饱的“群专队”员们将十多名男女“国民党”押到了一间大教室内。教室的窗户全部都用厚草帘子遮盖住了，教室的正中央悬吊着一盏大汽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白得刺目、白得阴森。

“群专队”员们舞动着木棍，让十多名男女“国民党”全部脱光衣服，几名年轻的女“国民党”稍有抗议，就马上遭到木棍的袭击，其余的“国民党”早已被打得麻木不仁，他们不仅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听从“群专队”员的命令，将那几个年轻女“国民党”的衣服也全部剥光。

这十多名“国民党”完全赤裸了身体，就像进了公共澡堂子一般，只是男女同室，而且身边还围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员。

在“群专队”一个淫魔的指挥下，一个男“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他是一个县干部，他本能地用手捂起自己的私处。这里是不能有耻辱心的，他马上就挨了“群专队”员一个大

耳刮子。他被勒令像作体操一样，两手臂向两侧平举起来，一动也不许动。他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暴露在许多异性的目光之中。他羞红了脸，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又有一个女“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她的身体比较瘦小，两个“群专队”员架着她，让她骑上了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脖子上，女“国民党”没有敢反抗，她吓得小便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然后，“群专队”员又让一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弯着腰，蹶起臀部，手在后面紧紧地抱住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臀部，又让一个男“国民党”骑跨在这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的腰上，最后，又找出了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国民党”，让他将生殖器顶入那个弯着腰、蹶起臀部的女“国民党”的肛门内……淫魔们在最后的男“国民党”的屁股敲一棍子，这个男“国民党”就得动作一下，其它的四人也随着动作一下……这就是“五人同颤”的由来。

淫魔们看够了“五人同颤”还不肯罢休。还让赤裸着身体的男女“国民党”表演名为“下猪”的节目。

“群专队”员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跪伏在女“国民党”的大腿之间，用头颅死劲地顶住女“国民党”的私处，又让一个男“国民党”装作接生的样子，去按摩这名女“国民党”的肚子。女“国民党”还不得不停地学着母猪的叫唤声。那个用头颅死劲顶着女“国民党”的私处的男“国民党”，也不得不停地学着小猪的叫唤声，而且，还得隔一小会儿就报一下数。“群专

队”员早已发了话，这窝不下够二十个小猪，就不能结束。

类似这种“淫刑”在“文革”期间花样万千，难以枚举，笔者仅在Q县一地，就采访收集了数十种之多。

Q县的一个“群众专政组织”，曾揪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国民党”，女“国民党”是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是那位男“国民党”的亲侄媳妇。

“群专队”的淫魔们勒令这一男一女剥光自己的衣服，先让当叔叔的赤裸裸的仰面朝上躺在坑上，再让当侄媳妇的同样赤裸裸地骑坐在当叔叔的生殖器上……

“群专队”员们还拿着棍子在一旁问：“得不得？（舒服不舒服？）”不回答，就拿棍子打，直打得当叔叔的和侄媳妇都回答：“得！”。淫魔们才肯罢手。

呜呼！何为天伦？何为天理？

“红色恐怖”将天伦、天理全部吞噬殆尽！

Q县的“群众专政队”靠着严刑逼供，战果马上就像瘟疫一样，十分迅速地扩展，先揪出一个“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受刑不住，就会咬出8个“国民党”，这8个“国民党”再受刑不住，就会咬出64个“国民党”，这64个“国民党”还会咬出多少“国民党”呢？答案只能在“等级数例”中找到。一九六八年，Q县的大小“牛棚”全部人满为患。

为了防止“专政对象”逃跑或自杀，“群专队”常将数十名“国民党”同关一室，而且不分男女。每天晚上临睡前，男女“国民党”都得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隔着窗户扔到院子里，待天亮鸡鸣时，再全部赤身裸体地例队站在院子内，听着口令，作广播体操，美其名曰：“闻鸡起舞”。谁作的姿式不规范，谁就

会被揪出来挨打，而且，还是让其它“专政对象”动手打，打轻了也不能过关，自己也得挨打。这种“闻鸡起舞”每次都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即使是初冬时分，这群冻得浑身打战的男女“国民党”仍然要赤身裸体的坚持完“闻鸡起舞”，才能将昨天晚上临睡前，扔到院子里的衣服，拾起来穿在身上。

“群专队”员们，为了打破“专政对象”们的心理防线，让他（她）们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还强迫他（她）们男女同厕，当女“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就逼着男“国民党”趴在地上观望女“国民党”的生殖器。男“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同样逼着女“国民党”观望。有一位女受害人对此稍表示不满，“群专队”员马上就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跪在地上长时间地仔细“端详”一个男“国民党”的生殖器。最后，还逼着这个男“国民党”向女受害人的嘴里尿尿，男“国民党”一边尿，还得一边不停地唱：“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当夜幕降临时，同室而住的男女“国民党”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扔到院子里后，“群专队”的淫魔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她）们，淫魔们常让平时态度不太老实的“国民党”趴在地上，然后，命令其它男女“国民党”在这个“国民党”的身上，一个叠一个地向上“叠罗汉”。上面只要叠压五、六个人，最下面的那个人的肋条骨就会“咯咯”直响……有好几位受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被压折的。

如果淫魔们喝点酒，就会更加没有人性，经常让赤身裸体的男女“国民党”各自“配对”，不是男下女上，就是女下男上，而且，还必须用力地上下动作，每个人的表情也必须装出性交时那种欢愉的样子，谁要是不动作，或者是表情装得不逼真，

谁就得“大刑伺候”。

若是“牛棚”中没有女性受害人，“群专队”的淫魔们同样会拿男受害人寻欢作乐。Q县的一个“群专队”，竟利用酷刑，威逼着被关押的男受害人互相鸡奸，互相用嘴口交，流出精液后，还必须吞食进肚……

Q县“群专队”的淫魔们，淫威四逞，连未成的孩子也不肯放过。他们曾抓住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同样无耻地将这一男一女的衣服全部剥光，将他（她）们赤身裸体地面对面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同走同停，名曰“牵线”。还逼着他（她）互相唾唾沫，然后再互相舔干净，名曰“亲嘴”。

在Q县的“群专队”中，淫魔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针对男女生殖器而施刑的刑法，每种刑法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常将男性的睾丸称之为“命根子”，不小心碰撞一下，都会令人疼痛得直冒冷汗。Q县的“群专队”根据这一特点，发明了种名为“仙人摘桃”的酷刑，就是令男受害者脱下裤子，暴露出其生殖器，施刑者突然出手，又挤又捏又拧又拽受害者的睾丸。轻者令受害人疼得浑身冒冷汗，重者能令受害人痛得昏死过去。

有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被打成“国民党”时，还未成婚，在“牛棚”中，他多次“领教”这种“仙人摘桃”，有好几次他都感觉自己的睾丸被拽拧断了……从“牛棚”解放后，他结了婚。可是没有多久，老婆就跑到法院和他打离婚，理由是“他失去了做丈夫的资格”。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割韭菜”本是一件菜地里的农活，却也被“想象力”丰富

的“群专队”员们引鉴到了酷刑之中，他们常把男女受害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用左手掀起受害人的阴毛，伸直右手的食指作出刀子状，在受害人被掀直的阴毛根部猛“削”猛“割”，常将男女受害人的阴毛，“削”光“割”净……

审问男受害人时，他们还有更绝的招数，先将受害人捆绑在桌子腿上或是椅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再用一根细绳子的一头捆系住受害人的阴茎，另一头系在房屋的门鼻子上，让这根细绳绷得直直的，然后，审讯者就拿着一根棍子，先打敲一下绳子，再问话。绳子被木棍敲打后，就会扯动受害人的阴茎，审讯者敲打绳子的幅度越大，绳子扯动受害人阴茎的力度就会越大。审讯者一般敲不了几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肿胀起来，若是连敲十多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又青又紫……“群专队”将这种酷刑美其名曰：“弹杨琴”。

用木棍和其它棍状物捅扎女受害人阴道的酷刑，在“文革”期间的全国各地都很常见。在H县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就是被这种酷刑活活折磨死的。

少女的父亲被“群专队”打成了“国民党”，抓进了“牛棚”，少女就四下里找“管事”的哭诉、告状，要求释放自己的父亲。“群专队”被少女缠烦了，就把少女也抓了起来。少女不甘示弱，总是被口大骂“群专队”是法西斯。“群专队”的头头恼羞成怒，非要给少女一点颜色瞧瞧，他命令手下将少女的衣服全部剥光，用脚猛踢少女的私处，少女痛得满地打滚，但仍旧高声痛骂不止。“群专队”的头头又令手下按住少女，掰开少女的双腿拿起胶皮水龙头，用力地插进少女的阴道，将水龙头的开关拧开到最大，用冰冷的自来水，猛灌少女的阴道……少女仍然

又哭又骂。最后，淫魔们竟用一根拳头粗的木棍，又插又捣少女的阴道……鲜红的血液从少女的下部泉一样涌出……少女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没能替自己的父亲喊出冤，却先把自己微弱的生命葬送给了“红色恐怖”……

用铁丝和其它棍状物捅扎男受害人尿道的刑法，在“文革”期间的全国范围也很多见。

Q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挖地道”的酷刑，就是用掰直的曲别针，从受害人的阴茎口捅扎进去，一捅就是很深，一直捅到尿道的转弯处，捅不进去还乱捅，捅得受害人小便如同血水一般，解一次小便，就如同上一次大刑一般疼痛难忍。……

H县在“文革”中还有一种“点蜡”的酷刑：将火柴插入男受害人的阴茎口中，让火柴头露在阴茎口外，然后，再用燃烧的火柴将这根露在阴茎口外的火柴头点燃……这种酷刑常将受害人的阴茎口外烧出大血泡，使受刑后的受害人同样在解小便时，钻心地疼痛。

以上所记述的只是发生在“文革”期间许多“淫刑”的一小部分。在此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深思：

为什么那些整日标榜“革命”的“群专队”能制造出如此花样繁多的“淫刑”？为什么这么多“淫刑”能堂而皇之地在各种“革命”的幌子下施发淫威呢？

中国的未来还会出现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恐怖”吗？

●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凳”

不知是那位人士将这种刑法冠之为：“老虎凳”。读一段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其创作的黑幕小说《活地狱》对这种始见于清代的刑法的全过程叙述，就可以领略“老虎凳”的威名丝毫无愧。

将犯人平放于一条板凳上，“用绳子两根，一根在心口上边，一根在小腿上，都扎在板凳上；又把他两只手也拉到后面去栓好了”。然后，将砖“塞在他腰底下，也不管他塞得下塞不下，只是硬塞。一会又加了一块，那肚子自然是往上挺，两头自然是格外往下紧了。那人腰背上疼痛的十分难受，初时还勉强挨得过，塞上两块以上，便杀猪似的叫起来。添到四块，那个人便连珠的答应他，只要饶命，无论叫他认什么，都不敢犟”。

不知是因为“老虎凳”的历史过于悠久，还是因为“老虎凳”的“威风”实在凶猛。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虎凳”非常普遍地被“专政阶层”所青睐。

在H市二中有一个教政治的教师姓陈名为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这在“文革”中也理所应当地被当成了一条罪状，一群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小将把他捆绑了起来，说他之所以起下陈为秀的名子，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鸣冤叫屈，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

陈为秀被带到了学校三层楼上的一间教室内，教室当中赫然摆着一条红卫兵小将从学校木工房搬来的长板凳。小将

们就用这条长板凳，让过去向他们输入知识的教师，也“学习”了一次“老虎凳”的知识。

陈为秀被“老虎凳”折腾得脸色苍白，汗流浹背，痛苦不堪……待他的学生们把他从“老虎凳”上松放下来时，他竟一步一步地向教室的窗口艰难的移去，没等小将们作出反应，一位整日向学生们讲授“一分为二”辩证法的政治教师，终不能“一分为二”地对待自己的遭遇，怀着对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凳”的恐惧，冲出教室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地狱里的刀光

刀作为一种工具，早在远古的时候，就被人类的祖先使用于和野兽搏杀之中。尽管，那时候的刀，只是“石刀”“木刀”而已。

后来，人类的祖先发明了青铜，用青铜制作出来的“青铜刀”开始被当作兵器使用，被用于杀戮人类。

当“青铜刀”逐渐被“铁刀”“钢刀”所代替，刀越来越多地开始被当做刑具。

“刀刑”是非常古老的刑法。

“刀刑”也是非常残酷的刑法。

诚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偶成》中所说：“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和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在中国古代，正式载于律法的死刑种类主要有斩、绞、腰斩、枭首、弃市、车裂、磔、戮、焚、凌迟等，但是，就持续时间长，

影响大而论，中国古代法定的死刑执行方式，还是以斩、绞、凌迟等三种为主。而这三种刑法，就有两种要使用刀。

而“凌迟”之法，则是一种最慑人、最残忍的刀刑。由于古代的中国皇帝常常干预“凌迟”这一极刑的施刑，古代的“凌迟”也有了八刀、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的区别。据说崇祯年间处决郑曼时曾割了三千六百刀。而且刽子手每下一刀，都有其刚割的次序，以“二十四刀”为例：第一、二刀切去双肩，第三、四刀切去两肩，第五、六刀切去双乳，第七、八刀切去两手至两肘之间的部分，第九、十刀切去两肘至两肩之间的部分，第十一、十二刀切去两大腿上的肉，第十三、十四刀切去腿肚上的肉，第十五刀刺心脏，第十六刀切脑袋，第十七、十八刀切两手，第十九、二十刀切两腕，第二十一、二十二刀切两足，第二十三、二十四刀切去两腿。如果是犯上作乱的犯人，皇帝就会下令将其刚割成百上千刀。行刑时，只有用渔网勒紧犯人身，使其肉从网眼中鼓出，然后一一碎割。

中国古代的“凌迟”虽然明载于刑典，但法律上并不明确规定其施行的具体方法，施刑的具体方法皆系刽子手师徒口授、非外人所能知晓。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早已除去了“凌迟”，施刑“凌迟”的刽子手们也早已断了香脉，失去了后继之人。可是，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比古代施用“凌迟”之刑还要残忍慑人的刽子手却一下子涌出了许许多多……

Q县的X公社的“造反”头头阎××就是一个比古代刽子手还要狠毒百倍的杀人狂魔。古代刽子手杀人，还要听凭衙

门的判决，而闰××杀人，却全凭自己的喜恶。他经常随身带一把军用刺刀，他领头在全公社挖出了不少“深藏在地下的国民党”，每当他审问“国民党”时，遇上态度不老实者，他就用军用刺刀将受审者的手刺穿，钉扎在桌子上。受害人在后来只要见到他的手去摸挂在腰间的军用刺刀，多数人都会将小便尿在裤子里。

这个被称为“活阎王”的“造反”头头，还用他的那把军用刺刀，活活地给一个“国民党”开了膛，挖出了他的心，“要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他一刀下去，就把那个“国民党”的胸膛开了一个三寸多长的口子，鲜红滚热的血液喷了好高好高……

革命英雄刘胡兰是被敌人用铡刀铡去了年轻不屈的头颅，用她的鲜血染红五星红旗。

当五星红旗在神州的土地上飘扬了十九年的时候，铡刀却又一次被“革命同志”用铡切自己的同胞。

洪有臣是解放前就入了党的老党员，从土改时就一直连任村支书。洪有臣所在的村子里有三户大姓，洪姓只是其中一姓，“文革”搞得“天下大乱”，洪有臣所在村子里的另外两姓人家马上就趁乱夺了权，其中一姓占据了大队支书的位子，另外一姓爬上了大队长的交椅。中国农村的所谓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都是封建宗姓之间的斗争，刚刚走马上任的大队支书和大队长，为了巩固已得的“江山”，竟要采取“斩草除根”的保卫措施。他们开始给老支书洪有臣罗列罪名。“文革”是一个非常的时期，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会被当成罪证而沦为罪人。洪有臣没有上过学，传达“最高指示”时，也常把带有几个脏字

的口头语掺杂在其中。所以，他就背上了一条“用污言秽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并且是“现行反革命”。在当时，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就已经能行使最高法院的职责，两人一商量，就宣判了洪有臣的死刑，动用的刑具竟是从大队牲口棚里搬来的铡刀。

一位当过民兵、打过小日本的老党员被按倒在铡刀下，铡刀不太锋利，按铡刀的年青后生又因为胆虚而没敢使足全力，铡刀没有将老支书的脖子全部铡断。马上又换上了一个年青后生，还是没有将老支书的脖子铡断，最后一拥而上了好几人，才好歹将老支书身首分离……

老支书孤零零的头颅终于滚落到了一旁，他的双目却始终怒睁着……他的心中不服啊！

几个动手按铡刀的年青后生望着老支书不屈不挠的怒目，吓得一哄而散……那个第一个按铡刀的年青后生竟跑回家里，一病不起，连发几日高烧就死了，临死前，还用厉鬼一般的尖叫声，大叫着：“别铡我！别铡我！”

村里的老人都说他是被阎王殿派来的小鬼用铡刀铡死的！

古语常讲：“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位年青后生的下场无疑是应验了这句古语。

“上刀山”是古神话“十八层地狱”里对付在阳世间作恶多端之人的酷刑。

在“文革”中，“上刀山”这种酷刑却被阳世间的恶人从“十八层地狱”里搬了出来，专门用来对付反对恶人的好人。

恶人们就地取材，把农村上房用的木梯的每一横节上都捆绑上菜刀，用木棍逼着受害人赤着脚，踩着菜刀的刀刃爬梯子上房，谁要是不爬，就会挨一顿木棍毒打，受害人只有在“上刀山”后，才会被认为有悔过自新的决心，才会有从“牛棚”中得到解放的希望……受害人们为了争取主动，只好让自己的脚心划割成一道道深深的血淋淋的伤口，忍着钻心镂骨的疼痛“上刀山”。

魔鬼们在盛宴之中最喜欢听到的“音乐”，可能就是人类痛苦的呻吟和撕心裂肺的哭号。

Q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倒支锅”的酷刑，就是一曲为魔鬼们在盛宴中而弹奏的“音乐”。

小何是县农机厂的工人，他家不在县城，他只能在工厂的一间透风漏雨的小仓库权作栖身之地，由于这间小屋又潮又湿，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外面瞎转悠，不打哈欠他是不回转的。

一天，小何又是深更半夜里回厂，路过厂办公室时，他突然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声响，他悄悄地溜到了窗下，才听出是男女欢爱到了最高潮阶段所发出的声响……厂里有许多单身，家属都在农村，他还以为又是厂里的哪个单身家属来厂探亲，没地方住，就借厂办公室“贵方宝地一块”，将办公桌当成了“云雨花床”。

小何是一个非常喜欢恶作剧的人，他“咚咚”地敲了几下窗框，冲着里面喊了一声：“声音小一点，别让老光棍听到了睡不着。”说罢，就哼着小调回到他的那处又潮又冷的小屋去了。

小何万万也没有想到厂办公室中，云雨正欢的乃是厂革委会的王主任与新进厂的小会计。

王主任有一位“河东狮吼”的夫人，没事还要整天找他的麻烦，三天二天打一架，若是知道了他的“艳遇”，还不得当众撕破了他的脸皮？王主任在还没有提上裤子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杀人灭口”的决心！

当时，县里各部门的革委会主任都是一伙靠造反起家的“难兄难弟”。王主任第二天天一亮，就找到县里一个主管“专政”的“哥们”那里，告了小何一状，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理由是“他整天半夜在外面瞎转悠，是在刺探国家机密和情报”。并一再嘱咐“哥们”，“一定要往死里整他。”

小何马上就被抓了起来，他心中如何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被当成“国民党特务”。

“专政队”动用许多酷刑，也未能使小何招供，只好给他用上了“倒支锅”。

“专政队”将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固定在一根钉入在地中的木橛子上，刀尖朝上，闪着刺目的冷光。然后，再令小何背朝着刀尖双手向后着地，作出肚皮朝上的弯腰状，那把闪着冷光的尖刀正好对准小何的后心窝，只要小何时间长了，双手用不上力，身子向下一躺，那把尖刀就会直直地捅进他的后心。

小何吓得浑身冷汗淋淋，双手双脚都在不停地打颤，他用一种极其可怜的声音哀求着“专政队”，求他们不要杀死自己！最后，小何的两支胳膊累得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吓得号淘大哭了起来……

魔鬼们醉心地聆听着他的哭声，魔鬼们像是在品味着一

桌色香味美的佳肴……

手术刀是人类的智慧者用来挽救人类生命的。在无影灯下，它被用来切除坏死的肌肤，它被用来剔除癌变的肿瘤。

可是，当魔鬼握住了手术刀的时候，它的用途又会是什么呢？

Q县的“群专队”有一个县医院的外科医生，这位披着白衣的圣使，竟长着一颗魔鬼的黑心。

他经常用一把手术刀给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上刑，就像旧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一样，一刀接一刀地剐割着受害人的肌肤，据一位受害人回忆：“他一刀下去，有时能割下二两多重的肉。”

魔鬼医生掌握了许多医学知识，非常了解人体的解剖，他下手总是非常地利落，如果受害人受刑后的伤口刚刚长合住，他也会重新将这个伤口再一次割揭开，让伤口重新感染、重新化脓……

魔鬼与人类的区别就是能够津津乐道地望着人类痛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文革”中出现的成千上万“革命打手”们，不是魔鬼？那能是什么呢？

○卫生纸之祸

张××已是而立之年，因是地主崽子迟迟说不上媳妇，最

后在亲朋好友的张罗下，好不容易在一个穷山沟里寻到一户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苦人家的贫农闺女，领下山来成了亲。

当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村里没有“最高指示”传达，两口子天一黑就上床。

没多久，小张的妻子就怀了孕。

当时，小张为了娶下这个老婆，背了不少外债，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他的口袋里却拿不出一元钱来。

临产的那一天，小张求朋告友借了三十块钱，买了五斤鸡蛋，五斤挂面，一斤红糖和一些零碎东西，钱用完了，回到家里向老婆一汇报，才知道还漏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卫生纸。

“怎么办？”他只得再去借钱。刚出门走不远，他就碰上一群村民围着报栏看《人民日报》社论，他突然喜上眉梢，他跑到大队部，大队部的桌上常有不少报纸，他本来是想向管事的讨要点报纸，可是，大队部的屋中正巧无人，他顾不上多想，冲进去，从桌上卷上几张报纸就向家中跑去，因为家中早有接生员在等着替他老婆接生了……

小张的老婆替他生下个大胖小子。

人穷闲气必然多，小张的老婆因为小张穷，就经常用刻薄的语言骂他，经常是“地主羔子”不离嘴，因为她娘家是根红苗正的贫农，总认为嫁给“地主羔子”亏得慌。一天，小张又被老婆痛骂了一顿，气得小张七窍生烟，就把老婆按在床上揍了几下，他老婆可不是个受气的人，挣脱后，就跑到街上大骂起来：

“地主羔子打人了！”

“地主羔子打我老贫农是搞阶级报复！”

“地主羔子不买卫生纸，用带毛主席像的报纸给我当卫生

纸用……”

这在当时无疑相当于一颗原子弹爆炸。

小张马上就被大队民兵捆走了。

在大队的民兵连连部里，木棍、皮鞭、老虎凳等刑具早就“伺候”过许多“冒犯”伟大领袖的“阶级敌人”。小张早就知道这里就是阎王殿，所以，刚被推进来，就双脚哆嗦个不停。

“地主臭羔子，你老婆揭发的是不是事实？”民兵连长怒吼。

“是，是用报纸当过……当过卫生纸用，可那报纸上没有毛主席的像啊！”

“你还敢乱蛮缠，如今的报纸，那一张没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

小张吓得尿了一裤子……

“这小子尿裤子了，把他的鸡巴用绳拴起来，看他还尿不尿？”

几个民兵找来一根细绳和一根二尺多长的木桩，他们将木桩钉进屋中的土地里，然后用细绳将小张的阴茎捆住，系在离地约有二尺高的木桩上……

此时的小张站也不能站直，坐也不能坐下，只能采取练武术常用的“骑马蹲裆”式。

民兵连长在一旁笑道：“咱们创造的这一招，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才行。”

“拴马防卧，”一个读过中学的民兵应声道。

“对！就叫‘拴马防卧’。搞了一天一夜待解开时，其阴茎已红肿尤如红萝卜一般，想尿也尿不出来，憋得肚子肿胀疼痛

.....

后来,有一个赤脚医生对小张说:“多亏只栓了你一天一夜,如果再多栓一天,你非得‘尿毒症’不可!”

○一口没人敢用的棺材

W县吴庄村西的机井小屋里,除了放有深水泵、电表之类的浇地设备,还有一口没有盖的棺材。

这里为什么会放着一口棺材?

那还是1968年的事,当时有一句话:“六七年好过,六八年难熬”。六八年被整死的老干部太多了。

吴庄的邻村王庄有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干部,被打成叛徒,批斗、住牛棚二年多,其间被打昏死过五次,打手们将他倒吊在树上,头离地只有二尺高,然后在他的头下点燃干树枝,火苗上窜,马上就将其头发烧焦,面目烧伤。最后,老人被打断一条左腿,打断八根肋骨,打瞎了一只右眼。老人终因受刑不过,趁监视人不注意,用腰带在窗框上上吊自杀了。他的大儿子是个农民,把他的尸体抬回家,买了这口棺材,将他盛殓了。在省城工作的二儿子听说自己的父亲“畏罪自杀”,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标榜自己革命立场坚定,专程从省城跑回来,把他的父亲从棺材中抠出来,并剥光衣服,带领全家人在他家门前开了批判会,带头高喊:“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畏罪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后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随后,将老人的尸体用破草席卷巴卷巴,在他家坟地后面挖了一个五尺深的大坑,将老人深埋了。为了表示不占耕地,不影响耕作,在掩埋老人的地方没留任何痕迹。

当时，树木稀少，做棺材的木料也不多，十村八里也难买到一口棺材。正好，这时李庄一个当过伪军的人被群众专政小组点了“天灯”。点“天灯”就是在人身上泼上汽油、柴油、煤油，然后用火点燃，活活烧死。当过伪军的家属就把王庄那个老干部用过的棺材偷偷买走，把他们烧得焦黑如炭的老人盛殓了。谁知，第二天，李庄群众专政小组就听到了此事，马上就闯进了这家，命令这家人将死人从棺材里抠出，用粪筐抬着死尸游街。还逼着这家人高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让×××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最后，也让这家人挖了个深坑，用破草席把死人卷起来深埋了，那口棺材却停放在这家的门口，不许移动，说是要当成“活教材”，让革命群众看着反革命没有好下场。

不久，吴庄的老支书也被逼打受刑坚持不住，半夜跳井自杀了。

老支书的儿子吴××听说李庄有口棺材，就连夜跑去用高价将棺材买回来，没等天亮就将他父亲盛殓好深埋到他家的祖坟上。

第二天，吴庄的群众专政小组发现老支书失踪了，就扣压了他的儿子吴××，并在他家里翻箱倒柜，掀墙掘地，结果也没有找出要找的人。找不出老支书，他们就严刑拷打老支书的儿子，要他说出他父亲的下落，开始时，吴××不敢说他父亲死了、已经埋了，只说不知道，后来，把吴××倒背双手吊到屋梁上，用烧红的火枪烫他的头发、头皮，还烫掉他的眉毛、胡子，最后，竟把吴××的裤子剥了下来，将从火炉上烧得通红的火枪，直直地捅进了吴××的肛门……

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好从实招来。

群众专政小组不相信吴××的话，就逼着吴××用双手扒开深埋着他父亲的坟穴，要看个究竟。吴××忍悲含泪，一把土一把土地往外扒，指甲都磨光了，十根手指磨出了血，硬是扒了整整一天，扒出了一大堆山似的带血的土，把他爹的棺材刨了出来。

群众专政小组还是不相信棺材里装的是老支书，又叫吴××和家人把棺材从坟穴中抬了出来，把老支书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随即就地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围着老支书的尸体呼口号……

从此，这口盛过三个死人的棺材就再也没有人敢用了……

●来自婚床上的“过电”

如今的城里人常将互送秋波的恋人戏称为“过电”。

照此说法，Q县的中学教师栗寒和刘红，早在俩人同读大学时，就已“过电”了。一九六五年俩人大学毕业，一同被分配在Q县中学教书。次年的元旦，他们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燃起了“花烛”。那一夜刘红用自己青春活力四溢的肢体，让栗寒更加真切、幸福地品尝了“过电”的滋味，使栗寒片刻也不愿离开刘红，如果刘红去外地开几天会，他就像丢了魂一样，心神恍惚，丢东忘西……

当“文化大革命”的“十二级台风”刮进Q县那个小小的县中时，栗寒又一次让爱妻过了“电”，这次“过电”全然没有以往花前月下的温情，而是货真价实的220伏交流电……

栗寒和刘红在大学时学的都是中文，分配到县中后，又都是教语文。业余时间里，刘红喜爱写诗，栗寒则做着小说家的梦。大凡写诗的人都极易感情冲动，在同校的几个老师煽动下，刘红参加了学校造反组织“全无敌”。栗寒是个爱清静的人，刘红多次劝丈夫也参加“造反派”组织，栗寒都笑着说：“你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有你这把保护伞，我在家给你当‘老爸子’伺候你。”

从此，刘红一出去“造反”就是一天，每天深夜回家，不是披头散发，就是疲惫不堪。对在家中苦盼她回归的丈夫越来越看不顺眼，特别是在夜半人静的“二人世界”里，刘红对丈夫的主动温存，多是报以冷眼，或是横加拒绝……

在学校里，栗寒被当成了“只知读书，不知革命”的“白专”典型，让学校团支部开除了团籍，栗寒在床上曾对刘红发牢骚道：“开除团籍？开吧！玉皇爷拉稀——谢（泄）天谢地！”

紧接着，栗寒又在开会喊口号时喊错了一句口号，当时就被学校当局定成反对新生红色政权，按现行反革命对待，准备交公安局逮捕。

回到家中的床上，栗寒又对妻子刘红发牢骚道：“坐公安局？坐公安局有什么了不起！公安局也是人看着人，总不是老虎看着人吧！”

谁知这两句私房里的牢骚话被刘红当成了标榜自己革命，和丈夫划清界限的武器，第二天就被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在当时，这两句话被认为是非常反动、非常嚣张的。刘红放了两颗重型炮弹，在造反派组织里立了大功，在批斗栗寒的大会上，刘红除了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揭发丈夫的“反革命罪

行”，还对丈夫的名字胡乱分析：“什么栗寒？纯粹是反动的名字，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工农兵革命群众都感到无限温暖，而这个反动家伙却感到寒冷，真是反动至极！”

刘红为了邀功请赏，逼迫丈夫吐出更多的“反动言论”，亲自带着几个“全无敌”的打手，给丈夫上刑。

先是一顿拳打、脚踢、皮带抽，栗寒“不屈不挠”……又是一顿压杠子、灌辣椒水，栗寒依旧“横眉冷对”……

“全无敌”组织中有一个教物理的老师，一肚子坏水，在“全无敌”组织中常以“军师”自嘲。他对刘红阴阴地道：“看来得给老栗动点新鲜的招数！”

“还有什么新花样尽管使！”刘红此时正和“全无敌”的头头眉目“过电”，为了讨得那个头头的欢心，她恨不得将自己的丈夫置于死地。

“咱们给老栗身上通点电，听说‘电刑’是世界上最文明而又最有用的刑法，美国最流行的就是‘电刑’，再强硬的骨头在电流下也会变酥变软！”

“咱们学校里的电都是 220 伏的，人触上了，还不得马上电死？”刘红竟然有些“良心”发现。

“你不要忘了我是学物理的，只要你不心痛，我自有妙法高招。”

“不心痛！对栗寒这样死不改悔的坏分子，只能让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

“军师”让手下的打手将栗寒带到学校食堂里的一个大水池旁，在大水池里放满水，又从电源处接上两块电极板扔进水池中，然后，一伙打手棍棒拳脚齐下，打得栗寒无处可遁，只有

跳下水池子，栗寒的脚刚一触到水面，就被电得乱蹦乱跳起来……

“你们看啊！栗寒在跳水上芭蕾！”“军师”阴阳怪气地说。

刘红竟然也随着众人一起哄堂大笑起来……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夫妻之间的婚床仿佛都已变成透明状态，夫妻之间的私房话也都充满了革命味道。

栗寒这个书呆子，在二十多年后的大劫余生中，常常意味深长地对友人反复背诵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有一些在推心置腹时所说的私房话，日后有被知己者用来作为武器的危险。”

罗曼·罗兰的这句名言不知老栗是在何时才读到的，如果在二十多年前，在他还没有登上“婚床”的时候，他就读过这句名言，他的遭遇又该是怎样呢？

◎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

“吊”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字眼。因为，瞪着眼珠、伸着长舌的吊死鬼形象早已在人们的脑海里扎了根，看见了“吊”字，难免不想起吊死鬼的吓人模样。

“吊刑”也是同样地恐怖。而且，历史非常地悠久。

在旧小说和旧电影里，常能看到如虎似狼的打手，大声叫嚷着：“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

普通的吊刑，是将受刑人的双手捆绑在一起，用绳索吊在树上或房梁上，然后，再用皮鞭抽打……

“文革”中“群众专政组织”对付“阶级异己分子”们的“吊刑”却是花样翻新，难以枚举……

Q县的政协干部孟×曾讲述过：“在县城西郊三里远处，有一片阴森森的树林子，在树林深处，有一片陈旧的房子，在‘文革’时，这里是县农业局良种繁殖场的场部。我爱人因为要生孩子，领导就将这片平房最西边的三间平房分给了我，领导还派了几个工人帮忙收拾房子。房中堆满了七零八落的农具，墙角布满了蜘蛛网，墙壁上刷满了鲜红鲜红的“忠”字和“最高指示”。一个工人指着房梁对我说：“这屋里可有许多吊死鬼！这一丈多长的梁上，闹‘文革’时，曾一溜吊过六、七个人，一吊就是五、六天，不让人着地，屁股上和腿上都受伤化脓生着蛆呢……”

这是一处在“文革”中使用过“吊刑”的现场。

孟×就是在这间昔日的“吊刑”现场中，发现了某位有心的受害人收集整理过的《Q县‘文革’法西斯刑法400例》。

Q县是“文革”的重灾区，仅《Q县‘文革’法西斯刑法400例》中收集的“吊刑”就有十三种之多。

曲丽红是一位非常苗条漂亮的姑娘，特别是她的那两根整日在丰满圆鼓的臀旁甩来晃去的大辫子，更是让她周围的小伙子迷恋，她在县医院当护士，她刚从卫校分配到了县医院，她的追求者就接踵不断。可是，她早已芳心他属，爱上了一位在外地上大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这样许多被她拒绝过的人，就对她产生了一股赖蛤蟆吃不上天鹅肉的妒火，“文革”一开始，“赖蛤蟆”们就以她父亲是“老右派”的名义，将她“隔离审查”。不久，又把她送进了专门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进了这种“学习班”，就如同进了阴曹地府一般。“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中仍有对她妒火内燃的“赖蛤

蟆”，这次见到“天鹅”无可奈何地落在了自己的“菜案”上，他们岂能轻饶了她。

“赖蛤蟆”嘻皮笑脸地问曲丽红：“你知道‘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吗？”

曲丽红不知道问话中有圈套，就回答道：“知道。”

“你给我们讲一遍。”

曲丽红讲述了一遍“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

“你想不想学习古人这种‘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

“想学。”

“好吧！我们就先让你学学‘头悬梁’。”

几个“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用一根绳子将曲丽红的长辫子捆系住，把绳子的另一头扔过高高的房梁，用力一拽，就将曲丽红吊离了地面，曲丽红的全部体重都坠在了她的头发上，她疼得泪流满面，双腿乱蹬，……最后，她那一头原本美丽、飘逸的头发，全部被揪断了。有许多头发根还连着一块块流着鲜血的头皮，一位令人赏心悦目的丽人，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秃子……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任何美丽都会被丑恶无情地扼杀！

首次乘飞机旅行的人都会在飞机离地的刹那间心跳加速，不少人还会出现头晕目眩。如果将一个人的双手和双脚捆在一起，反吊在房梁上，再用力地像荡秋千一样，把被吊者摇晃起……“群专队”将之也称为“坐飞机”，就实在让人心中不是滋味了！

·乘坐“群专队”这种“飞机”的受害人，岂止是心跳加速、头

晕目眩，时间长了，五脏六腑都会像是要从口腔里吐出来。

还有一种类似“坐飞机”的刑法，名为“坐大轿”。更令受害人吃受不住。

“群专队”员在房屋的四角都钉上坚固的铁钎子，让受害人脸朝下，将他的手足分别捆吊在四个墙角的铁钎子上，然后，再用棍子猛打其吊坠着的躯体。

把受害人的头和脚分别吊在梁上，再往受害人的脊背上压石头，就名曰：“悬梁驮石”。

有一位老八路，日本鬼子没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把他打死，却被自己的同胞用“悬梁驮石”的刑法，活活地勒吊死了。本来将头和脚一起吊在梁上，因颈项受的力让吊着的脚分去了一半，被吊人还多不会致命，若再向他的脊背上压石头，勒在他脖子上的绳子所受的力就非同小可了。

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自从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没有放过他。而在“文革”中，他受的罪则是最多最大。他曾被“群专队”用“挂衣服”的方法，连续“挂”了五、六天。那天，他随着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起下地收工回来，就被“群专队”勒令举起双手，用绳子将他的全身捆绑得直直挺挺的，“群专队”在墙壁上高高地钉了木橛子，把他像挂衣服一样，牢牢地吊挂在墙壁的木橛子上。理由是他在下地时，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红薯。在当天下地时，他的确是拾起了掉在地上的一小块红薯，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没敢嚼几下，就囫圇个地咽进了肚子。当时，在他身边的都是和他同身份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群和他一样整日吃不饱的“难兄难友”们，却没等他走回村子里，就已经将他“检举揭发”了，为

了“杀鸡给猴看”，警告这群“地、富、反、坏、右”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只能像一件衣服一样，连着五、六天挂在墙壁上“示众”。

“国民党”的老窝在台湾，“群专队”员们为了让所关押的“国民党”，经常地能看一看自己的大本营，就发明了一种“看蒋介石”的刑法，先将“国民党”脚朝上地吊在梁上，然而，令他向东南方张望，并要回答望见了什么，回答不出，就猛松绳子，让“国民党”大头朝下地栽下来，名曰：“倒栽葱”。

有许多“国民党”，挨了几次“倒栽葱”后，就学乖了，只要回答出看到了蒋介石，就会“过关”，最后，竟发展到了有人看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亲嘴……

荒唐的年代就会如此这般地创造荒唐的人！

有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也被打成了“国民党”，因他平时经常向年轻后生炫耀自己的枪法，当年轻的后生专了他的政后，就让他“表演”了一场“单枪打坠”。后生们将他的右手食指用绳子捆系住，把他吊在房梁上，一边向上吊他，一边问他“打枪还准不准”。用一根手指头负担起全身的重量，即使他当过兵，打过仗，这种活罪他也是经不住的，他只能违心地将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抹去，回答说：“打不准，打不准……”

至于“穿耳悬梁”和“勾鼻上梁”的刑法就更加凶残骇人了。Q县的“群专队”常用铁丝将受害人的两耳穿透，吊在房梁，还用卖肉的铁勾子，勾住受害人的鼻子，像勾肉猪一样，朝梁上吊，直到把受害人的鼻孔全部勾豁勾烂……

都说“人心是肉长的”，那些用铁丝穿透同胞的耳朵，用铁

勾勾住同胞鼻孔的“革命同志”，他们的心也是肉长的吗？！

○从儿童游戏到“瞎马闯阵”

在幼儿园中，常能看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包围在一个用手帕或红领巾蒙住双眼的小朋友身旁，开心地玩耍着一种名为“捉迷藏”的游戏。

早在几百年前，在大不列颠的皇家花园里，王子和公主们也常常如此这般地追逐、戏耍。

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这种深受儿童喜爱的游戏，却被某些“群众专政组织”借鉴、延伸为摧残人体的酷刑，并美其名曰：“瞎马闯阵”。

一九六八年盛夏的一天，骄阳如火，大地仿佛被蒸得没有一丝水气。

T县县城的繁华闹市红卫大街却是人声鼎沸，红卫大街原称府前街，旧时的衙门就座落在这条街上，“文革”的突出口号就是“砸烂一个旧世界”！留有旧社会意味的府前街怎能不更名改姓？

红卫大街虽名为大街，却并排通行两辆马车都很费劲。就是这样一条小街，这天却一下子涌来了几千号人，其中不仅有这个小县城的干部、工人和市民，还有不少从四乡八里专程跑来看热闹的农民兄弟。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向前挤，为的是看一眼昔日的父母官——县委书记刘本昌被戴高帽游街的样子。

县委书记刘本昌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当成这个县的头号“走资派”揪了出来，小八路出身的刘本昌刚被关进“牛棚”

的当天夜里，就“畏罪潜逃”了，全县“革命群众”顿时一片哗然。马上就组织了十多个“搜捕队”，兵分十几路去捉拿刘本昌“归案”。

原来，一贯雷厉风行听党话的刘本昌被打成“走资派”后，心里觉着万分委屈，当天他挨了“造反派”几个响亮的耳光，就更加怒火攻心。乘着夜深人静，他就从关押他的“牛棚”——县委小会议室里跳窗而走。他要去北京，找那位在中央任高级领导职务的老首长去喊冤叫屈。

他乘火车来到北京，没走近老首长的家门，就见到老首长家的院墙上糊满了打倒老首长的大字报，进去一打听，老首长也在前几天被揪走了，至今还下落不明。

刘本昌所寻找的保护神，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每日都呼啸而过各色人等的“造反”队伍，“造反”队伍总是押解着几个剃着阴阳头，脖子上挂着牌子的大小“走资派”。“京官如牛毛”，刘本昌发现这些“走资派”们，哪一个也比自己的官职大、级别高。

刘本昌心中的怒气顿时消了不少，可是，他还是不敢回去。他倒不是骨头软怕挨打，他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脑袋挂在腰带上，死也死过几次了。他是受不了“造反派”对他的人格污辱。

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刘本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时候，过起了流浪生活。

在“文革”期间，流浪生活也不是轻易能过，“出门就要介绍信”这一条，就把想流浪的人卡死了。

县委书记刘本昌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遣送站，又从

收容遣送站送回了县里。

T县的头号“走资派”被抓了回来，顿时，全县上下一片“沸腾”。

县革委会先是在县委礼堂召开批斗刘本昌大会，因四乡八里来的人太多，盛不下，只好将刘本昌交给本县的“群众专政”组织，让他们押着刘本昌去全县最热闹的大街去游街示众。

“群专队”将刘本昌反绑着双手，押到了红卫大街上，用早已准备好的黑布，将刘本昌的双眼蒙住，然后，一拥而上，七、八个手提木棒的“群专队”员，你一棒，我一脚地就在刘本昌的脊背、屁股上“招呼”了起来。

刘本昌受痛不住，只能四下里乱跑乱撞，他的眼睛被蒙得什么也看不见，还常常有人给他脚下使绊，他摔倒在地，棒子更像雨点一样密急，他只好从地上爬起来，接着跑……

围观的人群纷纷闪开一条路，刘本昌却看不见路，他的身体常会碰撞在围观人的身上，围观人也多不示弱，不是当胸给他一拳，就是冲着他的脑袋唾上一口……

刘本昌真像是一只“瞎马”一样，四下里“闯阵”。

最后，刘本昌被摔跌得鼻青脸肿、门牙脱落、满口血水……可是，身后的棒子还是不停地敲打着他，他摔倒、爬起、胡跑瞎撞，再摔倒、再爬起、再胡跑乱撞……

在西班牙，有一种“斗牛”的方法，就是将逗红眼的公牛放进街道上，令公牛扬蹄狂奔，一群群喜欢刺激的青年男女，一边闪躲着公牛、一边跟着公牛狂跑……

刘本昌全然不如西班牙的公牛。西班牙的公牛可以向围

观的人发威、进攻，而蒙着双眼的刘本昌却只能挨围观人的拳头、口水……

在“文革”期间，类似“瞎马闯阵”的“跑刑”还有许多。

在Q县的一个中学里，“造反派”勒令“国民党”们每天围操场跑一万米，美其名“锻炼身体”，操场的四周站着许多“专政”队员，谁跑慢了或中途停下，就会挨上几棍子，这群“国民党”们多是坐办公室的干部，跑几百米都会气喘吁吁。每天让跑一万米，而且速度必须快不能慢，有许多人累得扒在跑道上，任凭棍子如何打，也没有力气再跑下去了。

Q县的H公社的“专政”队整人的方法更绝，他们让五、六个“国民党”员，每人拉一辆排子车，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专政”队员后面跑，每天跑二十里路，每次不得超过二小时。超过了时间，回去就得受刑。美其名曰：“急行军”。骑自行车的“专政”队员专拣凹凸不平的乡间土道上骑，而且还骑得飞快。这就苦了这群“国民党”员们，为了怕超过二小时回去受刑，他们盯准了前面的自行车，咬着牙，憋足劲，拉着排子车猛跑。每天都有许多孩子埋伏在道路两旁，专门等着这群“排子车队”经过。一旦发现目标后，就从地上抬起拳头大小的土疙瘩，一顿雨点般地猛打。“国民党”员们即要看着脚下的路，又要躲闪四周飞来的“枪弹”，稍不留神，脑壳就得让“枪弹”留个大包。二十里“急行军”下来要遭到好几起“伏击”，每人头上留三、五处青紫的大包，一点也不算多。这群“国民党”员中，有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民兵担架队员，他私下里对人说：“每天一趟‘急行军’，比从前线向后方抬伤员还让人心惊肉跳……”

在Q县，有一个被打成“国民党”的县委干部，曾创下了“跑刑”的最高纪录，他被逼着围着一个大院子跑圈，整整跑了三天三夜，直到又累又饿地昏死过去……

○“文革”将“跪刑”无限地“发扬光大”

“跪”是一种膝盖着地的姿势。在西安附近，曾出土了一处二千多年前的墓穴，墓主穿金戴银安详地平卧着，墓主的四周竟围跪着数具人尸骨架。这几具双膝着地的尸骨架，告诉着今人什么是贫贱和低卑。

早在上古时期，“跪”就是区别位尊者和位卑者的标志。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当家做了主人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仅勒令“地、富、反、坏、右”们跪倒在地，还要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也不得翻身！

什么叫作尊贵？

什么叫作贫贱？

凡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之中走过来的人，可能都会同意以下这种解释：

站=尊贵。

跪=贫贱。

笔者在采访收集“文革”法西斯酷刑时，听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各种名目的“跪刑”了。

在卫河西岸有一个小黄庄，村东头住着一个七十二岁的王奶奶。

“文革”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最时髦的摆设，就是一尊毛

主席他老人家挥手致意的石膏像。每天全家人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王奶奶家中的桌子上，也像供神一样摆放着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

王奶奶有一个外孙子名叫晓东，当时只有二岁，晓东见东西就抓。一天，竟把那尊毛主席像抓在了手里，扔到了地下，摔碎了。王奶奶又让在县城工作的闺女，捎回来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没多久，又被晓东给摔碎了。王奶奶一不作，二不休，亲自跑到县城的闺女家，把闺女家那尊夜光塑料的毛主席像“请”回到家里。可是，不谙世事的晓东，还是抓住就往地下摔。王奶奶为了防止晓东再一次抓到手上，竟小心翼翼地用线绳将领袖像的头拴住，吊在了房梁上。一边吊着一边赌气地对着外孙子道：“我看你这个小东西还有什么本事再抓！”

此事马上就被一个“觉悟”高的老街坊发现了，老街坊一刻也没有敢耽误，就迅疾地报告了村里的红卫兵。整日高喊“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马上就将王奶奶抓了起来，因王奶奶岁数太大，红卫兵们没有向王奶奶抡皮带、动木棍，只是勒令王奶奶跪在村旁的打麦场上，让七月天炽热如火的太阳暴晒着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奶奶……王奶奶跪在坚硬的打麦场上，没有多少头发的头皮被烈日晒得火辣辣地痛，她那双原本就昏花的老眼，被刺目的阳光晃射得竟黑蒙蒙起来，老人当时把毛主席像朝房梁上吊挂时一点也没在意，现在被一群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小将围在打麦场，越琢磨心里越害怕，越琢磨越觉得对不起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老人家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就昏死了过去……

H县有一个画家，被自己的老婆咬了出来，说他是“老牌

国民党特务”。这都是因为他平时生活不太注意小节，时常与女同事开玩笑，在当时的小县城，经常有对他捕风捉影的桃色新闻。他老婆又是一个缺心少肺的农村妇女，最喜欢喝“醋”，听到点“风吹草动”，就向他义无反顾地“挑战”。最后，总是被画家按到在地，施上几记拳脚。“文革”一开始，县里就开展“抓国民党”运动，画家的老婆不知是自己想的点子，还是她娘家人给她出的主意，竟跑到丈夫的顶头上司面前，揭发自己的丈夫是“国民党”。而且还当场出示了物证：一根又黑又粗的老式钢笔。这根钢笔显然是外国货，在钢笔帽上刻着一溜烫金的外文字母。画家老婆还绘声绘色地对丈夫的顶头上司说：“这根钢笔是他参加国民党特务时发的接头工具。”

画家的顶头上司是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也正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阶段，听到了画家老婆的人证和物证，虽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画家老婆在“公报私仇”，因为，他和画家过去是无话不谈的好友，画家的那点经历他比谁都清楚。鉴于自己的处境，一是为了有立功表现，二是不落下包庇坏人的把柄。他马上就带着自己好友的老婆，跑到了“县革委”，和自己好友的老婆一起，把自己的好友“检举揭发”了。

画家被“县革委”的专政队员从家中抓走了。

画家老婆还追上一个眉目较善的专政队员，扒在他的耳朵上说：“俺家男人我管不住，这次送给你们，让他吃点苦头，你们吓唬吓唬他就行了，千万可别打他，俺还得指望他挣工资养活俺呢。”

画家老婆想得太天真了，她为了冲淡自己心中的“醋”劲，竟亲手将丈夫送进了鬼门关。

画家被带到“县革委”的大会议室里，几个专政队员把会议室的椅子，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叠落起来，一直叠落了四把椅子，最顶端的那把椅子都快接近天花板了。

专政队员们逼着画家爬到最顶端的那把椅子，而且还必须在椅子上跪起来。专政队员们称之为“猴登殿”。

画家开始不肯照此执行。马上就挨了一顿拳打脚踢。

画家为了免受皮肉之刑，万不得已，只好照着专政队员的要求，向叠落了四把椅子的顶端攀爬。

画家画过巨幅领袖像，当时的巨幅领袖像有二、三层楼高，画像时需要搭脚手架。可能是画家有攀爬脚手架的经验，所以，这次他竟然没有费太大的劲，就完成了专政队员对他的要求，跪在了叠落在最顶端的椅子面上，他的头弯着正好顶在天花板上，想直也直不起来。

“他妈的，这小子腿脚倒是利索，在咱们这里‘猴登殿’的，还没有一次成功的，这小子倒是打破了纪录。”一个专政队员狠狠地说道。他们最喜欢在一旁观望受害人胆战心惊、晃晃悠悠地攀爬椅子的狼狈样，在受害人一次又一次地攀爬失败中寻找快乐。这次见画家如此这般轻易地“征服”了叠落在一起的四把椅子，心中顿时不快起来。

“老小子，早就听说你最喜欢画光屁股的女人，老实交待，是不是国民党让你专门画一些光屁股的女人，来腐蚀我们革命群众的？”

“那是人体画，是一门专门的艺术。”画家高高地跪在上面，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狗屁！”

一个专政队员飞起一脚就踹在最底下的那把椅子上。

叠落在一起的四把椅子顿时倾斜、散落，跪在最上面的画家丝毫没有防备，就象是断了绳的沙袋一样，重重地从高处跌落下来，落地时他的下巴正好碰在一把椅子的椅子腿上，椅子腿都被他的下巴撞折了，他的上下门牙也不可避免地折了两对四颗，他的口腔充满了鲜血。

专政队员们又叠落了四把椅子，还是拳打脚踢地逼着他向上面攀爬。

待他费力地刚刚跪在最顶端的椅子面上，一个专政队员又飞起一脚踢散了这四把叠落在一起的椅子。

画家头颈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脚下的水泥地面。

直到画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爬上、跌下，爬上、跌下，再爬上、再跌下时，画家的太阳穴重重地碰撞在一个椅子角上，他跪倒在血泊之中……

画家再也没有力气攀爬了。

画家永远也不会有力气攀爬了。

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跪在自己的热血上，告别了他无限热爱的世界……

几天后，画家的老婆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被抓走的当天，就被“整”死了。她披头散发地跑到县文化馆，死命地揪抓着文化馆长的脖领子，用头使劲地碰撞着文化馆长的胸口，号淘大哭着，她的心中一定非常的后悔。她太相信“组织”了，总认为“组织”会和风细雨地帮助教育丈夫，却万万也没有想到“组织”竟把丈夫“帮助教育”死了……

文化馆馆长在这个小县城的文化人中，可算是一个数一

数二的人物，他绝对没有画家老婆的单纯，他绝对能预测到画家被诬陷成“国民党”的命运。可是，他还是带着画家的老婆一起将画家揭发了出来。

文化馆馆长像一尊石雕一样，任凭画家老婆撕抓他的脖领、像擂鼓一样用头撞击他的胸膛。

他是在谴责自己的良心吗？

他没有留下答案。

几天之后，他也被人咬成“国民党”，也同画家一样，被专政队员活活地折磨死了。

H市的钢铁厂家属生活区里，有一个用水泥和砖堆砌的露天大舞台，在“文革”期间，这个露天大舞台的使用率相当高，几乎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批斗会在这里举行。因为，在那一段日子里，每天都有新的“叛徒”、“特务”、“工贼”、“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每揪出来一个，都要在这里举行批斗大会。

每当声带“刚劲有力”的大会主持人，冲着麦克风高喊上一句：“把走资派×××押上台来！”两个身强力壮的“革命群众”立即就会像揪小鸡一样，把被批斗者从台下揪上台来，揪斗者多是训练有素的人选，把被揪斗者刚带到舞台的前沿，两人的脚尖就会同时动作，准确无误地踢在被揪斗者的膝盖后面的腘窝处，被揪斗者马上会像遭受电击一般，两腿一软一屈，就跪倒在了舞台上。全部过程仿佛只在一眨眼之间就完成了。

如果被揪斗者“罪大恶极”，台下必定“群情激昂”。只要群

众高呼一次“打倒……”揪斗者马上就会像对待小狗小猫一样，把被揪斗者的脑袋死劲地朝他或者她的裤裆里按。围在舞台前沿的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还会从地上拾起一些砖头、瓦块、西瓜皮，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不停地向跪倒在地的被揪斗者，发起一阵阵“袭击”。

批斗大会的主持人，还经常根据被揪斗者的身份、经历和性质，找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或顶在被揪斗者的头上，或吊挂在被揪斗者的胸前。

顶在头上最普通的是用纸糊成的高帽子，最高的纸帽子有半丈高，纸帽子上多是用黑笔写着被揪斗者的姓名，然后又用红笔在姓名上打一个血淋淋的叉字。

还有的被揪斗者被逼着跪在地上顶砖顶碗。H市有一个在职工食堂工作的大师傅，身体又胖又大，体重足足有二百多斤，被人揭发有贪污行为。当时的职工食堂伙食都不太好，许多在食堂用餐的青工就把怨气撒在了这个大师傅身上，他不仅被揪斗，被逼得跪在舞台，有几个青工还跑到食堂抬来了一口直径约有半米的大铁锅，锅底朝上地扣在这个大师傅的头上，这口大铁锅是用生铁制造出来的，少说也得有二、三十斤重，大师傅那颗胖胖的头颅全部都埋在了大铁锅里，几个青工还在外面用木棍不停地敲击着大铁锅的锅沿，大铁锅发出连续不断、震耳发聩的钟鸣声，脑袋在大铁锅里面的大师付，别说他的头顶所要承受的压力，光说他的耳膜所要遭受的刺激，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拴在被揪斗者脖子上，吊在被揪斗者胸前的物品就更多了。

最常见的是写着被揪斗者姓名的大牌子，做牌子的材料有许多，有纸糊的，有木板的，还有铁皮、铁板的。拴系牌子的材料也有许多，有绳子，有铁丝，还有铁链子。最令被揪斗者难以忍受的，就是用厚铁板做牌子，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的那一种。厚铁板的重量不言而喻，厚铁板吊坠着细铁丝，细铁丝就会毫不留情地勒入被揪斗者脖子的肉里。被揪斗者的脖子被勒出的那一圈血印，就像是在战场上被鬼头刀砍了似的……

如果被揪斗者揭发有作风问题，特别是那些女受害人，跪在舞台上，还得在脖子上拴几只从垃圾箱里扒拣出来的破鞋。H市有一个女干部，可能平时风流一些，被揪斗时竟在脖上吊挂了二十多只各种式样的破鞋。有布的，有皮的，还有塑料的；有成人的，也有小孩的，还有一只小脚老太太的“窝头鞋”。这一大串鞋的共同特点，就是又脏又破。

“上帝”赋予人双足的功能和权力，就是载送人体。“文革”期间，H县的一个专政队却将人足的功能和权力无情地剥夺了。

这个专政队在县党校里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班”中长期关押了二、三十位“阶级异己分子”。可能是为了显赫专政队员那种“人上人”的威风，专政队员们勒令“学习班”的所有学员只能跪着行走，而绝不许站立。这所“学习班”足足开设了近一年，在那一年里，这所党校一下子好像变成了小人国的天地。“学员”们长期用膝盖走路，不仅膝盖磨破、磨出茧子，而且，小腿肚子的肌肉都开始出现了萎缩。

在“文革”中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跪刑”。

如“跪炉渣”、“跪碎玻璃渣”、“跪三棱椽子”、“跪汽车轱辘”、“跪铁筛子”、“跪雪地”、“跪烧红的铁板”、“跪钉有铁钉的木板”、“跪地踩腿肚子”、“跪地腿窝处夹三角铁”……

“跪刑”尽管在上古就已出现，“文革”却将它无限地“发扬光大”。

○下辈子也“难以忘怀”的“站刑”和“坐刑”

人们提起“刑法”，恐怕马上就会联想起皮鞭、棍棒、吊绳、铁索等刑具，马上就会联想起杀气腾腾、五大三粗的打手。而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全民皆动员的劫难之中，在一片“红海洋”的浸泡下，人们的想象力异常地丰富，给那些罪该万死的“坏人”施刑，已不完全局限传统的那几样物什，打手也并非全是五大三粗，可能还以戴着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为多……

让受害人的身体长时间地保持一种姿势，就是“文革”期间，那些“白面书生”的打手们，独出心裁地设计的许多刑法之一。

笔者曾采访了许多“文革”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站刑”、“坐刑”等刑法的处罚。

在旧小说中常能读到主子令奴才“罚站”的故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罚站”已经演变成“划地为牢”了。

在Q县有一个被打成“国民党”的老干部，专政队没有动他一指头，却令他站在一个墙角处，一动也不许动，就连“吃喝

拉撒”也必须在原地进行，老干部足足地站立了七、八天，两条腿都站得发肿起来，用手指一按一个坑。最后，这位老干部就地累昏过去，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这种“划地为牢”就已经令人受不了。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专政队员们，还发明了许多杂技团演员遇上了也会汗颜的刑法。

“站滑轮”是将两轮排子车倒翻过来，让受害人的两脚分别站立在那两个滑动乱转的车轱辘上。受害人不小心摔不来，就会饱尝一顿“老拳”，然后，还得接着爬上去，接着“站滑轮”。

“站板凳腿”：把板凳翻倒在地，让受害人站立在两根细细的板凳腿上，而且，还得在头顶上顶砖。Q县的一位体育老师曾创了最高纪录，专政队逼着他站在板凳脚上，头顶十块砖头，足足“罚站”了一上午。

还有的专政队在逼着受害人“划地为牢”时，也不轻易让受害人手脚闲着，不是让受害人手里抬着一个重物（如：几块砖头、大铁锅、铁椅子等），就是让受害人蹶着屁股、两手摸着脚尖，两腿的膝关节不许打弯。

以上这几种“站刑”固然非常难受，那些“白面书生”的打手们所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坐刑”，更是让人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得。

Q县的银行干部李志光自从从“牛棚”中解放之后，就害怕坐在椅子上，上班办公也宁可站着，或是来回走动着，除非是单位开大会，他才万不得已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就是那么一会儿，他那种如坐针毡的难受劲，委实让人看了可怜。这都因

为他在“牛棚”中“坐”怕了。

李志光在刚被抓进“牛棚”时就被迫领教了“猴坐橛”的滋味。“猴坐橛”就是在地面上钉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橛子，令被害人坐在上面，而且双脚必须盘在木橛子上，不许着地。只要脚尖挨上一点地面，就马上得付出几个耳光子的代价。

李志光因为身材很瘦小，尖尖的屁股虽然坐在细木橛子上，尚能忍耐着坚持一、二个小时。一般身体高大胖粗的受害人都木橛子上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专政队的打手们见李志光的身材沾了“猴坐橛”的便宜，这岂不是让“革命”吃了亏。马上就有人又为他设计了一个名叫“坐洋椅子”的刑法。

有一个从小可能学过用藤条编筐的专政队员，从外面找了几根藤条和高粱杆，三下五除二就扎成了一个犹如椅子一样的东西，说是“洋椅子”，逼着李志光坐在上面，而且厉声地告诫他，绝不许坐坏，坐坏就是对抗“改造”，就会用更严厉的刑法“伺候”他。

李志光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只好小心翼翼地在那个“洋椅子”上，蹶着屁股、屈着腿，摆上一付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实际上他的屁股连挨一下“洋椅子”都不敢。完全是一付标准的“骑马蹲裆”式。

李志光没有练过武把式，却在这把“洋椅子”上“坐了”十多个小时。

专政队没有想到李志光的“骑马蹲裆”功夫如此高强，为了拿他开心逗乐子，从此，每天逼他“坐洋子”十个小时……

凡是知道李志光这段经历的人，都会理解李志光为什么

从“牛棚”解放后，在办公室里办公也不愿意坐在椅子上。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李志光的心理恐怕也是如此，见到椅子，就会联想起“牛棚”中的“洋椅子”。

真不知李志光对椅子的恐惧何年何月才能消失。一个人如果在后半辈子只想站着，而不敢“坐”下，这种惩罚所延续的痛苦委实让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

“猴坐橛”和“坐洋椅子”就已经让人“难以忘怀”了。而“坐冷宫”和“坐地老虎凳”就更令人“刻骨铭心”！

地处北国的 H 县，在隆冬时节，半夜去室外撒泡热尿都能马上结冰，如果屋中不生火，室内温度也会在摄氏零度之下。

H 县的造反组织依照“天时”、“地利”，专门设制了一种名为“坐冷宫”的刑法，在三九天，他们在不生火的房中地上，泼水结冰，令受害人解开裤子，露出光光的屁股坐在冻着水晶一般薄冰的地下，而且，还令男女受害人混杂，一坐一大圈，整夜整夜地不许动。最后，受害人臀部的皮肉都与冰凉的地板冻结在了一起，想站都站不起来。

“坐地老虎凳”就是逼着受害人坐在地上，把胳膊和上身全都捆绑在椅子上。或者是让两个受害人背靠着背绑在一起，一绑就是十几天，在 Q 县曾有一男一女背靠着背，一次连续捆绑了数十天，就连吃喝拉撒都不松绑，只是让两位受害者就地“解决”……

○血水飞溅的“学习班”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没有回答。

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

‘说不说？’

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象竹签钉在每一个人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再钉！’

……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凡是拥有正常心理的人，无论是谁读完这一段文字，都一定会心惊肉跳的！

这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是发生在新中国的黎明曙光刚刚闪亮的时候，是发生在人间的活地狱——“渣滓洞集中营”。

可是当神州大地都沐浴在了新中国的光辉之中，竹签子、铁钉子、缝衣针，却依旧随着铁锤的一起一落，深深地扎刺着指尖……

血水依旧飞溅……

难道吃人的魔窟——“渣滓洞集中营”又死灰复燃了吗？
不！

那血水飞溅的地方，却是一处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李爱琴是一位思想非常要求进步的女工，是车间里唯一的女党员，在一次车间的党员会议上，她给车间主任提了几点意见，其中有一条捅到了车间主任的痛处，说他从车间拿铁丝回家，给儿子做鸟笼子。车间主任当时理亏，强压着怒火，没有敢把李爱琴怎么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厂里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个车间主任也成了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目，正巧李爱琴又是他的对立面，他就怂恿手下，将李爱琴抓了起来，专门为她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她关进车间的工具室里，白天让她背语录、学报纸，晚上，“学习班”就变成了“大堂”。

车间主任找来一根五寸多长的大钉子，让手下按着李爱琴，亲自将她的鞋袜剥落，用铁钉象纳鞋一样捅扎她的脚心……

人的脚心是人体的一处大穴，名为“涌泉”，李爱琴的“涌泉”穴不一会就被铁钉捅扎得如同蜂窝一样，鲜红的血液染红了脚下的地板……

李爱琴破口大骂昔日的车间主任，骂他“官报私仇”。车间主任咬着牙，狠狠地说道：“我就是要官报私仇，我要感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你这个混进党内的

小爪牙，还不得飞上天，现在让你连路都走不了，看你还想不想飞！”

说罢，车间主任竟一下将五寸多长的铁钉子从李爱琴的脚心扎透到脚背。李爱琴当时就痛昏了过去。

“找盆凉水来，把她给我泼醒！”

这位车间主任不知是否看过《红岩》这本小说，他简直就与小说中的刽子手徐鹏飞是一母所生。

Q县也有一位女党员因皮肤长得白，也被打成了“国民党”。理由是：“女‘国民党’的皮肤长得都白！”“群专队”将她的衣服全部剥光，用钢锥铁钉在她那光洁白嫩的肢体上使劲地捅扎……

扎她的指尖，就说是“搞尖端”，扎她的乳头，就说是“打井找石油”，最后，这位女党员的浑身上下，被捅扎得没有一寸好地方。全身布满了点点鲜红的血珠，就像是一个血人一样，小鬼看见了都会吓跑的！

岳母为了使儿子岳飞成为国家的栋梁，亲自用针在儿子的脊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

这段典故，成了爱国主义的一首绝唱！

H县的“群专队”显然知道这段典故，他们为了使在押的“国民党”永远牢记住自己的“出身”，竟然也用针在“国民党”们的脊背上纹身刺字。

多数“国民党”的脊背上都刺上了“青天白日”的标志，有的“国民党”的脊背还被刺上了辱骂性的字眼，如“狗日的”、

“王八蛋”等等。

还有一个“国民党”竟被“群专队”在脊背上同时扎刺了三十多根缝衣针，夜里睡觉也不给他拔下，他只能趴在地下睡觉，睡觉时也不敢睡死，生怕不小心翻下身，那三十多根原本扎得不太深的缝衣针，都得“吃”进肉里……

Q县的“群专队”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国民党”，只要一停止给他上刑，他必然就会喊冤反供，“群专队”为了给他一点颜色，竟勒令他剥下裤子，用一根三寸多长的大铁钉子，全部捅扎进他的肛门中……

“人中”穴是人体一处比较敏感的穴位，许多医生在抢救昏迷的病员时，都会针刺“人中”。

H县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面收入了许多“走资派”，这些“走资派”的年岁都比较大，白天晚上连轴转地“折腾”他们，几天下来，他们个个都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为了使这些“走资派”能清醒地反省自己，“学习班”竟发给每个“走资派”一个图钉，让他们按钉在自己的“人中”穴上，一天到晚都不许取下。

一时间，这个“学习班”的全体“走资派”都留起了日本人的“卫生胡”，只不过日本人的“卫生胡”是黑乎乎的一小撮胡须，这群“走资派”的“卫生胡”，却是一颗颗光闪闪的铁图钉……

张大黑是一个司机，被当成“国民党的联络员”抓进了“学

习班”。在“学习班”中，他因受不住酷刑的折磨，几次从“学习班”逃出，几次又重新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群专队”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竟把他的两手按在墙壁上，用两根长长的铁钉穿透手掌、钉死在墙壁上……

“群专队”员还将他的裤子剥下来，用一根钢针，使劲地捅扎他的睾丸……一边扎、一边问他还“逃不逃？”

张大黑是一条汉子，他的两手被钉在了墙壁上，他的一对睾丸被扎成了一对血球，他仍旧怒瞪着双目，大声地回答：“逃！只要打不死我！”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有一部发行量上百万的著作，名为《魔鬼的盛宴——侵华日军 731 部队罪行纪实》，此书用大量的证据无情地揭露了七三一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为了能提早生产出大量的细菌武器，曾以三千名俘虏为对象进行非人道的活人实验的内幕。731 的魔鬼们，将抓来的俘虏称作“马路大”，在他（她）的身上接种各种毒菌、毒素……

在 Q 县的“群专队”竟也出现了 731 魔鬼部队的后来人，还是那位长着一颗魔鬼心肠的外科医生，他把注射器这个用来医治疾病的器具，也当成了刑具使用。

Q 县的“群专队”在一九六八年关押了大批“国民党”，并对他们施以了许多残无人道的酷刑，在受害人的身体上，留下了许多开放性的伤口，伤口得不到医治，就会感染化脓，那个外科医生竟用注射器从伤口里吸出充满细菌的脓血，然后，再注射到其它受害人的身体肌肉中。

这个外科医生不仅疯狂地用现代医学器械迫害同胞，而且，他对自己这些惨无人道的手段，还十分地津津乐道。他把自己发明的往人体里注射化脓血水的酷刑命名为“细菌战”。并作为一种重大发现，专门报告给他的上级，用丑恶的残忍来为自己的飞黄腾达邀功纳赏。

革命英烈江姐受困的“渣滓洞”，有血水飞溅的竹签钉指……

“文革”中的“学习班”有……

假如《红岩》中的徐鹏飞能认识那位新中国的外科医生，他是不是也会要吓破了胆！

○“文革”的医院

——冤魂的“屠宰场”

“治病救人”本是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

在“文革”这个非常的岁月里，医院却将“地、富、反、坏、右”们关在了大门之外。

好似“地、富、反、坏、右”的体内流淌着的不是红色的液体，而是黑色的墨汁。

血管中流淌着黑色墨汁的人怎能还去救？

白衣天使变成了“屠宰场”里的屠夫！

拎着菜刀闹革命的贺胡子——贺龙元帅，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却被“自己人”送进了“医院”。

一座名符其实的“屠宰场”！

1967年北京街头的宣传车上，突然打出了“打倒贺龙”的巨幅标语。红二方面军被诬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

林彪在一个会议上，给贺龙扣上三顶帽子：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

贺龙被囚禁起来。

他囚室的代号是19号。

贺龙患有糖尿病，特别需要水。但却整整四十五天不给供水。

那些日子，贺龙常常扑到窗前，撩起窗帘，向着天空张望。见天上有几块云彩，就高兴起来；遇到下雨，就把水盆、脸盆，水杯全用来接雨水。

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贺龙端着一大盆水跨上台阶，忽然脚下一滑，扑通摔倒在地上，扭伤了腰。

“四人帮”妄图通过断水，来加重贺龙的病情。他们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也要从肉体上把他彻底消灭。

囚禁中，由于饥饿，营养不足，致使贺龙的糖尿病出现失控。

1969年6月8日，贺龙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糖尿病酸中毒症状出现了。

监护他的医生只给贺龙打一针“止吐针”，未止住呕吐；晚上又来了两个医生，没有做任何检查，匆匆给贺龙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吊上瓶子就走。“专案组”在屋外掌握着这次“救治”，每一步治疗都得“请示”。

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2000CC！

6月9日下午，贺龙死去。

他死的时候，血糖 1700，是一个比正常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贺老总死于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

在一片打倒“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的声浪中，他被折磨了两年半之久！

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文件，只能去告慰他的冤魂。

○一幕“假验尸”的丑剧

张国士是 1937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先后当过联校校长、区长、副科长、科长、处长，1958 年调任山西长治市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所以到 1966 年“文革”爆发时，他是一个标准的当权派。1967 年 7 月，他被造反派当作“走资派”揪回公司进行审查。主谋者是他的同事、原公司党委副书记，两人在工作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对立情绪十分严重。故而，张国士请求市委暂借调他到另一单位工作。没想到，他被揪回来了。

当时，晋东南的派性斗争演变成大规模的武斗，一直持续到 1968 年 3 月才平息下来。但对张国士的审查升级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被突然关进囚室，随即审讯开始了。

“说！你是不是富农分子？”

“不是！”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张国士的回答很干脆。

审讯者见他态度强硬，无计可施，说了一句：“走着瞧。”又把他推回囚室里去。

他们派人到张国士的家乡武乡县索取“富农分子”证明，

但得到的回答是：

“张国士家庭成份是上中农，根本不是富农。”

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们最后在县敌伪档案中找到一个在押犯的供词，而这供词早已被证明是假供。但对于要置张国士死地的人来说，有供词就足够了。

张国士又被押过来，被要求交代参加国民党的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张国士理所当然地予以否定。

这使迫害者们极为恼火，他们凑在一起商量：“张国士不说，你们就叫上几个人美美地收拾他一顿，不给他加点压力是撬不开口的。”

晚上，张国士被架到市建公司俱乐部的舞台受审。

又是恶狠狠的质问：

“张国士，你什么时间参加的国民党？介绍人是谁？”

“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张国士还是那句话。

于是，毒打开始了，几个人操起木棒和钢筋棍对他轮番猛抽。

张国士身上旧伤未愈，新的创痛几乎使他昏过去，他一直咬牙挺着，站着。

一个审讯者高高举起钢筋棒照准张国士的右小腿猛力抽下去。

“啪”一声，张国士跌摔在舞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随即，他被拖回囚室，又遭到一顿毒打。

几个打手见张国士没有任何反应，身子软绵绵的，一摸心口，已经没有心跳了，才慌张起来。

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他已经被关押了三个月。

经过一阵紧张的密谋以后，他们伪造了张国土悬梁自尽的场面，第二天，叫来公安局法医进行假验尸，以自杀定论。

中午时分，市建公司院内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阵吼声：

“国民党、富农分子张国土畏罪上吊自杀，死了活该！”

“走资派张国土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相同内容的标语很快出现在公司大院和长治市街道上。

随之，《张国土罪行展览》拚凑开张了，更为恶毒的是，张国土的爱人和年幼的独生儿子被强行遣返武乡县农村，以防他们申诉。

通过各种渠道，全市群众也得到警告：“为国民党、富农分子张国土鸣冤叫屈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975年4月，张国土案件复审，开棺验尸报告写道：

“左右肩胛骨各有四十至五十毫米长的裂纹一道，右小腿腓骨膝关节以下五公分处有三公分长的斜形断面，并有两块小散骨，形成粉碎性骨折”。

○喉管在临刑前割断

这是一位党的普通宣传干部，举止娴静秀美。她曾经被“文革”的浪潮卷入进去，曾经以激昂的热情批判“走资派”。然而很快，她被满目的混乱惊呆了。1967年1月，在东北工院校园发生了万人大武斗随即蔓延到全市。美丽的南湖树林突然冒出许许多多的新坟头，那里躺着的是曾经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耳边枪声不断，城内硝烟弥漫；她所敬仰的省委书记被挂起牌子、戴起帽子，搞喷气式，残酷揪斗。会议刚完，浓烈的斗争气氛还没有消散，就传来这位女党员的失声痛哭声：

“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做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些错误，是否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这些话是她与同志们谈心时说的，毫不隐瞒，随后，她随着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她的这类言论越来越多，她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避什么人。她说：

“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

好心的同志私下劝她：“张志新啊，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是‘反革命言论’啊！”

但她的回答是坚定的：

“这个闸我不能刹！你看看我们伟大的党被践踏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

张志新的言论早就被注意了。随后在“整党”过程中，她被排除在外。她哪里知道，她因言论而被立案审查了。

1969年9月，毛远新亲笔签发了对张志新的逮捕令。9月24日，秋风萧瑟，人们被召到广场，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志新被两个大汉抓住头发，双臂背扭，但她神色坦然平静地听完宣布，挣脱开揪她的人，跨前一步，毅然伸出双手，镣铐“咔”地戴上了，她是以“现行反革命犯”罪名被逮捕的。会场边停着的那辆草绿色吉普车将把她带往哪里呢？

在审判室，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9月24日批斗后逮捕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

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根儿到底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一来一往，针锋相对，最后审判员写下如下结论：“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

于是，新的审判员就出现了：

问：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

答：这是我的看法，不是反革命行为

问：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答：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问：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答：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问：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答：离开党，谈不上个人的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严厉的刑罚降临到这位女共产党员身上了，她被指定扎鞋口，每天定额是 1200 双；她被戴着背铐达一年半之久；她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旁观死囚的枪决……

但是，她的意志没有垮。她在学《毛选》笔记中写道：“两个家庭加起来 21 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在狱中度过了数个春秋，到了1975年这个严酷的春天。毛远新看到张志新的材料，说道：“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捣乱一天，杀了算了。”这位省委书记下令法院办加刑手续，走过场的审判结束了。张志新被从15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而且不给上诉期，第二天就执行。

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几条大汉突然扑了过去，将她按倒在地，雪白的手术刀无情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涌了出来。被匆匆包扎以后，张志新被推上囚车，呼啸着向市郊牛官屯刑场驶去。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张志新无法开口说话，但她的内心在呼喊：“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的人？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的人！”

枪声响了。

张志新缓缓地、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

她的秀丽的双眼没有闭上，也永远不会闭上。

她的遗体被肢碎，肌肉从骨骼上剔尽，留下一具骨架，做成了医学标本。

○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

湖南道县。

1967年8月26日夜。

黑漆漆的夜，仿佛是巨大的黑洞，张着大口，随时都想吞噬什么……

湖南道县源山沟，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前一天因出身

地主被“造反派”带走了。家里只有她和三个孩子。她哄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她唤起来，没等她穿上衣服，门便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

他们进屋就吼叫着：

“起来！起来！开会去！”

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几句便被拥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持枪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及其子女，共14个人。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勒进肉里。

他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押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领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来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往前走。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捆着，孩子们只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

来到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

“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骇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将人推入那深不见底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过去。……

“蒋汉正！”

支书唐兴浩点着周群丈夫的名，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哭叫着，她想扑上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 60 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哪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让吃三个热包子呢！”

没人理他。

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哭得极惨。

她走到硝眼洞口，凉风嗖嗖，阴气逼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命令着。

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连同另外一位 4 岁女孩子一齐被扔下

硝眼，因为已扔下好多人，摔在了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周群连忙低声说。她大女儿帮她解开捆手的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也未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溶洞。但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救溶洞内的活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她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处满地尸体，但他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内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要睡一会儿也只能在死尸上。丈夫被铁丝捆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脏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首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象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一点，哪有什么高粱，咱们是在硝眼里。”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没有声响了。周群8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

“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已无济于事。不过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

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咽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硝眼。

她在硝眼里，度过了七天七夜！

她是个从地狱返回来的人。一身血污，还不断遭追捕……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联”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民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钏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井里用火活活熏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切指、断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闻！

上述周群死里逃生的一幕只是个小场面。

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中国的传统“国粹”——“游街示众”

“刑人于市”是中国古之通法。

北京的闹市——菜市口，就是古代“游街示众”的刑场。

古代刑人，都必须“明梏”，也就是标明犯人的罪名“游街示众”。起先是在犯人所戴刑具上写上罪名，后来演变为把书写犯人姓名和罪名的纸条系于竹竿，插在犯人背上。对死刑犯

不论男女，往往要裸刑（剥光衣服），据说是为了施刑处死的方便。这一点我们从《水浒传》中的有关描写、元曲《窦娥冤》的木刻插图及清末秋瑾烈士在临刑前提出不准去衣的要求中均能得到印证。在“游街示众”中，还经常要带上一些“陪绑”者，为的是“俾之怵目警心”。

唐武则天时，郝象贤在“伏诛”前，“言多不顺”。于是，以后在处决要犯时，为了防止其借公众聚观处刑之机散布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又增加了“木丸塞口”、“以麻核桃塞口”等等卑劣手段。

中国人十分喜爱聚观“游街众示”。1928年2月，鲁迅在《申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湖南长沙残杀共产党人（其中有女性）而市民群相围观的通讯时，特写了《铲共大观》一文，他在愤怒抨击反动政府残忍行径的同时，不无悲慨地指出：“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工，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了或耳闻了好几次了。”鲁迅在《坟》中还沉痛地说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悲壮剧；如果显得骸骨，他们就看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的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中国人不仅喜欢看杀人，而且还争抢着吃蘸着人血的馒头。当人头落地的刹那间，许多看客一哄而上，拿着早已预备好的馒头，争先恐后地向断颈上正在喷洒的热血蘸去。据说这

种馒头可以治痼病。

刽子手固然凶残。

而那些争前恐后的看客们呢？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股“十二级台风”一样，疯狂地虐暴着神州大地。“批斗揪斗”、“游街示众”乃至“游尸示众”一下子在“看客们”的手中复活。成千上万的“牛鬼蛇神”一下子都被“看客们”押到了大街之上。

牛鬼蛇神泛指“文革”中所揪出的一切“阶级敌人”。内容包括——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资本家、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变色龙、小爬虫、阶级异己分子、黑线人物、里通外国分子……总之，这个词包罗内容十分广阔，可谓内涵丰富，用途极广。随着“革命”的深入需要，该词语的内容尽可无限伸延。“牛鬼”一词，古来有之，指传说中牛头马面一类的鬼类。然“文革”中牛鬼之称，一开始便被借用，乃至《人民日报》的社论也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又与“蛇神”配套使用，这才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使用。自此，这本用于指传说中子虚乌有之物的词语，一时间成了“文革”中一顶至为厉害、可以剥夺人生存权利在内的一切权力的“法外罪名”。当时揪出“牛鬼”之多，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阴国”。过去有人叹喟：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文革”中又有多少人复变为鬼？难道冥冥中真有“轮回”之天意？其实，若用历史和理性眼光审视这一惊人的相似的历史与“轮回”现象，便可以看出：建立在长期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深层文化、政治传统，在“文革”这一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总爆发。它有内在因果，却无“轮回”的宿命。

游街示众，是对“牛鬼蛇神”批判斗争后的“专利”。“牛鬼蛇神”头戴高帽子（有的高帽扎得别出心裁，真似牛、鬼、蛇、神样子，又有的在高帽子里加铁板，硬往头上戴，又紧又重，戴者苦不堪言），脖子上挂黑牌子，自己敲锣，数说自己的“罪行”。有些被指控犯男女作风问题者，则在脖子上挂一串破鞋。看外观即基本知道是啥罪行。称得上是化妆游街，制造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

对不老实的“牛鬼蛇神”，往往要“加工加工”。内画是开批判会前或游街前先给点武力威胁，压垮你的精神，上台或上街后老老实实，“革命群众”让你咋你就咋。

“游街示众”已成为“文革”狂潮中一种时尚。哪里有“游街示众”，哪里就有流血：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毒打致死，身上有32处伤痕；

1966年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在长春市游街示众；

1966年12月25日，白发苍苍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批斗，然后游街示众；

罗瑞卿，纵身跳楼，偏未陨命，被高位截肢后用箩筐装着拉去游斗……

J县一位县级领导干部，“文革”开始后便被揪了出来。批判一浪高过一浪。帽子越来越大，最后，被诬为“国民党”。

他被关进“牛棚”，随时听候审讯。

对他如何施以酷刑的，不得而知。进“牛棚”没几天，他便含冤自尽了。

他的尸体是在一口废弃的小井里发现的。

家属听到他的死信，一家人悲痛欲绝，敢怒不敢言。

家人找了一辆排子车，将尸体拉回埋葬，谁知在往回拉的路上，让一群“造反派”给截住了。

“×××死了？”他们望着尸体，似乎还不相信。

家属只有泪水相答。

“自绝于人民，是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叫喊着，又给死人扣顶帽子。

“不批便宜了他，游尸！”有人叫着。

就这样，“造反派”硬逼着家属拉着尸体又去游街。家属含泪在前边拉着排车，车上是冤死的亲人。

身后，一伙丧心病狂的“造反派”，举着拳头，边走边呼口号：

“自绝于人民轻如鸿毛！”

○“文革”的“专利”——

阴阳头和喷气式

阴阳头可算是“文革”的一种发明“专利”。在“文革”中被十分广泛地使用在“牛鬼蛇神”们的身上。是一种极其侮辱人格的处罚。

无论“牛鬼”是男是女，或老或少，当时，只要“革命群众”认为是“革命需要”，便可以将“牛鬼”的头强行按住，剃去一半

头发，留下一半，理成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奇特发式。哪怕平日形象再端正之人，一蓄此头，形象便遭大损。“文革”中发明的这种一边黑、一边亮的发形被称为“阴阳头”。真可谓别出心裁，独具一种社会政治功能。使“牛鬼”见不得，或见了就惶惶避开，从而达到防止“牛鬼”“乱说乱动”的特殊效果。更不便跑出去“煽阴风”“点鬼火”，保证我“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文革”中某学校一“牛鬼”被揪出后，剃了“阴阳头”，无端遭此大辱，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几天便成了个痴痴呆呆的疯人。某单位一位女“牛鬼”被剃“阴阳头”后，半边头发披散，半边头皮锃亮，一副残相。路人过而不忍目睹，亲生女儿见面亦不敢上前相认。自然与之“划清了界线”。该女孤愤难言，终择轻生之路，悬梁自尽。一位世人写道：一从剃度阴阳头，自难久为阳世人。闻者无不潸然泪下。

“阴阳头”在古代刑法里是没有的，剃“阴阳头”不痛不痒，免受皮肉之苦，但其巨大的精神摧残力比之皮肉之刑残酷得多、厉害得多。

喷气式，本是一种飞机机形。“文革”中经某人“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用于“革命实践”，遂成为揪斗“牛鬼蛇神”或游街示众时一种最常见的刑罚。两彪形大汉，怒目圆睁，奋力将“牛鬼”两臂反扭向后，再用力扳直，紧揪其头发，尽力将头往下按，摆作一机翼后展之喷气式飞机俯冲状；有时紧揪其发、领脖，用膝盖猛力顶其腰眼或臀部，尽力反扭其臂，猛向后拉，使其如一机翼后展仰飞之喷气式飞机状。该刑罚是以形体命名的。“文革”中，但凡被打成“牛鬼”者，大多领教过此刑罚。在

名目繁多的各类刑罚中，喷气式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施加在心灵上的酷刑。

有许多酷刑的结果并非只是达到肉体上的疼痛，对心灵的折磨有时要比对肉体的折磨还要令人难受。

“文革”中，在“牛棚”里就出现了无数针对心灵的酷刑。

“牛棚”是在“文革”中产生的一个怪胎。是当时民间广泛私设带有监狱性质的关押“牛鬼蛇神”的处所。

“牛棚”，一般选择废弃不用、残破不堪的简陋棚屋，或非常阴暗潮湿、形同囚室的房间。为“有利于”监督改造，“牛鬼”们一般不准睡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全部集中睡通铺、地铺之上。“牛棚居民”外出参加如牛负重般的劳动改造，晚上回到“牛棚”写检查、交代、汇报。或在“牛棚”召开大批判会，互相批判、揭发。这样互相间“狗咬狗”很有好处，可起到分化瓦解“反革命营垒”作用。在“牛棚”里，一切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无条件执行。早上起来，首先虔诚地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数说自己的罪行，表示悔过自新的决心，然后才可去领饭；晚上，要向毛主席老人家汇报思想，汇报认罪态度，汇报白天劳动改造的心得体会，然后方熄灯就寝。“牛棚”虽旧，棚规却严。不准私自回家，不准对外事连，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不经允许，外人不得进入“牛棚”。“牛棚”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私立监狱”。沦为“牛鬼”即非人，便得忍气吞声过这样非人的“土劳改”生活。

巴金，中国当代的文学巨匠，他的《春》、《秋》、《家》打动了

多少人的心灵?“文革”开始,巴金已经62岁了,他没能逃脱那场灾难,在漫漫炼狱中,经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和折磨。

1966年夏,巴金是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他在北京开完会后,刚回到上海,立刻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

上海作协的“牛棚”,是原来的资料室。两间阅览室连同一条长长的走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牛鬼蛇神”。巴金坐在阅览室里,阅读《语录》时的态度十分认真,还朗朗有声。他对分派给“牛鬼蛇神”干的体力活,都是干得很认真,不偷一点懒。打扫花园,擦玻璃……在批斗会上,对那些“上纲上线”到可笑程度的批判,也点头默认。他的主要罪行,是1962年5月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的一篇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

1967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一月暴乱。这是“造反派”的一个“盛大的节日”,他们用骇人听闻的卑鄙手段夺取了政权,而且对被他们诬称的“反革命黑线”施行法西斯暴政,小小的上海作家协会自然在劫难逃。

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者越来越多,小小的作家协会真谓是门庭若市。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喊叫着,提出的要求几乎是相同的——批斗“罪行”严重的“牛鬼蛇神”。曾以自己热情澎湃的作品哺育并感动过千万读者的巴金,自然是众矢之的。其实,内中不少是慕名而来,想借机一见这位大作家的。被“提审”被“围斗”次数最多的,当数巴金。

整个作协已经变成一个大字报的世界,从三楼的楼梯口挂下好几幅长条标语。一条是“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另一条是“彻底批判邪书十四卷——《巴金文

集》”。各种批判会上，大报小报上，尽是声讨“无产阶级专政死敌——巴金”的文章。对巴金的批判一天天频繁起来，还开了个全市性的“电视批斗大会”。又被拉到复旦大学去批斗。巴金妻子肖珊也被拉到机关，关进了“牛棚”，不但批判巴金，还批判“黑老K”的“臭婆娘”。“造反派”还让几十个“牛鬼蛇神”跪成一圈，将巴金这个“黑老K”围在中间。多么巨大的精神摧残！

每个“牛鬼”左胸前还发了个小牌，上写“牛鬼蛇神×××”。这个小牌不许摘掉，也不许拿在手里，只能戴上。发现谁不戴，铜头皮带抡起来一顿猛抽猛打。巴金也佩带符号牌挨斗、劳动、写交代材料，随时接受外调人员的“提审”。

后来，巴金被下放到郊区劳动改造，大田活，分配你干啥就干啥。还经常在田间举办“地头批斗会”。巴金是重点批斗对象，不仅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尤其是他还写了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小说”——《家》。

在郊区劳动，还得经常被押回上海批斗，今天这个工厂，明天那个学校，因为巴金放的毒多，“消毒”任务也就特别大。“文革”运动伊始，巴金对待批判的态度是：良药苦口，却能治病。直到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那是对他的“精神折磨”，只是为了“消耗他的生命。”在炼狱中，巴金奋斗的火焰非旦没熄灭，反而越来越炽热。在“牛棚”里，他口袋里偷偷装上一小册字典，诵读西班牙文。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续译《往事与随想》。

有一位被关押在“牛棚”之中的“走资派”，每天都要带领

“牛鬼蛇神”“早请示、晚汇报”。

什么叫“早请示，晚汇报”呢？就是早起一睁开眼，先洗手洗脸，整整衣冠，手捧64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请示、交心、宣誓，并且嘴里念念有词：“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无限热爱您，我们一定要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现在还有私心，还想吃得饱一些，穿得好一些，还不想吃苦，还害怕牺牲，我一定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光说不算，请看表现！”如果是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历史问题，还要在监视人面前，对着毛主席像坦白。忙了一天，到晚上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汇报一天的工作、改造情况，表示惭愧和忏悔，嘴里念的要因人而宜，不断地随时改动。

“三祝愿”呢？就是早晨、午前、午后上班之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祝愿他们万寿无疆，身体健康。

开始时很简单，一个人或一伙人立正站好，对着领袖彩像，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个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词语是这样的：“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着最后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还要前后摆动。

后来呢？就不这么简单了。为了表示忠心、敬仰，就自由发挥，创作祝愿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前面加上很长很长的修饰语。谁加的修饰语多，说明谁对领袖忠心耿耿。

那位“走资派”是一个喝了不少墨水的“文化人”。为了表忠心，为了早日赎罪，他在领头“早请示”、“晚汇报”时，曾经创下了一条最新“吉尼斯世界记录”。

每天在“牛棚”中“早请示”、“晚汇报”时，都是由他站在队列前，高高摇动着“红宝书”，大声地念道：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党我军的缔造者，马列主义的传播、继承、发展者，革命火种的点燃者，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安源暴动的组织者，红色政权的创建者，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反围剿胜利的指挥者，万里长征的发起者，北上抗日的决策者，韶山升起的红太阳，中国革命的指路灯，人民心中的北斗星，干旱天气的雨和风，三座大山的掘墓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社会主义革命航船的好舵手，社会主义建设大厦的总设计师，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对林彪呢，也是复述其光荣历史，并加上“最最亲密的战友”之类。这样，念慢一些，大家再重复一遍，既表示虔诚，又可让大家多休息一会儿。

不过，他念的还不算长，听说有的地方能一次祝愿一、二个小时哩！

○母子命运竟天壤之别

人的命运的内涵其实很简单：生死、富贵及一切境遇。
谁主宰命运之神？

他曾辗转走过不少单位，一直是无名小卒。突然有一天，他作为统战对象被结合到县政协当上一名县政协副主席。政协副主席虽不是大权在握的人物，但也是副县级，也是很炫耀

很光彩的。他回忆自己的人生境遇，如坠梦中。

他曾背着“国民党”的狗崽子的臭名，频遭世人的白眼。

“十年内乱”结束后，县里组织编纂组织史，请回众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凑到一起回忆往事，自然一个个感慨万千。当回忆这个县的党的组织发展史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子。这个人不是名牌“国民党”吗？和共产党能有啥联系？

历史公正无私地重新摆到人们面前。众多人的众多回忆，终归还是有说服力的。给这个受人唾弃多年的名子上频添了道美丽的光环。

地地道道一个统战对象。

可他远在台湾，算来在国民党内，也堪称元老。据说还曾是“国大”代表呢。现年事已高，早从政界隐退。

于是，幸运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他是那个受唾骂多年的“罪人”的长子。

现在，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县里的大型会议上端坐在主席台上，可以坐着政协的小卧车下乡下村调查访问， he 可以和颜悦色地与同事们、与街坊邻居谈笑。抛开政协副主席的头衔，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公民，而不是“狗崽子”、“二等公民”。

通过全国政协的联系，他与兄弟、妹妹终有机会赶到香港，与阔别四十多年的父亲团聚一堂。

他无富贵而言，但能光明磊落作人。他有喜，也有悲。
是谁主宰这人间的悲喜剧？

她母亲的命运，却是部血与泪的悲剧。

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养儿育女，烧火做饭，几乎不知“政治”是何物。

丈夫离家出走，去哪里？她不知道，何时回来？更是茫然。她带着孩子艰难度日。

几十年不得丈夫音讯，生死两茫茫。

然而，“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强台风，还是将她裹了进去。一顶“国民党臭婆娘”的帽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逼她交代“国民党”的罪行，她能交代什么，一个妇道人家。

凌辱、谩骂、脏水，一古脑儿向她身上泼来。更使人心碎的是要她挂上黑牌子，押进“牛鬼蛇神”的队伍，出去游街示众！

一个妇道人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更不清楚安安静静的社会为啥突然发生了这样的巨变？她只懂得“树要皮、人要脸”的浅显人生哲学。有什么比游街示众更大的耻辱呢？她知道自己委实交代不出什么，这种人格凌辱何时是了？

不如一死了清。

当一个人下了死的决心，一定经历了最复杂、最痛苦的自我较量。人死了，痛苦、侮辱便解脱了，一了百了，求个永恒的安静。

于是，当游街游到滏阳河大桥时，她发疯般地冲出“牛鬼蛇神”的队伍，投入浊浪滚滚的滏阳河中。

浊浪立刻淹没了她的身影。一个冤魂就这样匆匆踏上了冥冥之中奔向天国之路……

母子俩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天壤之别？

他是冤魂的儿子。

她是那幸运者的母亲。

○“国民党”健身操

在 M 县,专政人员对“国民党”却表现出一种“关心”来。专门为“国民党”编了套广播体操,让“国民党”们锻炼身体。请看内容:

“国民党”健身操

口 令	回 答	动 作
起立 低头 弯腰 跪下 半蹲 拱地	一切行动听指挥 低头认罪 劳动改造 为“国民党”效劳 彻底失败 打翻在地	马上立正 将头低下 腰弯成 90 度 跪地下,两手作揖状 腿半蹲,作举手投降状 旁边专政人员上来,一个 个将“国民党”用脚踹倒 在地,头必须触地,作拱地 状。
再踏上 一只脚 坐下	永世不得翻身 遵守纪律	打手猛冲过来,一顿乱打 以最快速度从地上爬起来, 立即坐好,打疼了也不 许出声。
不许动	动一动要了命	立起来,站得笔直

做着这套广播体操,果真能“强身健体”吗?

否。

它是嘲弄、是戏谑,是恶作剧,“造反派”以此取乐。做这套

不伦不类的“健身操”，心灵的苦涩、精神的摧残打击，不亚于过一次“堂”，受一次刑！

第三章

血淋淋的“忠”心

●母亲将儿子送上黄泉路
●他亲手挖出自己的心●她怀揣着一颗赤胆忠心●“炼狱”中的铮铮铁骨○以死喊冤的一家七口○他在遗诗中向“老人家”献上一瓣心香○秋头只当风吹帽○她为真理而活着○被死神拒收的“昔日宠臣”●共和国主席饱尝臣民的“老拳”●昔日横刀立马今日含冤九泉○从掏粪工人到“工贼”○翻译家的悲剧○“人民艺术家”老舍惨死

传统的儒家学派的精髓，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礼、义、仁、智、信。千百年来，寥寥一句话四个字，竟如盘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三纲五常旨在突出一个“忠”字。

今山西省介休县是为纪念介之推而得名的。民间的寒食节(清明)传说也是为纪念他的。介之推是春秋时晋国的贵族，曾辅佐晋文公重耳，并随文公流亡国外。传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让重耳食用之，以解饥渴之困。晋文公回国后，赐赏臣属，没有赏到介之推。介之推携母隐居绵山中。晋文公有一天突然想起介之推，派人四下寻找，只知他隐居绵山，却找不到人踪。文公无奈，放火烧山，以逼介之推出山。介之推因不愿出山而被活活烧死。晋文公下令，在介之推死的这天，禁止烧火做饭，沿袭成寒食禁火的习俗。

介之推对晋文公的崇拜和忠孝，割肉相食，可谓忠诚至极！

汉书《苏武传》载道：苏武出使匈奴，单于欲劝降苏武，“乃幽苏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皮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段文字，叙述了苏武陷身异国谪居他乡的困苦及坚守节操的艰辛。这种坚贞的气节可谓对汉朝皇上的无限尊崇。

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个镜头，溥仪让一个太监当众将墨汁喝下去。太监毫不犹豫喝吞下墨汁，弄得满嘴黑乎乎的全是墨。

翻开历史的画卷，此种忠孝节义的例子，俯拾皆是。

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忠包含着没有二心，唯命是从。正确与否，没有丝毫思考余地，要无条件地孝忠。

青海藏区一户虔诚的佛教格鲁派信徒，当得知班禅大师圆寂后，一家五口幸福地自杀。他们铭记着先祖的遗训：当一个圣人死去的时候，你就带领全家自杀，这样你和家人就会成为圣人的仆人，跟随圣人一起进入最美妙的地方——天堂。这是佛教徒对宗教神灵的崇高忠诚。

据一县志载：有妇年方十九，丈夫外出经商，她厮守空门，足不出户。一日，一歹人越墙而入，百般调戏，企图施暴。幸逢邻家老嫗前来叩门，并大声呼唤，歹徒见有人来，急慌慌又越墙逃走。次日，家族中妯娌前来串门，只见少妇已悬梁自缢。

这位少妇以死守节，堪称节妇烈女。于是，从家族到村镇，一扫悲凉，为出了这样的节妇而自豪，赞颂美溢之词不绝于口，并为其修贞节牌坊，留名百世。

这是对丈夫的绝对顺从和依附。

纵观悠悠历史，有多少忠孝节义故事，就有多少血和泪。

说到忠，人们习惯而自然地把它与愚昧联系到一起，这并无道理。拜物、偶像崇拜到癫狂程度，本身就暴露出一种无知和愚昧。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忠”字活动，以及那股偶像崇拜的狂热，纵观历史，加以比较，已远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更有许多前无古人的创造。

崇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层出不穷的。“红海洋”、“语录不离手”、“忠字满墙”、“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连打电话，也要先背语录。

形式是这样的：

“要斗私批修，是总机吗？”

“为人民服务，你要哪里？”

“要拥军爱民，我要××××。”

“备战备荒为人民，请讲。”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是××，有这么个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你说吧……”

这一切的发明者是谁，无从考证，“功劳”应归于那个令人浑浑噩噩的癫狂时代。

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令人深思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进攻华北，到处烧杀抢劫，推行残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一天，几个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拿抓来的几十个中国老百姓打赌。看这几十个人有没有敢逃跑的。一方说，谁敢在枪眼下逃走？一方说，有人敢！

打赌开始了。他们将这几十个老百姓赶进一道地沟里，将捆绑的绳子解了。他们一枪一个，眼看枪杀完了，果然无人敢于反抗逃跑。就在打赌的一方正得意时，一个青年跳上沟沿，挣扎着朝高粱地跑去。他的身后，打赌的另一方发出一阵狂笑：“还是有人敢逃跑呀！”

读到此处，你的心绪能平静吗？

胆小、懦弱早已溶进民族的血液中。

愚忠，是胆小、懦弱的精髓。

●母亲将儿子送上黄泉路

母亲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纯朴、善良、勤劳、节俭……是赞颂母亲的溢美之词。在那疯狂的年月，却有一位母亲，将亲生儿子送上了黄泉路。

是残忍还是愚昧？

他是一位公社书记。

家里人对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临终前告诉家人的。

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M县清查“国民党”的十二级台风刮得山摇地动，他突然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他急匆匆赶到县里，哪里是开会？到县里就被关押进群众专政组，先用“温火”对皮肉略加了点工，勒令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

自打清查“国民党”的台风刮起，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听说先“下水”的同志不少人受刑不过，乱说乱咬。他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不少，谁能说清没人咬他呢？只要有人受刑不过，一提及你，你就得“下水”。现在真的轮上他了。专政组没有逼他去咬别人，而是逼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

他跟本没有藏匿什么“国民党档案材料”，拿什么往外交呢？

不交就是不老实，就是抗拒，就是顽固不化！

审讯室里，他被蒙上了眼睛。只觉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一阵皮鞭抽过来，他慌忙躲闪，迎面又是一顿乱打，往哪里躲哪里有人用皮鞭抽打。这种刑罚，名曰“打瞎子”。皮鞭抽打还是轻的，不承认再用扁担打。腰、两肋、四肢，留下道道伤痕。最后再来个“猪拱地”，一位壮汉提起他的双腿，让他头触地，由壮汉推着朝前拱……一连四天受刑，他实在受不了，趁看管不紧，逃出专政队。

他不能回公社，更不敢回家。他蜷缩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又渴，浑身伤口针扎般疼。好容易捱到天黑，忍痛忍饥朝姨姨家赶去。不巧姨姨家没人，不得已，摸黑朝自己家赶去。

后半夜时，他敲开了自己的家门。当一家人见他一身破烂裤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惊呆了。他撩起衣衫，露出浑身血疤，一家人立即哭成一团。

“孩子，你犯了啥罪？”

“娘，我没犯罪呀？我从小跟着你讨荒要饭，十八岁入党，我怎么会是‘国民党’？我根本没见过什么‘国民党’的档案材料。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这浑身的伤啊！……”

妻子一旁伤心地说：

“你咋不找领导说说清楚？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个解放军，你就去找他，找解放军！”

“找？去哪儿找？咱被打成‘国民党’，能见上面吗？打得实在受不了哇！……”

一家人抱成一团，哭又不敢大声哭，怕被外人听见，只能饮泪抽泣。

天亮了，怕被人发现，先躲在兄弟家里。

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旧社会逃荒，曾领着四个孩子要饭到他乡。大女儿卖了，换下点粮食，又让兵匪抢走了。若不是翻身解放，也许这个家庭早不存在了。眼见着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儿子前思后想之后，按照妻子的提醒，给县革委会军代表写了封信，先下点“毛毛雨”，听听动静再说。信写好，不敢在当地产，让两个女儿跑了四十多里地，在邻县一个邮电所将信寄

出。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眉愁不展，苦苦想着办法。

母亲老泪纵横，恳切地对他说：

“孩子，你不能这么躲在家里，人家知道你跑了能不四处找？找到家咱说啥？躲不是个法子呀！没有共产党帮咱们翻身解放，就没咱这家人。你要相信党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胡说，党也不会冤枉好人的！”

“娘，我相信党！”

“孩子，这就对了。”母亲开导着他，“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在党，要相信领导，我看你还是回去给领导说说清楚！”

“娘，我怕……”他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流下了眼泪。

“不怕，娘送你回去！”

第二天，兄弟用独轮车推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带着两个孙女儿，将他送回到县上。

老母亲特意对专案组的人说：

“同志，俺家世代都是本分的种田人，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俺，俺哪能有今天这一大家人家。孩子干工作有错，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可别再……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老母亲说着，泪珠儿滚落下来，她饮泣着，没敢让“打”字溜出口。

“老太太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按政策办的。”专案大员们说得很原则。

无疑，老人此举光明正大，怀抱着对上级领导无限的信赖和对儿子的爱怜。这纯朴的感情是她一生辛酸、一生坎坷的自

然流露。可惜，她并不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理解。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她的大义之举——朴素的阶级感情代替不了严酷的阶级斗争。

老人将儿子送回县里，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看在这张老脸面的份上，看在老人那几句忠恳话，儿子不会再受罪了。她天天盼，日日望，希望儿子的问题早一天弄个水落石出，一家人高高兴兴再团聚到一起。

二十天以后，儿子半夜三更又回来了。

又是趁黑逃出来的。

凑着昏暗的油灯，她看着孩子浑身的血淋淋的伤痕，旧伤痕上添新伤，比头回见到更惨更吓人！

老人心疼儿子，有什么法呢？心底那个坚强的信念远远超过了母爱。她宽慰一番儿子，用带批评的语气说：

“孩子，你忍着点啊！老偷着往回跑，没罪也会添罪的！”

“娘，我受不了哇！”

“那……”一家人商量着，没了主意。这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赶到他家，告诉他们，军代表打来电话，让老人把孩子再送回去。保证不再逼供，还保证发放隔离审查期间的工资。

在善良的人眼里，从领导嘴里说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是算数的。第二天一早，老人实在出不了门，对儿子数教一番，让两个孙女又将儿子送回到县里。

仅仅只隔了一天，噩耗传来：她儿子死了！老人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直到这时她才醒过神来，面对魔鬼的凶暴、残忍，善良和信赖又值几文钱？

可惜，她清醒得晚了！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撕心裂肺的

痛苦。是儿子的血，洗清了她被偶像崇拜迷蒙着的眼睛。

两年以后，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打开了她儿子的坟墓，开棺验尸。经查：右肋骨第六根骨折，左肋骨第八、第九两处骨折，前胸胸板骨两处骨折。

很清楚，他惨死在酷刑下。如果有人指责这位母亲残忍，那太不公平了！但她的愚昧、盲目的效忠以及精神上的麻木迟钝，确实使人痛心发指。我们在呼唤文明、良知、友爱的时候，对愚昧和盲从，同时也该来次大的涤荡！

●他亲手挖出自己的心

他是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人民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

因为他“死不肯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可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

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来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脚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

打手们还用好几根拇指粗的木棍塞在他的指缝之间，然后，死劲地攥挤他的指尖。……

打手们还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

打手们还用两根本棍夹挤他头上两边的“太阳穴”……

笔者无意向读者和今人展现那些鲜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

的刑罚，更不愿去描摹当年那阴惨惨的刑讯室。这位普通的农民党员，当过兵，算得上是条汉子，汉子都忍受不了的刑罚，其恐怖残忍可想而知了。

他有怨、有愤、有恨。他知道自己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也许他在多次受刑中早就想好了，他选了一种最能表白自己的方法。

这天，正置社员出工学大寨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跑回家掂起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

“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他边跑边喊，手里的牛耳尖刀，已经插进肚子里。他跌倒在地，流下一滩殷红的血。

应该说，他死得是悲壮的，围观者一个个暗自饮泣。可是，不知怎的，他使人极容易地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推崇的武士道精神。为效忠天皇，可以毫不犹豫地剖腹自杀，并表现得潇潇洒洒，似乎没有一点恐惧和悲哀；他又使人想到两千多年前的介之推，他割自己的肉效命主子，心底涌动着虔诚和坦然！

死是悲剧，他用刀剖腹自尽，更是悲剧，而且是双重悲剧！如果在天之灵真的有知，他知道自己为谁而死吗？应该说他的灵魂永远是糊涂的。他如果不自杀，一他可能会被活活折磨死，二他可能会熬过那场劫难，真正洗清自己。他用封建的效

忠手段，以死向强暴表白着自己的忠心赤胆！

是党的政策，为他洗清了不白之冤！

不过，他必经用生命和鲜血，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她怀揣着一颗赤胆忠心

他是个漫画家。

他的妻子也是个漫画家。

冠以这样的头衔，并不是恭维，也不是戏谑打诨，他们确实实是两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漫画家。因为隐去真名，才令读者猜度。

他们的结合，艺术是红线。

她本来有工作，是吃皇粮的干部；他当时却是位农民。为了事业，也为了真挚的爱情，她毫不含糊地放弃了舒适的工作，下嫁给农民漫画家。她摒弃了卑微，丝毫不感到后悔和惋惜，而且觉得幸福和充实。因为她已经融进爱的海洋，也是艺术的海洋里。

时令已进暮秋，万木凋零，百草枯黄，呜咽的北风已带着肃杀之气。M县为推广“对敌斗争经验”，进一步扩大战果，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会上突然宣布逮捕了县公安局长。

县公安局长是这位农民漫画家的哥哥。

一个老公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进了班房。他懂得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他想都不敢想的刑罚一古脑儿在他身上轮番实施。酷刑之下，他咬出了几个“国民党”，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弟媳妇。

“造反派”的目光似乎比肉眼凡胎之人看得远些，这步棋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天机”万万不可泄露。

夫妻二人被打成“国民党”，一反常态，并没有立即被抓被关，而是先来个扫地出门。

村里的小学校早散了，他们住了进去。窗户没窗户，屋顶漏着天，一家人打地铺，铺点麦秸，艰难捱日。漫长的冬日来临了，一家老小能平平安安度过冬日吗？不几天，他们又被撵出小学校，住进一户没人住的民房里。房子破旧不堪，屋顶上的荒草在狂风中抖瑟，屋内阴暗潮湿。谁知还没等收拾停当，又被撵到路边一座碾棚里。

从家里被撵出来，他慌乱中只卷了几本心爱的漫画册。他们潜心研究学问，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既无准备，又不理解。两个沉进艺术天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厄运突至，有何奈何？

从扫地出门到被撵进碾棚，已经四次挪窝。还是她想得细，琢磨得透。她对他说：

“他们不会让咱安生的，今天撵这儿，明天撵那儿，步步紧逼，必有隐情。我看是让咱知道咱一家老小的命在人家手里攥着，想咋摆布就咋摆布，逼咱俯首就范！”

他太孱弱了，叹息道：

“那咋办哩！”

她大度地说：

“怕有啥用？天塌了地接着！”

别看一个女流之辈，猜测是准确的。

村“专政组”见耐心等待毫无效果，于是撕去“温柔”的面纱，将她关押到“专政组”大院里。

这大院，就是她的家呀！

才被撵出去几个月，迈进家门，这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咋变得这样陌生？这大院里曾经阳光明媚，暖风融融，一派欢声笑语，终日荡漾着温馨的气息；现在却阴森可怖，一派杀气。

审讯室里，木桩似地立着几个面孔冰冷的壮汉。

“这些日子早想好了吧？快老老实实交代吧！”

“我没啥好交代的。”

“专政组长”一下蹦起来，吼叫道：

“好，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板子硬！”

她被压在凳子上，木板、方椽，雨点般落在她瘦弱的身上。她的孩子正在哺乳期，家里生活又苦，哪里谈得上调养身子？她咬紧牙关，没有一声哀求和喊叫，有的只是从鼻孔发出的“吭、吭”的声音。

打手们的手都累酸了，麻木了，还是没能撬开一个弱女人的嘴。

“这回该坦白交代了吧？”“专政组长”狰狞地逼问道。

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啥可坦白的，你们随便打吧！我要是喊一声，我就是‘国民党’！”

她被关在一间阴暗的棚屋里。

她熟悉的家院，成了“专政队”的“牛棚”，实际是临时监牢。

她好象忘了浑身钻心的疼痛，脑海里突然闪过夫妻作画的场景。我们两口子爱画、创作漫画，何罪之有？

五岁的女儿提着罐子来送饭。院子里垒起个“送饭台”，孩

子把饭搁到“送饭台”上，哭着喊道：

“娘，娘！给你送的饭！”

她隔窗远远望着女儿那冻红的小手，那蓬乱如草的头发，禁不住泪如泉涌。

饭要经过“专政人员”检查。馒头掰成碎块，玉米面粥用棍子搅个透，怕在粥里藏东西。

这天，“专政组长”来到棚屋，带来了红纸、白纸。她警惕地望着“专政组长”。只见“专政组长”淡笑着说：

“你给我办件事。喏，你见过‘国民党’的‘党证’吗？”专政组长边说边比划，并把纸放到窗台上。“你会画，画得不错，这点小事难不倒你的！”

“天机”终于泄露了。整他们是迫使他们就范，助纣为虐，伪造“国民党党证”。

她平静地说：

“不会。我没学过造假！”她又被带到审讯室。

两个壮汉用绳子将她两只胳膊捆住，“哧溜”一拉，被悬吊在屋梁上。

专政组长说：

“现在说会画还不迟。咋样，会不会？”

她牙根一咬，吐出两个字：

“不会！”

专政组长发疯似地跳起来，狠狠扇她两嘴巴，两只手拽着她的衣领，“哧啦”一声，将衣服撕开，裸露出鼓胀的胸脯。

就在这一瞬间，几双淫邪贪婪的目光，全盯在那白皙的胸脯和那对圆圆的乳房上。

专政组长猥亵地在那圆鼓鼓的乳房上摸了一把，浪笑道：“奶水挺足呀！”

说着，拿起一本从她家抄出的画册，卷成圆筒点着，伸到她的乳房上。

一股呛人的焦臭气味，弥漫在审讯室里。

她一下子昏死过去。

……她不知睡了多久，浑身困得不行，一点力气也没有。忽然，她觉得胸脯麻酥酥地发紧，象被索链紧紧地缠裹着。她下意识地扭动几下，仍然摆脱不了。她用满是血痕的手解开衣服一看，那苍白的胸脯上，爬着两块焦黑丑陋的伤疤。

她吸泣着，想到自己吃奶的孩子。

她是个文化人，苦苦追求艺术。可是，面对野兽的凶残，文化、艺术又值几个钱？只能任人奸淫、任人摆布！因为野蛮和无知、凶残是一根藤上的毒果。只有将文化、艺术埋葬掉，无知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奇世雄才”。

她怀揣着一颗对领袖、对党的赤胆忠心，即使在她饱受如此凶残的迫害，她也从未怀疑过对领袖、对党的信念。就像一个痴迷的恋人一般。

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特别是应让领路人们好好地深思！

莫再用“左”的绞肉机，绞烂绞碎忠实信徒的那颗赤胆忠心！

●“炼狱”中的铮铮铁骨

并非所有的人一打就招，一审就咬。在 M 县“清查国民党”的大假案、大冤案中，不乏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他生前任 M 县县委副书记。

一九四三年，在 M 县的县志上记载着：是年大灾荒……那年他才十岁。

他跟随着爷爷、大伯，卷进逃荒的队伍，过州走县，来到河南地面。

不用去描述漂泊异乡的艰辛，他们爷儿们相依为命，一年后，才辗转返回到家乡。

一九四六年，平地一声雷，家乡解放了，斗地主、分田地。他已经十三岁了，才迟迟迈进学堂的大门。

全国解放的那年，他正好初师毕业，便参加了工作。

一九五六年，他光荣地迈进党的门坎。

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当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有一回，他哥哥找到他，请他帮忙办点私事，让他在一封介绍信上盖个章。他就管着章，对一个办公室主任来说，盖个章易如反掌。但他生性耿直，对哥哥说：

“这章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不能随便给亲友盖。你想想，咱们讨荒要饭那功夫有章吗？”

按照培养青年干部的精神，他被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正当他决心为党、为人民大干一番事业，大展宏图时，灾难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身为县委副书记，无论冬夏，他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象当时宣传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M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

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M县，造反派夺权了。

突然有一天，他从乡下被传回机关。一回机关，便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他一时不理解，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出现过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他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检查的机会。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已被“内定”成M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

他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

他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当口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索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狰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里才有的景室里。他根本就不明白，他所领导的M县，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面对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就入过一个党，那就是共产党。现在说他是“国民党”，岂不好笑？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呈凶的年月，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会是“国民党”呢？

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

他本来就站的好好的，答话刚出口，后脑勺便沉重地遭受一击。

“低头！”

只觉得脑袋“轰”地象炸了似地，他强忍着，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铁钳般拧住他的胳膊，猛地向后上方一拧，两只胳膊倒翘着，摆成翅膀的样儿，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蹶起。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他只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地。他的脑海里，蓦地变成一片寂静的荒漠。

对他，这只是最简单的刑法：弯腰、蹶腓、架飞机。

审讯在继续，刑法在变换。

他死死咬住不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立刻吃进肉里，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沉，往一起缩，头上汗如雨下。两腿慢慢麻木，慢慢变软，终于“扑咚”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再换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贴着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短促，直感到难忍的憋闷。

他咬着牙坚持过来了。

再换刑法，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人常说，十指连心，其惨疼可想而知。

他在 M 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得批斗，以期推动全县的运动。最高记录：一天批斗八场。

光在县城批斗不行，还得拉到各公社去批斗。儿子、女儿平时已见不上他，只能在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的脸色腊黄，人瘦了，老了，头发胡子老长。细心的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的，还不时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着，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趿拉着往前捩。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记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的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特制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公社去批斗，便赶去那个公社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父、舅舅，一块儿去。

公社没有开大会的戏台子，临时用桌子搭起个高高的批斗台。只见父亲被拥到批斗台上，四周是黑压压的百姓。不知此时他们想没想到鲁迅小说《药》里描写的场景。刽子手绞杀革命党，人如潮涌，挤着朝前看个究竟。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惊悸、同情、怜悯为何物，纯粹是为了看“稀罕儿”。

时令正置暮春，卷裹着苦咸沙土的寒风，令人打着冷战。

造反派慷慨激昂，揭批着他的罪行。批斗结束，将他从批斗台上推了下来。他倒在了血泊里。

人群中的亲友忙捂上了眼睛。

这使人想到当年斗地主、富农的场景。

批斗台上，是戴着高帽子的地主。一阵批斗，随着震天的口号声，从批斗台上被打翻在地，然后用骡子马拉上双脚，拖着去游街示众。身后是愤怒的人群……

批斗需要声势，我们的“国民”有看“热闹”的遗风。就象今天马路上两个骑车人不慎撞了车，当事人还没说什么，“哗”地围上来一群人，交通立刻受阻，内中不乏有人起哄：

“怎么不吵？怎么不打？……”

当事人各自东西走了。人群中还有人遗憾地叹息：“真没劲！……”

看“热闹”的内涵是什么？

这不能不让又联想起那些在日本鬼子枪口下，连跑也不跑的中国民众。

镜头还是回到当年的M县。

晚上，他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父去送鞋，人没叫见，却招来一串罪名：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不是混在人群里想找机会搞“劫持”？……还是妄想搞“暴乱”？

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

她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

“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

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他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

“今晚你要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

“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无什么政治问题！”

嘴还是这么硬！

先是用皮鞭朝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则死死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猛地昏死过去。

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

“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

“头头”咆哮起来，用摔破的瓷碗底，刮他已经被打得裸露出的肋骨，用驳壳枪把朝他胸部猛砸，似乎还嫌不过瘾，又用子弹头狠别他的肋骨。

“交代不交代？”

他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国民党’！”

他被反捆住双手，吊在屋梁上。

天已经热了，刑讯室没火。打手们把旧报纸卷成圆筒，点着，烧他的腿跟、小腿、小腹，火苗舐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你是不是国民党？”

他咬紧牙关，嘴唇咬出了血，没有叫喊，但浑身力气已尽，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是，我不是……”

“你说，谁是国民党？”

“不，不知道？共产党不会看错人！”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嬉笑着朝他的胸脯裸露处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

这是他最后留给人间的声音。这是共产党员心灵的强音！尽管他喊得很轻、很弱，断断续续，但他是有骨气的！

可惜他只活了三十六岁。

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他忠贞不二为的是革命，人家惨忍地折磨他也是为了“革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十年后的一个冬日，大地坦诚地展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辆北京吉普从县城驶出。车上，坐着中央关于“M县国民党案”调查组的组长。他们一行来到在“国民党假案”中被活活打死的前县委副书记家，紧握着寡居十年的一位农村妇女的手，激动地哽咽道：

“我来看望你一家。你丈夫是党的好干部，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整整十年啊，她才盼来了历史公正的声音！

在M县，王××也算得上是个很有名气的人。

他是个农业生产上的好手，特别是种棉花，他曾去山西参观过全国植棉能手种的棉田。他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他青春的辉煌。

“文革”中清查“国民党”，没有漏掉他。因为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个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

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他用的是“温火”，说明情况，喻以大义。遗憾的是王××嘴咬得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动火了。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说道。

“你诬蔑谁胡说？”“造反派”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脸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是不是‘国民党’？说！”打手们喝斥道。

一股难忍的疼痛撕扯着他的心，他努力镇静住自己，忍着疼，还是那句话：

“不是。”

“你是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他说得慷慨自豪。

又是一阵没头没脑的毒打。

王××始终咬住不承认。

“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上铁丝，一阵剧疼，他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便凝固了。

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为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

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话！”

“少啰嗦，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

“好！不是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叱责道。

王××就这么被吊着，稍一点头，绳子就拽得紧点，就会撕心裂肺地疼痛。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亲提着个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你……”老娘亲泣不成声。

“娘，你怎么来了？”王××惊喜地说。此时此刻，他真想向亲人倾诉一腔冤屈。可又怕娘看了他这副惨象难过。“娘，你走吧……”

“孩子，娘给你送点米汤，你喝口吧！”

老娘亲用颤抖的手捧着瓦罐，喂王××米汤。他的双手还被吊着，铁线串肉的地方，是一片黑色的血污。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

“娘！”王××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咋能胡说呢！”

“那他们……”老娘亲知道不承认的后果，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娘，我顶得住！……”王××咬着牙说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

王××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他用铮铮铁骨，表白了自己。用血淋淋的忠心，表白了自己。

○以死喊冤的一家七口

在祖国的北方城市旅大的近郊农村，1968年的春天刚刚过去，一个阴谋在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的主持下，酝酿成形。在筹备七月份举行的“活学活用”讲用会时，他的敏锐的意识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材料。6月26日，这位副政委下令：“把许长家拉来，叫他交待问题。”

许长家是一个忠厚的农民，一辈子侍候庄稼活。被叫来交待问题，他还摸不着头脑，说：

“我是贫下中农，我没问题。”

反复问，他还是这两句话。

休息时，王副政委“启发”各位与会者：“要打态度、打威风，态度打不倒，问题就交待不了。”

于是，许老头被绑起来，被逼跪在地上，顷刻，棍子、条子，雨点般落下来，他疼痛难忍，不断哀号呼救。

“快说，快交待你女儿许连荣怎样使用‘美人计’与大队书记勾搭在一起。”

许长家连连喊冤，结果又招来一顿毒打。其子女许连祺、许连荣知道父亲蒙受不白之冤，四处上告，直到北京喊冤。但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他们还时常遭到毒打。一段日子下来，许连荣那俊俏的脸蛋变得十分消瘦。

迫害还在延续。许长家经不住逼供、诱供和不断毒打，违心招认了那些人的指认，往自己的女儿身上泼脏水，审讯者终于获得了“成果”，但许老头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心里直喊冤，我该怎样表白自己呢？

又到提审时刻了，许长家双手捂着肚子，弓着腰、颤颤巍巍说：

“我昨天交待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党、向毛主席、向贫下中农交红心……”

他说不下去了，疼痛使得他五官都挪了位。

只见他用两手将掖住的衣襟一撩，露出了鲜血淋淋的肚

皮！

原来他用玻璃把自己的心腹部割裂了一道十公分的口子，以剖腹表忠心。

这还没有打动那些审讯者冷酷的心，他们冷笑一声：“你想给咱们施加压力，威胁我们，是不是？！”

他们用红布把老人的伤包了包，将他绑在大桩上，边打边问：“是不是要威胁我们？”

许长家很快人事不省了。拷打他的那帮人做出新决定：“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了。”于是，第二天召开宣判大会，宣读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劳动。”

厄恶还没有终结，许长家的女儿许连荣被诬施“美人计”。阴谋者决定对她直接下手。

许连荣被带进会场，一句话也不说。突然，这群人首先大喊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质问姑娘：“你开不开口？”

第二次喊口号时，许连荣举起手来，跟着喊了，这引来一阵狂笑：

“哈哈！这回你可张口了吧！”

“你们要我交待什么？”许连荣问。

“你和大队支书的关系！”随即是一阵淫荡的狂笑。见许连荣不招认，他们一拥而上，将她打翻在地，压住她挣扎的胳膊，用棍棒、条子使劲抽打……最后，姑娘挺不过，只好屈招。

回到家里，母亲见女儿遍体鳞伤，失声痛哭。

许连荣却说“妈，您不要管了，反正我什么都承认了。”全家随即哭成一团。

夜色沉沉，何处伸冤？

许连荣对专案人员说：“我有好多话说，让我想一想，明天你们什么时候来叫我，我就什么时候来。”她的心里充满了悲愤，母亲也直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许连荣搂着两个小侄，贴着脸，亲了又亲，流着眼泪说：“你们再也看不到爷爷奶奶，再也看不到叔叔姑姑了。”

这天是1968年7月15日。

第二天上午，几个民兵来提审许连荣时，惊叫起来：“哎呀妈呀！都死了！”

只见梁上并排着四个人，他们是许长家（57岁）、许连福（26岁）、许连祺（28岁）、许连荣（23岁），地地还躺着一具尸体，是许连玲（20岁），因为缢绳断了而掉在地上，炕上也有两具尸体，王朝臣（许妻，57岁）和许连清（18岁）。

屋内两扇门上写着：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墙上用笔写了两个大字：

“屈死”

柜面上整齐放着一套《毛泽东选集》，用红纸覆盖着。

在许连荣的腰间发现了遗书：

“我要求把我的尸首到医院检查……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

一家七口，一一签了名，盖上了手印，血红血红的。

1980年，许家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他在遗诗中向“老人家”献上了一瓣心香

他戴着一副眼镜，貌似一个温和的中学教师。他是天津公安局的干部，李良。在公安战线上，这是代表智慧、忠诚、勇敢和荣誉的名字。

1968年的初春，李良正在汇报工作，有个陌生人走进来，将他叫走，单独宣布说，今后不许再与党组织联系了，他特别强调说：“你的问题也要审查，要先写揭发公检法的材料。”不做任何解释，那人便走了。

李良被搞糊涂了。

他哪里知道，就在2月21日，江青、陈伯达等人发表一个讲话，要“大揭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要以天津为突破口”！一场风暴马上就要袭来了。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人冲进他家，蛮横地要他立正，不许乱动，还追问他为什么不写材料，见李良不予理睬，那些人就开始做“思想动员”：首长“二·二一”讲话要贯彻，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要站出来揭发公安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他明确回答说，并指出：“对我的审查，必须经过公安局党组织明确通知我以后，才能写材料，没有党的批准，我一个字也不能写！这是对党的负责！”

有人吼道：“党已经瘫痪了，已经烂掉了，一切权力归我们！”

李良厉声驳斥：“党是不会烂的！”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一时，那些人气急败坏，强令：“不写材料就站着！”

一连几天，他遭到轮番围攻、辱骂和毒打，但他一个字的材料也没有写。相反，他写信给公安部、局领导，报告情况，但信件全部被扣发了。在这种情况下，李良宣布绝食。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下来，他的身体极端虚弱。他被捆起来，强行输液、灌奶。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人输液、灌奶时掺了大量的盐，给李良造成极度干渴，他忍受着极大痛苦，坚持不让步。

他的公安制服被剥掉了，手脚被捆住，他们揪住他的头发，每天两次强行灌食。李良的态度使那些迫害者认定，这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堡垒”，一定要攻克，不久，李良被秘密转移，囚禁起来。

他们拿来材料，一个陷害干部的讲话，一字不漏地念给他听，要他改变态度。

得到的是沉默。

他们又播放江青、陈伯达的“二·二一”讲话录音。

他还是沉默。

审讯员直截了当地说道：“首长讲的变色龙就是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干部，你要老实交代他给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你是怎样干的。公安部所有副部长都是黑帮，你的工作是谁批准的？”

李良突然开口了：“谁授权你们这样干的？”

“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对你说吧，公安局的主要领导

干部不过是小个的，中央还有大个的。你不过是个执行者，只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马上释放你！”

李良义正辞严：“这是党的机密，没有党的批准，我没有权利告诉你们！”

迫害升级了。4月22日上午，李良被拖到“砸烂公检法大会”上，被扣以“与公安部和公安局的走资派阴谋勾结，背叛投敌”的罪名，宣布逮捕，投入死囚牢房。

一连数天，有7次群众批斗会和13次小组突击审讯，企图迫使他认罪，而李良乘势向与会群众高声喊道：

“同志们，你们受了蒙骗，这样干，是亲痛仇快的事！”

在狱中，他再次绝食抗议，以死相争。他还给中央写了大量信件，揭发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

“在大揭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中，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几十名处长都被扣上了‘变色龙’或‘小爬虫’的帽子，受到审查和批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现象又在重演了！”

“在运动作法上，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否定一切，无限上纲的现象，我看到不少。而诡辩、武斗、体罚、逼供信等法西斯方式，我也多次亲身尝受。”

“我是被害者。我的被捕，从社会主义民主讲，是压制不同意见；从社会主义法制讲，是未经核实罪名、事实，就随意捕人。”

“我相信我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带引号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最后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见青天的。”

牢狱中的斗争使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到1969年2

月，他生命垂危，双目紧闭，两唇肿烂，身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狱医提出赶快送医院抢救，提了三次，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2月27日，在349天的绝食斗争以后，李良终于告别了这不平的人世。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首诗，最后两句是：

“我们要永远满怀虔诚，一瓣心香，
衷心祝愿老人家万寿无疆。”

他一个字的材料、一句口供也没有留下。

同年10月，他被定为“洋奴、汉奸、反革命分子”，永远开除出党。

○砍头只当风吹帽

寒星闪烁，是最严寒的季节，银川市郊外的文教农场里，正在召开批斗大会，会场里热气腾腾。

这是1968年12月15日晚。

朱守中，宁夏中卫县一中的普通教师，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但侃侃而谈，不像被批斗，而像在教课。他说：

“我对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一直是不同意的。党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很多事不能叫刘少奇同志负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现在摘引的刘少奇的话，是断章取义……”

立刻有人打断他的话，质问道：“你交代，什么地方断章取义”？

回答依旧从容不迫：“比如说，少奇同志从来没有提过‘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别人上

的纲。”

质问者哑口无言。

见文斗不胜，便来武攻，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拳八脚将朱守中打翻在地，又马上提起来，架成“喷气式”：“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朱守中嘴角流着血，回答说：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招来一阵毒打狠揍。

这时，有人喊：“叫他把这话写出来！”

朱守中从容地擦净双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六个大字：

“刘少奇是党员”

这位中学教师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教师，在1958年，被以“在反右斗争中动摇退却，隐瞒家庭出身情况”为由，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作为支边人员，发配到宁夏。面对这些不白之冤，他一次又一次地抗争、上诉。他的家庭早已解体。1968年初，他又回到上海要求澄清自己的错案。然而，满目皆非：抄家、挂牌、武斗、游街、隔离、逮捕、流放、殴打……已经遍布上海。他要找的那些证人，不是被批判就是失踪，或是自身不保，不肯出面。朱守中目睹这一切，默默地撕掉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国家乱到这种地步，个人的冤屈算什么？

他陷入了沉思。

回到宁夏，他边劳动，边和其他同志交换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忧心忡忡：

“我对刘少奇主席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

“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

在他被隔离以后，常常自言自语：“虽然党把我抛弃了，但我对党始终一片痴心。无论怎样，我都要维护党。”为了表示自己矢志不移，他在以后的材料后面签名时，改“朱守中”为朱守忠”。

1969年4月19日下午，呼啸的警车飞驰而来，在濛濛细雨中，朱守中被逮捕，押往看守所。新的一场斗争开始了。

八月，他接到判决书：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九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判处无期徒刑。

被押往监狱服刑，投入牢房时，他说道：

“过去，我有个口头禅，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现在要变成‘失去自由得自由，囹圄之中学技术’。这儿就算我的家了。”他没有停止过抗辩，借写材料之机，系统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是原来的观点，一点也不变。为此，他被戴上沉重的铁镣，关到禁闭室。他哪里知晓，加刑材料已经呈报上去了。

那天，他被带到审讯室。

问：你今后还继续放毒吗？

答：这我保证不了。我想说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理。

问：犯人批判过你吗？

答：批判过。干部也在经常教育，而且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我还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要不，我就不叫“朱守忠”了。

问：你这样，就判你死罪！

答：死罪就死罪，我无所顾忌。在我说来，没什么，所谓“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也！

问：“你还有什么说的？”

答：没有了，死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不到黄河心不死’嘛！

问：以上事实有出入吗？

答：没有，只能说少了！

问（停顿了一会）：朱守中，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

答：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

回到牢房，他陷入了沉思，随之翻身立起，以铐击节，戴镣起舞，引吭高歌：“以牢为家高枕卧，美曲新歌由我语，杀头枪毙算个啥？视死如归不在乎！”歌声悲壮，响彻牢狱的走廊。

最后时刻到了。他戴着镣铐，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上名字，又重重地按了个血红的手印。

1970年2月21日朱守中被执行死刑。

○她为真理而活着

1966年9月的一天，骄阳依然烧烤着大地，陈仲彬接到通知，要她去州医药站小会议室开会。这位中等身材的妇女，根本就没有提防什么，便前去赴会。

会议开始了，有人在台前领呼口号：“打倒刘少奇！”

陈仲彬既没有举手，也没有跟着喊，立刻有人尖叫道：“陈仲彬不呼口号！”

“把她揪出来！”

话音未落，一伙人蜂拥而上，扯她的头发，扭她的胳膊，把她拖到台前，令她跪下。

“打倒刘少奇！”又有人呼口号，

她还是没有喊。

随即，响亮的耳光就抽过来，拳头、军用皮鞭一齐下，打得她眼冒金星。

有人质问：“你呼不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陈仲彬大声呼道：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又是一顿毒打。如此反复多次，她没有喊一声，也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医药站的普通干部，曾经是“社教”队员，真诚地要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贡献力量。“文革”开始以后，他的爱人被勒令反省，被罚着拉板车。局势的发展不容她只顾个人的经历与遭遇。她看到的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干部被打倒，被用红颜色在名字上打“×”。她感到极度困惑。于是，她找来《毛泽东选集》，彻夜通读。她知道，刘少奇在我党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毛主席始终信任与器重他。肯定是有坏人在捣乱。

陈仲彬开始拒绝参加群众组织，每逢开会喊打倒刘少奇和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口号，她不举手。这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举动，有人问：“为什么打倒刘少奇你不举手？”

她坦然答道：“很简单，不是敌就不能打倒。”

她的命运就此注定了。

她先被停职反省，勒令交代问题，她回答说：

“我交代什么？我没有罪。”

“你保刘少奇没罪？”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她平静的回答。

陈仲彬被拉到大街上游斗，经受着无数次审问、拷打，背部严重受伤，无法睡觉，瘦成皮包骨。被送进医院以后，还没有躲过审问。

1968年的冬天，迫害升级了。陈仲彬被关进了“治安指挥部”。不久，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有人逼她念全会公报，被她严辞拒绝，她愤愤地说：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审讯又开始了。

“刘少奇是什么人？”

审讯员问。

陈仲彬立刻回答：

“刘少奇是人民的勤务员。”

再问一次，还是这个回答，如此反复。她抓过笔来，在白纸上写道：

“刘少奇是人民的勤务员”，过后，又在刘少奇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两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审讯者。

这换来的是，被吊在屋梁上。

1969年3月，陈仲彬以“死保刘少奇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之罪名，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强制遣送到边远的大庸县红土坪公社尚峰大队全家生产队管制劳动。

几块破板壁围成一个住房，三块石头架了一口锅，几块破

楼板铺了一架床。这就是陈仲彬的新居。

这是多大的牢狱啊！此处春天泥烂路滑、夏天干旱无雨、秋天狂风怒吼，冬天冰雪盖地。

精神上的压抑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糠菜为食的艰苦生活，使陈仲彬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苦苦在死亡线上挣扎。

不少人为她担心，还好心劝她：“你真憨呐，只要你对刘少奇的问题有了认识，上级就收你回去当干部。”

她的回答是明确的：“我认识不上去，我不能欺骗组织，我如果欺骗了组织，将来我想到这些，就会心里难过的。”

她的爱人也多次前来劝她，不行；又派她姐姐来劝她，不行；她的侄女、侄儿前来劝她，也不行。更大的悲剧发生了。她爱人认定她得了精神病，便将她骗到永顺精神病医院。

陈仲彬对迷惑不解的医生说：

“我没有精神病。”

扭头折回了她的寒舍。

家庭的破裂无可挽回了，她爱人提出离婚要求。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她的儿子被下放到桃源县农村，不慎跌断了腿；也因为她的儿子，儿子与儿媳离了婚，孙子被送了人。只有陈仲彬和她的女儿还在这边远的村庄里，受着煎熬。陈仲彬忍受着这一切，她总在待等着什么，盼望着什么，她活下来了。人的生命有时为什么竟会这样的顽强？

○被死神拒收的“昔日宠臣”

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作“罗长子”的罗瑞卿大将，在未被打

成“黑帮分子”前，可谓毛泽东身边的“得意宠臣”。然而，在1965年12月，他被突然召到上海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遭到无情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怔了好一阵子。随即他被一架专机送走，从此失去了自由。

上海会议上回荡的声音一直响在他的耳边：“林彪同志揭发你，今年2月你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条意见。”当时，他差一点拍案而起，怒斥这谎言。但是，他忍住了。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机会已经失去了，从他与林彪开始疏远并抵制林彪的一些做法时，这种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他实在想不通，他的倔强秉性使他更难以忍气吞声。他最后决然作了选择，登上阁楼，纵身一跃……

死神没有收留他，手术以后，左小腿以下三分之一被切除，永久地残废了。这是1966年3月18日。

1966年，严寒中的12月24日，不能行走的罗大将被放到柳条筐里抬到首都体育馆的批判大会会场，接受对他的“打倒”、“火烧”、“油炸”。当时，他就是直接从什坊院那个院子里被抬出来的。

在这个院子里，他和其他囚徒一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专政对象。忠于职守的看守和专案组成员，对这位身残的老人施以最恶毒的惩罚：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不让他解手，甚至用烟来熏呛他。

将军愤怒又无可奈何地质问：“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得到的回答却是：“对于反革命，我们从来不施仁政。”

罗瑞卿语塞了。

在所有囚犯中，他是行动最不便的人，却经常被提审，要他交代问题，交代“顶头上司”的黑线。他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磨难的公安部长，不畏惧审讯者的淫威，常常以闭目养神对付他们。他的反驳是简短的、低声的，却总使对方哑口无言。

罗瑞卿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之中，小院里经常充斥着令人心碎的呻吟，低沉的毒打声以及逼供的狂喊……这些声音起初是那样令人恐怖，那样揪心，渐渐地听惯了，最终他听了整整八年。

他不是一个人等死的人，行动不便，却时时想着充实自己。经他再三请求，拿来了《马恩选集》。他读着、思考着，也想到自己与林彪的斗争，想着这个秃顶的阴谋家何以能在政治舞台上折腾。他坚信，林彪总有倒台的一天。突然，有一天，监门被踢开了，专案组的头头拿着一张报纸，扔到罗瑞卿面前，说：

“你还不知道吧，在党的九大上，林副主席正式成为我们党的接班人啦，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

罗瑞卿默默看了看报纸，又扔还给他。

那位头头居然喊道：“笑，你给我笑！笑！笑！”

得到是冰冷的回答：“这些年来，我已经不会笑了。”

牢狱里的日子是无限的漫长，罗瑞卿曾经担心自己挺不过来。但最后，他还是活着出来了，那是在1975年。

●共和国主席饱尝臣民的“老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参加全会的代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搞得惊慌失措。这是最后摊牌，是决

裂。情况非常严重，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亲自出头露面，贴了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现象。

八月八日，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一场亘古未有的“红色狂风”在神州大地燃烧漫卷。

全会结束后，在阴谋家康生的鼓动下，一切舆论工具都行动起来，摆开一场立体宣传。活报剧、话剧、黑板报、漫画、广播、报纸，全部上阵，刘少奇刹那间变成青面獠牙、张着血盆大口魔鬼。

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

全国各地立刻掀起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吉林省，“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出省委内的走资派”的口号震天动地；在广西，由南宁“红卫兵”总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发起，在自治区体育场召集10万人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又是10万人召开“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上海人民广场，四万人集会，愤怒声讨上海市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股旋风下，疯狂的迫害在迅速蔓延；

1966年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在全市游斗；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获秋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批斗；

1967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宣布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打倒……

刘少奇已经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打倒不就清了吗？为什么让那么多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挨揪斗，受皮肉之苦呢？

早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作了真心诚意的检查，主动承担一切责任。毛泽东主席看过刘少奇的检查后，作了批示，说刘少奇同志的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得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就在毛泽东批示的同时，一些红卫兵小报把这个检查说成是“蒙混过关”、“避重就轻”、“大而黑的保护伞”等等。

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找他谈话。刘少奇坦诚地说自己犯了错误，并郑重地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后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烟。临别，亲切地对刘少奇说了两句话：“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时隔两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冲进刘少奇的家，贴大字报，并批斗刘少奇、王光美，让他们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白发苍苍的刘少奇伫立在凛冽

的寒风中接受批斗。

两天之后，刘少奇家中的电话被扯断，从此，结束了他与外界的联系。

3月4月间，各报刊出各类批判文章，刘少奇被指控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6日晚，“造反派”高呼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读一项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

打击接踵而来，刘少奇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批斗也在逐步升级。

7月18日，骄阳似火，火辣辣的太阳，照得大地烫人也烤人。但中南海“造反派”的脑子，比气温还要热。他们在康生、江青授意下，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脖子上挂了大牌子，牌子上罗列着各种罪名。

批斗中，几个暴徒窜到刘少奇身边，大打出手，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子掉了，只穿着袜子，被强行按头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刘少奇已年近七旬，难以忍受这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脸上的汗，被旁边的“造反派”狠打一掌，把手绢打掉，汗水滴在地上。……

经过这次毒打，刘少奇腰部受伤，伸不直了，右腿也瘸了，只能用双手扶着墙，慢慢移动。

自此，刘少奇与家人完全隔离，一个人孤独地被囚禁起来。

八月五日，“造反派”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

几个彪形大汉狂暴地扭手按头，将刘少奇押进会场，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并揪着他稀疏的白发，又强迫他抬头照相。

批斗会的主持者还觉“火药味”不浓，命令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二个多小时的批斗中，刘少奇横遭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有人用“红宝书”朝他头上打去，不让刘少奇答辩。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批斗扭打，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三十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最后实在不能走动了，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工作人员去打饭，被谩骂为“保皇兵”，因此不肯每顿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上几顿。刘少奇满口只剩下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身都是。

刘少奇经常生病，病得重了，医生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会，一边检查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乱捅。看一次病就跟上一次刑一样。刘少奇患有糖尿病，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D860也停了。

1968年一个仲夏之夜，刘少奇发起高烧，医生来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人抢救。

为什么突然发了善心？当时中办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讲：“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

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这是精神摧残！

刘少奇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

医生提出住院治疗，被拒绝了；

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70岁生日。就在这天早上，刘少奇在病床上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是巧合？

刘少奇气愤致极，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吐血，体温升到40℃，血压升高到260/130。

“文革”中，党纪国法已荡然无存，真理与谬误，正义和邪恶完全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做出决议，从没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了解过一个字，既不让看有关材料，又不让说明和申诉，既不让知道开他的会，又没让他在开除出党的决议上签字。林彪、江青一伙抛出一个全部是栽赃、诬陷、用“逼供信”编造的假材料，欺骗全党，愚弄全国人民！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命”，刘少奇被送往开封。

刘少奇患病后，加速对他迫害、折磨，当时，尽管给他治疗，但那是为了要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时留个活靶子对

他进行攻击。到1969年，刘少奇已病得不成人样了，身体消瘦憔悴，头发胡子又长又脏，两只手不住地颤抖，自己也控制不住。双腿渐渐失去机能，走10米远的路，都要扶着墙和桌椅，慢慢朝前磨蹭。他经常来不及上厕所，把大小便全都屙在身上。

看守人员不给他换衣服，没人管它有多脏、多臭。由于长时间卧床，刘少奇身上长满褥疮，加上尿尿，肮脏、发炎、流脓、发臭……在离开北京时，看管人员就将他的裤子剥掉，拿被子一卷就抬走了。

晚上七点多钟，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人员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陪同，乘飞机飞往开封。

开封某机场突然实行工作戒严，一队解放军开进机场，岗哨林立，如临大敌。

机舱大门打开了，抬下来一副担架，担架上的人骨瘦如柴，只剩一把骨头的脸埋在又长又乱的头发和胡子中，从被子里发出一阵阵腥臭。

刘少奇被投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时正是初寒天气，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途中的寒冷，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到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后才下降。

刘少奇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

能出现在刘少奇床前。

守护在刘少奇身边的医护人员，曾提出是否让亲属来最后见一面？结果无人作主。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刘少奇的尸体放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乱蓬着，嘴、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一件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穿在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上。遗体在廊檐下进行了拍照。

这座银行金库的地下室过道上，停放着共和国主席的遗体，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没有一寸黑纱。有的是阴沉而漆黑的夜幕，如泣如诉的秋雨……

刘少奇的遗体被冠以患“烈性传染病”身亡。深夜12点，六七个人将他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已接到通知，正在喷洒消毒剂，而后只准留下两名工人，20多个军人将火化场全戒严。

刘少奇被火化后，他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

专案组为刘少奇买了只30元钱的骨灰盒，将骨灰草草装进里面。但是他们还想在骨灰盒外面继续诬蔑、侮辱刘少奇，将刘少奇真名隐去，写上“刘卫皇”三个字。名字后边写着：无职业，因严重传染病而死。

这个称为刘卫皇的无职业死者，骨灰盒无人来领取，因此被存放在火化场。

没人知道，那简陋的骨灰盒里装着共和国的国魂。

他死得多惨多冤！后事处理更是草率简单，简直不如一个平民百姓。

这也算“文革”年月一桩辛酸的往事吧！

●昔日“横刀立马”今日含冤九泉

毛泽东曾为他的一员虎将题过这样一句诗：

……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位虎将就是“敢为民众鼓与呼”的彭德怀元帅。

“文革”对彭德怀来说，是一场比反“右”倾更悲惨的灾难。

1966年12月，冬夜。成都永兴巷7号彭德怀的住宅，突然被负有特殊使命的北京来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向彭德怀宣布“中央文革”指示，要将彭德怀押回北京。

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围困的彭大将军，没有什么可畏惧的，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66年12月27日，铁骨铮铮、耿然直言的彭大将军被揪回北京。

林彪在一次会上穿凿附会，在名子上大做文章，阴险地说：

“你们知道彭德怀原来的名子叫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

京，康生马上附议；王力、关锋一哄而上。

戚本禹亲自做了布置，对名噪一时的一位学生领袖打电话说：“现在文化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揪回来斗争彭德怀，是有预谋的行动。

1967年夏天，是个难熬的酷暑。

7月18日，戚本禹本着主子的旨意，对彭德怀专案组训话：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批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第二天，即7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学院一间大教室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四周墙上，挂满了标语口号，杀气腾腾。首先是那个所谓的“老干部”上台，控诉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如何破坏了当时革命大好形势，又如何招致了日寇的疯狂屠杀，结论是，彭德怀假抗战、真助蒋，假功臣，真罪魁。

面对对历史的亵渎，彭德怀大义凛然，驳斥道：

“我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后才开始的吗？”

彭德怀的反问象一条条钢鞭，抽到这条癞皮狗脊梁上。他

们一时无语，旋即怒吼道：

“彭德怀，你太嚣张了！你敢翻庐山会议的案！”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

“红卫兵小将们，庐山会议上是有一些同志就‘百团大战’问题对我提出过批评，其中不少意见是好的。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这次战役对于振奋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有功的！”

这时，几个人已经不让彭德怀再说，冲了过来。彭德怀加快速度高声说：

“功在我们党！在万千八路军战士！烈士的鲜血决没有白流，没白流！……”

彭德怀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昏了过去。一个家伙又抓住彭德怀的后衣领，一边辱骂一边将彭德怀的头往桌角上不停地猛碰。

彭德怀被摺在地上，满头淌着鲜血。

过了好一阵，彭德怀才发出呻吟。

一个家伙拿着事先写好的纸，喊道：

“起来签字！……签字！”

彭德怀喘息地说：“让我……看看。”题头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彭德怀将纸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匀一会儿气，用尽力量慢慢站起来。肝部的剧疼使他踉跄了几下。他用手按住疼处，终于站稳，对在场的人说：

“我有罪！”

说着，彭德怀一拳猛击桌子，雷霆般怒喊道：“我的罪就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说罢，彭德怀又一次昏倒地上。

年近七旬的彭总，就这样一次次地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经医生检查，彭德怀第五根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又发高烧，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能吃东西，明显已被打成内伤。

尽管彭德怀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满脸是青一块、红一块的伤痕，但仍然无休止地批斗他。衣裤有几处被撕破了，脚上穿着一只棉鞋一只单鞋，还被迫弯腰90度。

批斗的间隙，彭德怀去厕所，他走路已很艰难，从厕所出来，抱着一根柱头大口大口喘息不止。突然，一个穿绿军装的人冲到他面前，大声喝道：

“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

说着，抡起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彭德怀被打倒在地上，这人一只脚踩在彭德怀胸口上，骄横地问：

“你，还认识我吗？”

彭德怀在地上微微睁开眼睛，说：

“认识，我认识你！”

说着，彭德怀一个翻身坐起来，象头暴怒的雄狮，厉声喝斥道：

“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差一点没有枪毙了你！”

彭德怀一句话，吓得那穿绿军装的人扭头就跑。彭德怀喊着那家伙的名子，不停地说道：

“我当年没有枪毙了你，真可惜！真可惜！”

批斗结束了，折磨并没有结束。

彭德怀和当年“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遭难人张闻天一起，被五花大绑，插上长长的箭标，押着在人群夹道中游街示众。走不多远，两位老人瘫倒在地上。彭德怀喘息着说：

“让我，让我休息一下……我想喝口水，一口水……”

一伙“造反派”哪理这个，一边恶狠狠地叫骂，一边朝两位老人脸上身上吐唾沫。然后，从地上架起彭德怀和张闻天，拖到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上，拉出去游街示众。

彭德怀怎么也没有想到，8月4日下午，经过精心安排，他被揪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批斗。陪斗的除了张闻天、李培之等，还有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

在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着手臂，做着“喷气式”押进会场。他的妻子浦安修也做着同样姿势被推在彭德怀跟前。自从1965年彭德怀去“三线”前二人话别后，已有二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此时此刻在这种场合见面。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后，再也经受不住肉体的折磨和精神摧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随即几个人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硬将她脚不沾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被蹂躏得失了形体的浦安修，发疯似地喊道：

“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

任凭他喊破嗓子，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呼喊被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淹没了。从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又有几个人上来踩住他的两腿，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脸上青筋暴涨着，嘴唇咬出了血，血顺着下颚流下来，滴在胸

前的大牌子上。

批斗会后，北师大“红卫兵”将大卡车开来，打算像北航那样游斗彭德怀。

游斗先在院子里进行，一顶用铁皮和纸做成的两米高的大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顷刻，他脑袋的四周便有血迹溢出来。

批斗还在升级。

北师大刚批斗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批斗会。除彭德怀之外，还有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彭真、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许光达、陆定一、张爱萍等。

在当时的“疯狂”气氛中，批斗彭德怀成了一种“时髦”，许多单位争来抢去要批斗。仅7、8月份，彭德怀就被批斗100多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一次次又响起来。待大批斗的风潮过去，风烛残年的彭德怀，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1968年3月，彭德怀被迁移到第三个监护点——什坊院，过着孤独的囚禁生活，终日自审自责。除了读书、看报，便是写交代材料和接受充满敌意的提审。

1970年9月17日，“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个报告：《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宣称：“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

1972年12月底的一个寒夜，彭德怀被迁移到第四个监护点——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政法干校。

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长期得不到申诉的冤屈，终于使彭德怀病倒了。他大量便血，于1973年春末住进“301”解放军总医院，医院诊断为直肠癌。

4月12日夜，彭德怀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身上穿的，还是六年前揪来北京时的黑棉袄，黑棉裤，前襟、袖口和膝盖的部位都缀上了补丁。致使一群医生、护士惊讶地议论：“怎么把个掏大粪的老头送到了这里？”

很快，医生、护士们知道了，这老头是专政对象。床头病历卡片上写的是：“145”号。（彭德怀在政法干校代号是5，来医院住14病室，故被专案组定为“145”。）

于是，彭德怀这间10平方米的病房成了医院一个特殊地方。除卫戍区、专案组、医务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病房，不准任何人不通过哨兵给病人送东西。门口站着看守人员，门窗紧闭，窗户用报纸从下边直糊到顶端，屋里一缕自然光线也看不到。为限制彭德怀活动，连裤带也被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被故意弄坏。陪伴他的只有疼痛、冷清和死寂。他仰天长叹，并喋喋不休地呼喊：

“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

彭德怀多次指着床头病例卡对医务人员说：“我不叫‘145’号，我是庐山那个彭德怀！”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彭德怀做了手术。

手术后的彭德怀看完“十大”公报后，气愤地将报纸扔到

了地上。对着查房的医生、护士，他愤愤地说：

“王洪文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他有什么功劳？有什么才能？有什么威信？让他当我们这么一个大党的副主席，开什么玩笑？”停了一会儿，他叹口气，放慢语气说，“我怎么也想不通，在庐山，你们大家都晓得的，我那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私人信件，是供主席参考的。可不知怎么搞的，第二天一开会，与会者人手一份，变成‘意见书’啦！这就不得了，性质变成了反党，变成了第八次党内路线斗争。一些同志让我顾全大局，我认了错，可为什么到现在不给我甄别平反、落实政策？”

让医生、护士听这些话，又有啥用呢？医生、护士只好宽慰他，不要过于激动，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手术后的恢复。

到1974年9月，彭德怀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肩部、脑中、肺部，他被最可怕的病魔包围着。侄女来看他，他的舌头发硬，说话已经很困难。但仍然嘱咐侄女：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清醒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话说出来。当医生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他只顾诉说所想的心事，专案人员和哨兵上前干涉，他也毫不在意。

“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

“我这个人一生有许多缺点，”彭德怀说，“我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对革命同志没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阴谋，我可以挺起胸膛，我问心无愧！”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

“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

“你要坚持治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轻了些吧？”

“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这样死，死不瞑目！”

1974年11月29日下午，彭德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满腔的怨恨、忧愁、痛苦、遗憾、希冀留给了这个世界，孤苦伶仃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喊出的最后声音是：在庐山我没有错，我说了几句真话呀！

这声音弱得连在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

但这声音，强得震天震地！

他说了真话，他被扣上顶莫明其妙的假帽子，最后，又被那虚假的罪名折磨死了。

人死了，罪孽还没有赎完。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费用是从他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骨灰盒被送四川成都，存放在殡仪馆的暂存处。骨灰盒上写着：王川，32岁，成都市人。

他想最后报效家乡父老的遗愿永远无法实现了。

他说了真话，遭受了无情的批判；一个并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断送了他的一生。

假和冤在这里扭结得多么紧密呀！

四年以后，彭德怀一直耿耿于怀希冀的“洗却冤耻”的遗愿才得以实现。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

这一天来得太迟了，彭德怀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个“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又伫立在天地宇宙间。

○从掏粪工人到“工贼”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文革”中掀起的一股妖风。

时传祥，北京市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人。1959年，他出席全国群英会，刘少奇主席和他握手照相。

就因为这张照片，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6年12月。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给时传祥扣了顶帽子：“时传祥是个工贼！”陈伯达也一唱一合地说：“时传祥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姚文元也在一起摇唇鼓舌地说：“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

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古脑儿压过来，一夜之间，劳动模范变成了“坏人”。

清华大学一伙“红卫兵”来揪时传祥。并欺骗说，要请时传祥去做报告。清洁队领导看气候不对，再三拒绝。他们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凶相，说：

“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已经点名了。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说着，几十个人一窝蜂窜进清洁队，到处乱搜。最后将时传祥强行推上汽车拉走了，一关就是十几天。回来时，时传祥

脖子上已经挂上“工贼”、“粪霸”的大牌子，还勒令接受群众“专政”，随时听候批斗。

他们造谣说：“时传祥是坏头子，他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汽车。”

这时，时传祥岳母还健在。造谣说谎竟到如此地步。

时传祥每天被游来斗去，最多一天达到四、五场。

时传祥还是不屈服，不胡说。

“造反派”见单批斗游街“镇”不住时传祥，竟对他下了毒手。有个家伙出主意说：

“不老实，就给他‘端正端正’态度，只要不打死，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传祥便被带到一个远离工人宿舍的暗室里，接受审讯拷问。他们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缠上铁丝制成钢鞭，一鞭抽下去，时传祥身上就是一道血印。

时传祥忍着剧疼，呼喊道：

“毛主席万岁！”

“造反派”赶忙用烂纸塞住时传祥的嘴不让他喊出声。

时传祥失去了知觉。

幽暗的灯光下，时传祥从昏迷中渐渐醒来。他看看那几个已精疲力尽的审讯人员，辩解道：

“俺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说给我，不能这样打人啊！”

“要你承认反党。”

“俺热爱党，没有党的教育，俺哪能有今天。”时传祥说，“俺时传祥要是反党，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

“你反毛主席。”

“俺从小受苦，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俺全家。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你是工贼！”

“俺不是工贼，俺什么时候也没背叛过工人阶级！”

“你和王光美跳过舞！”

“俺从来没有见过她。”

紧接着，是一阵雨点般的皮鞭抽打。

一次次酷刑拷问不算，“造反派”不准时传祥看病，定量减去一半，不准吃细粮，只准吃窝头咸菜。顶多给一碗二分钱的白菜汤。

时传祥夜里受“审讯”，天不亮就逼着起来，到各清洁分队去弯腰“请罪”，来回跑一趟就是几十里。时传祥人瘦了，腰弯了，身上全是青一块、肿一块的伤痕，走路拄着棍子还东摇西晃的。

清洁队总支书记问过：“江青说时传祥是工贼，根据是什么？”

这位党总支书记立即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陪斗500多次；

一位老工人保护过时传祥，被拉出去陪斗了七次；

一位青年工人不同意批斗时传祥，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

在“牛棚”里，时传祥脸色蜡黄、浮肿，一日日熬煎着。

1971年，已被摧残得身体极度虚弱的时传祥，被赶出北京，送回山东老家。

时传祥病势沉重，当地诊所又不敢给他看病。家属蒙受株

连，小儿子不能参军，闺女没资格上学……。

1973年入夏以后，时传祥连下炕都十分困难。眼看病情一天天恶化，一家人求朋靠友，含着泪做了副棺材。时传祥看见了，说：“不用给我预备这个，我死了，一烧就行了。”

说到死，时传祥并不怕。可是，能这样死吗？冤还没伸，自己问题还没弄清楚，这口气难咽啊！

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时传祥被接回北京，住进了医院。

进传祥的病延误的时间太长了。他住院一年零八个月，于1975年5月19日含冤死去。

他没能看到给自己平反的那一天。

○翻译家的悲剧

傅雷，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凝聚在15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五百万字。

傅雷有两个儿子，长子傅聪，次子傅敏。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1957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自从他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自然也成了“批判”对象，还一度被召回国写检查。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儿子的出走，对傅雷又是个沉重打击。直到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

谁知阶级斗争的弦，刚松动一下又绷紧了。

1966年，“左”风狂卷，飞沙走石，席卷中国大地。

8月30日夜，傅家大门响起急骤的拳敲脚踢声。

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挖地三尺，连埋在花下当作肥料的带鱼鳞，都被高度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造反派”听说傅雷夫妇曾在小花园里埋过“变天帐”。

连屋里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依旧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忽然。从阁楼里传来惊人的消息：查获傅雷“反党罪证”。

啊，那是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一只箱子，傅雷从来没打开过。“造反派”敲掉箱上的锁，从里面查到一面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又从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一张宋美龄照片。

“大右派傅雷不老实！”

傅雷知道，如果说出箱子是谁的，谁就要遭殃。他咬住一句话：“箱子是一个亲戚的！”

“打倒傅雷！”

“傅雷必须低头认罪！”

9月2日上午10时，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头上戴着高帽子，四周是黑压压的大字报和人群。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撕成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放上方凳，以免将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傅雷夫妇1932年1月结婚，整整34年，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共赴危难。这天，这夫妇俩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在遥遥长夜愤然离开了人世！

○“人民艺术家”老舍惨死

老舍，中国著名作家。以《骆驼祥子》著称于世。1966年8月23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天气沉闷燥热，如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的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场景。一队腰扎皮带，手拿“红宝书”，高唱《造反有理》语录歌的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他们闯进编辑部，将刊物、文稿撕得乱七八糟，又冲进会议室，口口声声要讨伐“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一边用剪刀将一张张皮沙发戳满窟窿……紧接着，他们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四十多个“牛鬼”站成一圈，一个个脖颈上吊着黑牌子，腰弯成九十度。十几个女红卫兵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牛鬼”们的脊背上猛抽猛打。

当打到二十几下时，老舍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什么也看不清。下午四点半，老舍和“牛鬼蛇神”们被押解到国子监孔庙街。那里已堆满了小山似的京剧行头。他们点着戏装，手舞演出用的木枪、木刀，逼“牛鬼蛇神”在滚滚浓烟中跪成一圈，用木刀木枪在他们头上抽、打、砍。老舍的头上被砍破，鲜血从头顶上沁出，顺着额头、脸颊，流进脖子里。

入夏后，老舍心情很坏，夜里曾大口吐血，总量竟达大半痰盂。送医院后，医生要他住院。出院后嘱咐他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赶上了上边那一幕。

从文庙回到文联，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批斗老舍。他们的拳头、皮带、皮鞋、唾沫全向老舍身上发泄。

他们审问他并挑衅性地提问。

老舍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的“不老实”招来更加残酷的毒打。

老舍抬起头来，不再举黑牌子。

“低头，抬起牌子来！”

老舍用最后的微弱力量，将手中的黑牌子朝地上扔去。

有人想出“妙计”，想把他从红卫兵手中抢回来。他们说老舍这拼死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送交专政机关法办。于是争论一番后老舍被推进汽车，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丧失理智的人群包围着汽车，汽车寸步难行，无数拳头敲打着汽车外壳和玻璃。在派出所里，“革命”群众不顾所内人员的阻拦，对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

老舍夫人用一辆三轮车将他接回家，已经是凌晨了。他回来时还被告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单位报到。

第二天，老舍按时离家去上班。不过，他没去单位报到，突然失踪了。

临近中午，老舍居住的胡同口挤满了人。院子里、屋里全是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四周贴满大字报和标语。他们是来揪老舍的。他们院里院外，屋内屋顶搜遍了，也没找着老舍。

老舍到哪里去了呢？

25日早晨，一位住在太平湖附近的演员到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湖也仅有十几步远。演员看到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喊来远处几个住湖边的渔民。人们七手八脚从湖里将人捞上来，又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睛、手杖、和钢笔。从制服口袋掏出工作证。上面

写着死者的名子——老舍。

老舍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双千层底布鞋。家属赶到现场，已经是25日下午了。老舍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天的日晒，衣服鞋袜已经干了。他没有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衣裤已很凌乱，显然亲属来前已请来法医进行过检验。老舍遍体鳞伤，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斑，还有大块大块青紫色瘀血。

单位造反派给亲属的通知上写着：舒舍予自绝于人民。

老舍死了，又被扣上顶帽子。

据公园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

悲剧，发生在午夜。

老舍是自杀、还是被杀，又一桩千古迷案。

但有二点很清楚：

是含恨投湖自杀？！

是受迫害致死？！

第四章

“文革”冤狱之最——文字狱

○“李玉和招了”○“红宝书”与旧黄历○“写错地方”的少年反革命○错看一个字被打入地狱●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一句话招来天大横祸○污蔑“指路灯”罪○祸从口出○新“半夜鸣叫”说○语录对错招来祸○“改名”也有祸与福○“比着葫芦画个瓢”○张木匠的花开花落●“三家村”冤狱●“山药蛋派”鼻祖留遗憾○尸骨难存魂荡何处○名门之后坠楼身亡○他突然失踪被秘密绑架●骇人听闻的千古奇案○野火烧不尽的小草

文字狱，在“十年浩劫”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回溯

历史，它同样有着根深蒂固的远源。

高度集权，封建专制，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皇权至高无上，成为人与神的主宰，皇权的意志牢固地统治控制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严密控制统治下，文化思想的活跃，不能不是高压政策重要的关注对象。千百年来，一大批著作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只是由于用自己的笔在纸上发表了不同政见和言论，随即遭到统治阶级无情的棒杀。冤狱四起，腥风血雨，形成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是因文字而兴起的刑狱。“文字狱”所罗织的罪犯，不同于其它的刑事犯。他们都是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甚至很有地位的人，他们所谓犯罪活动，往往因写了些诗赋文章。这些诗赋文章，并非全部是以针砭时弊为宗旨，更多地只是无意中触犯了某些禁律规条，有的只是穿凿附会，强行罗织罪名。作者或言者因文字而下大狱，因文字而被杀头、流放，甚至于抄灭九族。

“文字狱”起着消灭异端思想，禁锢人们精神意识活动的特殊作用。

文字狱成了中国传统国粹。

在文字冤狱下，多少人被凌迟、腰斩、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多少冤魂在冥冥世界里呼号游荡？

据不完全统计，仅清代乾隆一朝，就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可以想见，当时人们被迫有口难言、禁若寒蝉的情景。

雍正年间，翰林官徐骏给皇上写奏章，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皇帝见了，立即将徐骏的官职革去。后来又派人搜查，在徐骏的一本诗集里，挑出句诗：清风不识字，

何事乱翻书？有人附会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

徐骏犯下诽谤朝廷罪，斩杀身亡。

一个错字，丢了官；

一句诗，丢了性命！

光阴如梭、日月如流。

人类从远古的蛮荒走来，走向文明。

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个最根本的差异，正在于对生命的态度。无数雄辩的事实表明，人类历史的曲折，正是由于无数次民族、阶级、宗教和个人之间无休无止的残酷仇杀造成的。从一次次重演的巨大悲剧中，从一次次重现的荒烟野蔓中，人们分明看到了文明一次次毁灭又一次次重现的历史断层。有多少智者的生命和其辉煌的里程碑，在腥风血雨中化为乌有、沦为废墟，只能在冷风残照里，任人凭吊！人类不得不一次次重新开始其艰难的文明跋涉。而一次次的“重新开始”，无不意味着众多生灵的永久遗恨，意味着他们人生努力成为枉然！遥想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文明鼎盛时代，无不和社会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睦息息相关，而他的衰落，无不是战乱和杀戮所至。

文字狱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固然和封建专制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它产生的根源，无疑是封建地主阶级自私、保守、落后、残忍阶级本性的反映。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惜采用扼杀民族思想、摧残民族文化、制约民族正常发展的手段，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后果。我们冷静的、仔细的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开始落后于世界，丧失其以往所保持的领先地位的时候，正是文化专制及

文字狱愈演愈烈的时候。它无声地对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作出客观的回答。

盘踞在中华大地上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彻底铲除了，中华民族在旧日废墟上建设起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我们在清理旧制度的时候，没有同时清除几千年来毒害人们思想灵魂的垃圾，致使渗透在民族血液中的劣根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阻碍历史的进程，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上，留下新的伤痕。

现在人们明白了，酿成这一次次祸患的根子是一个“左”字。

邓小平同志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文字祸患。

○“李玉和招了！”

在漳卫河边上，有个回民聚集的村庄。村庄在附近属大村，颇有名气。更使它出名的是“文革”中村里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宣传队青一色能说能唱的姑娘小伙子。他们村里演，公社演，县里演，比县剧团还受欢迎。宣传队还到临近的外省演出过呢！

全区要在这个村召开宣传工作现场会。消息传来，宣传队员个个喜上眉梢，别提多乐了。

他们连夜布置任务，分配角色，投入紧张的排练。

宣传队这回要在全区爆个冷门：一个农村宣传队能演出

大型样板戏——《红灯记》。

现场会如期召开了。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代表云集这个村，村子一下子像变小啦。

村当心的露天舞台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演出开始了，会场静下来。

剧情发展到李玉和被捕，鸠山施尽酷刑，要让李玉和屈服，交出密电码。

鸠山抓耳挠腮，思索着办法。他命令行刑宪兵，一定要撬开李玉和的嘴。

幕后传来严酷的行刑声。

一个宪兵快步跑上台来，立正报告道：李玉和招了！

是紧张？慌张？怎么将“李玉和致死不招”说成“李玉和招了！”

扮演鸠山的演员立刻楞怔了。

台下一片哗然。

紧急中，大幕急匆匆合上了。

扮演宪兵的演员这才醒过神来，自己闯下大祸了。

一句台词念错，而且是极关键的一句台词。扣上顶恶毒诋毁革命样板戏的帽子，不被整死也得掉层皮。

趁着忙乱，趁着夜色，他连夜逃之夭夭。在外乡，在他乡流浪。

○“红宝书”与旧黄历

这个小故事和上边的一折，几乎能接续上。

但它发生的地点却相隔万里。这故事发生在大西北。

场景还是舞台。演出剧目同样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剧情发展到：李玉和酷刑受尽，就是不交密电码。鸠山万般无奈，决定亲自到李玉和家搜取。

李奶奶和李铁梅在家。

鸠山来到李玉和家，摆出伪善面目，施展骗术。他向李奶奶要一本书，就是李玉和带回来的那本书。

李奶奶吩咐铁梅去里屋找找。

铁梅下去了。不巧平日演出，拿上场的那本“黄历”就在后台，今天咋也找不着。扮演李铁梅的演员急忙从自己衣服口袋拿出随身带的“红宝书”，又上场了。

李铁梅来到台前，把书递给鸠山。

鸠山拿过一看，愣住了。怎么是“红宝书”？平时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蓦地占了上风。他想：给我的是“黄历”，我下边还有台词呢！怎么能将“红宝书”诋毁成“黄历”？太反动了！

于是，舞台上的鸠山振臂高呼：

“打倒李铁梅！”

整个剧场一下子全乱套了。

大幕合上，演出停止。就在后台，召开了一场批斗会。

“李铁梅”将“红宝书”当“黄历”送给鸠山，是非谤学习“红宝书”的热潮，扮演者扣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李铁梅”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打倒”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是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是恶毒破坏“革命样板戏”，扮演鸠山的演员也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写错地方”的少年反革命

“文革”中，有不少专用名词，一提到这些词，就知道其内涵，象“万寿无疆”、“光芒万丈”、“红太阳”等等。

在A县S村有这么个少年，才十三岁。在农村，大字报、大标语虽不象城市那样铺天盖地，但也不少。各种消息、快讯、以及对本村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批判、勒令等，也是当时农村一大景观。

农村当时经济拮据，纸、墨都因陋就简。这少年贫农出身，字写得还工整，“革命造反派”就让他抄写各种大字报。

墨用完了，这少年听大人说锅底黑拌点胶，熬好一样当墨用。于是弄来锅底黑，拌上木匠用的胶，在锅里熬好了。

他想先试试怎么样。手拿板笔，蘸上锅底黑要试，可身边没现成纸。无巧不成书，屋檐下卧了口大白猪，昏昏正睡着。于是少年用板笔在白猪身上写下四个常写的字：“万寿无疆”。

猪醒了，跑到街上。看见的人无不惊呼：怎么在猪身上写这句话？

“革命造反派”立刻追查，追查到少年头上。

他被冠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戴上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专用名词”写错地方，招来杀身大祸，念他贫下中农出身，年龄尚小，没有投入大狱。而在村里，与“五类分子”为伍，由群众监督劳动。

○错看一个字被打入地狱

他是报社的一位校对，在冀南一家报社工作。

报纸排出样子，他负责看校样。那工作是枯燥的，但必须细心、认真。有时是责任重大。

这天，他看一篇庆祝集会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出现了好几次“万寿无疆”这个词。这个词他几乎每天见，太熟悉了。可是，一个“别”字从他眼皮下滑了过去。“万”字被错排成“无”字。

一字之错，意思大反。

事故责任追查到他头上，纵然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楚。他缄默不语。等待发落。

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头上，被送去服刑——劳动改造。

只因为一个别字从他眼皮下溜了过去。

无独有偶，在大西北某农垦农场，有个上海支边青年，他文化不高，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闲待着，无事可做，后来报名支边，到了大西北。

家里给他寄了本装帧精美的语录本。在“文革”时代，能有本最新最精美的“红宝书”，是十分幸福的。

他感到很幸福，很自豪。

他拿起笔，在领袖像下，端端正正写上了“万寿无疆”四个字。

字写得幼稚，还有点歪，但看得出是一笔一划写下的。

一天，一个班的战友借他的“红宝书”，他慷慨地递给了对方。谁知对方翻开一看，立刻露出惊诧之色：“啊，你犯大罪了！”

这位小伙子一下子愣怔了。

他将“寿”字写成了“寺”字。

连起一读，是条反标呀！

他已无口辩解，表白自己。

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他戴到头上。帽子戴在头上，就由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劳动。

他本来就不爱说话，自此，他彻底沉默了。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一九六八年时，她才八岁。

她生活在Y省G市。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

“文革”开始后，市委机关分成了两派。她父亲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组织性强，“文革”之初大大小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干一星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越轨的事，对立派找不到把柄，要搞垮这一派是困难的。

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她父亲这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放在屁股下边坐上了。对立派里面有个很精明的人上前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伟大领袖的照片。那时的报刊杂志几乎全有领袖像。这个头头被对立派揪出来，罪名是“侮辱伟大领袖”，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军宣队马上宣布，她父亲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立即垮了。开始抓坏人，凡是过去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都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仍拿她父亲没办法，抓不住他的短儿。

她父亲过去当干部处长时得罪过人，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方设法要把他整下去。又派了不少人内查外调，找不出问

题怎么样整他？

这天，在市委家属院大院墙上突然出现了条反标。

公安局立即来人勘察现场。看了现场后认定，是一个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现由是：一反标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子站着写高低正适中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象小孩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类反标不会写职务，直写其名，“打倒×××”。

定下调子，先对大院小孩排队。住这个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小孩总共十一个，排排队，确定下四个重点怀疑对象，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小孩。

这时，她父亲对立面那一派插手这桩案子，理由是协助破获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造反派”一插手，怀疑对象就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现由是她爸爸反动，又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孩子写反标。

攻击目标是她父亲，棍子却打在年仅八岁的她的身上。

她被造反派“监禁”起来。

在“造反派”眼里，八岁的孩子是好对付的。他们“破例”拿糖哄她，让她承认是她父亲教唆她写的反标。

从小，她记得爸爸就教她：为人，绝对不能说假话。

“造反派”拍着桌子吓唬她，说要是再不承认就去打她爸爸，还告诉她要使什么法子打：用钢笔扎他的眼；用绳子勒住脖子不许吃东西；活活饿死他；用刀子一块块割他的肉，手指头、鼻子、舌头、耳朵，然后扔到动物园的笼子里喂老虎……她害怕了，这些人要残害父亲，多么残忍啊！爸爸是个好人！

她下了决心，任你们唬、哄、吓，我决不乱说！

最后，他们说会枪毙她。

起先她不懂啥叫枪毙，他们告诉她，就象电影上那样，把你用枪打死。

她被带到刑场，是一片开阔的洼地，几个死囚犯就在她身边。那几个犯人都绑着，没绑她；对面一排人拿着枪，其中一个人的枪口正对着她。忽然，她看见爸爸在不远的人群中间。她想跑过去叫声“爸爸”，只听行刑的头头一声大喊：

“放！”

“呼”地枪响了，她身旁的犯人一个个栽倒了，有的脑袋不见了——她真被吓得哭了。

可怜她才八岁，就当死了死刑的陪绑着。

她始终没有胡说。

她被放回来，照旧跑去找小朋友玩，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还朝她扔石头子儿。一个过去与她要好的女孩竟骂她：“打倒小反革命！”

“小反革命”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身上，十几年抬不起头来。上学困难，升学更困难，她就象被管制的“牛鬼蛇神”，受人歧视。平时不敢多言多语，不敢与同学玩和说笑。下课后，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换起同学们的好感。有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人去拉粪，谁也不去。无奈只得派她去，说：

“粪很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觉得粪不臭了，你的灵魂就改造好了！”

她知道，背上那块石头仍然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

“四人帮”粉碎以后，她爸爸所在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

才发现一份有关她的材料，才说要给她平反。

“平什么反”？当时她才八岁，关押也好，陪法场也好，矛头是对着她爸爸的，并没有给她“定性”啊！

其时，她还没工作，落实什么？

实实在在，她忍受了一个八岁孩子难以忍受的打击和摧残，终生难愈，但政治从来不对人的灵魂负责。

对一个无辜的八岁孩子施以这样的酷刑，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一句话招来天下横祸

全国解放后，国家不生产高级轿车，毛主席曾指示，要尽快生产出自己的国产轿车。1960年，周总理也指示，要加快国产轿车的生产步伐。

当时，国家领导人中陈毅乘坐的轿车最高级，是奔驰。陈毅将这辆车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供厂里生产时参考。1965年，一辆三排座“红旗”轿车送到北京，要送给党中央。彭真先坐上试着在长安街跑了一趟。觉得轿车后座可移动，很方便，主席在车上困了还可以斜靠着休息休息。

彭真也提了建议。轿车侧标上是三面红旗，彭真说留一面就行了，一面红旗就是毛泽东思想。

“文革”开始，彭真遭批斗，又将这句话翻出来，罪名是“疯狂反对三面红旗”。

○污蔑“指路灯”罪

某村有位贫农老奶奶，思想非常积极，常常参加“造反派”

组织的“革命行动”。

一天夜里，“造反派”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老奶奶踮着小脚要去参加。儿子说：“你带上马灯，街上黑，深一脚浅一脚的……”

“不，我有灯。”老奶奶说“干部不是常说‘红宝书’就是‘指路灯’吗？我带着‘红宝书’就行了。”

老奶奶颠颠地去了。结果因天黑路不平，老奶奶在路上跌了一跤，崴了脚脖子，到了批判会场，“造反派”头头关心地问：

“这么黑的天，你咋不提盏灯来？”

老奶奶举了举手中的“红宝书”说：

“都说‘红宝书’是指路灯，今儿个我带着‘指路灯’，一点用不管！”

这下，“造反派”头头将老奶奶揪上了批判台。老奶奶诬蔑“指路灯”，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了。

批判走资派的大会变成批判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

○祸从口出

某村。

有位老贫农，每年都要把房间里的领袖像更换一次，以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一次，他正在换领袖像，不懂事的小孙女问道：

“爷爷，开会时听人常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咋咱家只挂毛主席像，不挂共产党的像呢？”

爷爷说：

“毛主席是人，共产党不是‘人’……”

这话传到“造反派”耳朵里，老贫农一下子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新“半夜鸡叫”说

“半夜鸡叫”是小说《高玉宝》中的一章，被选进课本，可以说家喻户晓。

这里说的是“文革”中的新“半夜鸡叫”。

深夜，K省C县某村办学习班时。一个臂戴红袖章、身穿绿军装的“造反派”头头，白天不下地，睡足了觉，晚上熬开了群众。他正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教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念一句，下边跟着学一句，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后来，他要大家一句一句地背诵。他胸脯一拍，右手一挥说：

“忠不忠，看行动。谁会背，回去睡！不会背的，熬到鸡叫头遍再回去。”

话音一落，人群中几个认识字的人，一个个都背了下来，过了关，回家了。剩下几个上不了架的笨鸭子。

“沈保安，该你啦！”红袖章一喊，那个叫沈保安的人站了起来，他年过半百，不识字，脑子不开窍，说话结结巴巴，背起来吞吞吐吐，背错不少地方。

“不行，不能过关！”红袖章脸一沉，“咚！”拳头敲在桌子上。沈保安眨了眨眼，低头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向红袖章求情说：“我这几天拉肚子哩，一会得去趟茅房。”

红袖章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就算是批准了。

沈保安没上茅房，却跑回自家的鸡窝旁，“咯咯——咕！”学起了鸡叫。他一叫，他家的鸡也跟着叫了，邻居家的鸡也跟着叫起来。

沈保安赶快跑回学习班，悄悄坐回原处。只听红袖章说：“现在鸡叫了，时间到了，今天散伙，明天继续学。”

此后，这个村的鸡总是叫得特别的早。

但是，没过多久，“半夜鸡叫”就被革命群众发现揭发，沈保安马上就被以“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

○“语录”对错招来祸

林彪的“活学活用”发展到后来，要求人们不论说话办事，都必须先背几句毛主席语录。比如到商店买东西，顾客先开口说一句“抓革命，促生产”，售货员则回一句“要斗私批修”，到食堂打饭要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然后递上碗说，“买三两米饭”。炊事员回一句“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然后盛饭。

搞对象对语录呢？

女的说：“妇女是半边天。”

男的说：“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然后才坐来说别的悄悄话。男的若做点小动作，女的便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男的则回答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压倒敌人，战胜敌人，绝不为敌人的气焰所压服。”女的有时也引用一句革命歌词，“第五不能调戏妇女们。”男的则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者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父子之间谈话也对语录。

父亲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然后才说：“小子，你把厕所扫扫。”儿子就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果不乐意干活，则可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踮脚就跑走了。

路上走路遇个生人，也对语录。常念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或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次，一个拉排子车的人正爬坡，车重，上不去。就向旁边一个同志客气地点一下头说：“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请求对方帮着推一把。对方也背一段语录作回答：“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悠悠走开了，并不帮忙。

如果不对语录，对一句革命口号也行。你说“社会主义好”，我可以对一句“不是小好，而在大好”。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也不为错。可是，语录对不好，也能酿成塌天大祸。

一次，一个男生到女生宿舍去，敲门后便说：“毛主席万岁”。

按正常情况，女的有两种答法，可接着喊，“万岁万万岁！”也可以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男的便可以进去。可是，屋里这个女生正一个人光着身子洗澡。偏巧前不久两派在门口辩论时，将门上的插销推操坏了，难以插牢。女生一时紧张，忙用肩膀顶住门扇，急不“择”话地说：“不要万岁，不要万岁！”意思是拒绝他马上进屋。

男生一听高兴了，心想：上次黄昏我想找你“那个、那个”，

你竟不答应，今天可算落到我手里了。当下将事情汇报上去。

这位女生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之初，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一次，有个小将把自己的红袖章敬献给毛主席，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小将回答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哪两个字，她回答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说她要武吗？她从此改名宋要武。这一下，全国的红卫兵都改起名来。姓杨的改名叫杨光照，姓党的改名叫党最亲，姓东方的改名叫东方欲晓，姓武的改叫武装斗。姓白的名字最难改，比如改叫革命、造反、跟党之类，一加上姓，没法叫了。有个姓白的小将干脆改姓红，起名叫红彤彤。当时还有个姓高的小将，起了个最是别致的名字，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名分成两部分，很像一个外国名字。就有人私下给他起个外号叫啰里啰索夫。后来他把名字压缩成“高——把——底”。

不过，非革命者不能乱改名。有个大学本科毕业的中学教师，晚上小将们到他屋里闲谈革命，他为了表示对小将们的敬佩，便引用毛主席那段关于青年人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语录，决定自己改名叫“八九点”。不料第二天全校墙上到处贴满了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把青年比成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改名的时间故意选在太阳落山后的晚八九点。这样，他后来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改名”也有祸与福

“文革”时，江青的政绩之一是为他人更名改姓。自此“改名”风刮遍全国。什么“忠东”“卫彪”“学青”等雅号应运而生。

××县有位小干部袁××，为了表现他的无限忠于，自己首先更名袁革命，为其弟更名袁造反。他嫌这还不够，又给妹妹改名袁保育。

接着，他又为父亲更名袁兴无，母亲更名李灭资。更可笑的是为已七十九岁的祖父更名袁反帝，为八十一岁的祖母更名王反修。

全家人全都改了名，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袁革命为全家更名的事让县革委主任知道了，十分重视，大会宣传小会讲，大加赞扬。

袁某人由此发迹，不久又迁升为县革委常委，红得炙手。

○“比着葫芦画个瓢”

老何上学时就爱画，画得还算可以。“文革”中到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画像，老何的手艺真派上了用场。

这天，他在学校院内画伟大领袖去安源的巨幅像，公社革委会主任顺路经过，发出一阵阵赞叹。

“老何呀，你真有两下子！”

老何立即表示出谦虚来，顺口说：

“不行不行，比着葫芦画瓢嘛。”

第二天一早，老何正要登上脚手架去画，一阵马达响，来了四个臂箍红袖章的人，宣布老何罪状：

“侮辱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绳子一捆，将老何带走了。

○张木匠的“花开花落”

卫河西岸有个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

张木匠膝下无儿，只有三个女儿。大姑娘年方十八，名叫金花；二姑娘十六，取名金环；三姑娘十四，取名金枝。真是三个姑娘三朵花，张木匠甭提多高兴啦。

时置“文革”年月。

村里“造反派”头头看上了张木匠大女儿。可这位头头品行不端，年龄又大，相貌丑陋，父女俩都不愿意，就拒绝了这门婚事。

第二天，街上给张木匠贴了张大字报：

张木匠思想反动，有三个女儿名字为证：中国历史上有个赛金花，她是洋人的大破鞋；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报上已点名批判是大毒草，小说中有个女人名叫金环，是个女叛徒；唐朝有个公主叫金枝，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张木匠女儿叫金花、金环、金枝，名子由来，用心不良。若不改成革命名子，革命造反派决不手软，坚决揪斗张木匠！

张木匠看完大字，又气又怕，回家来再三琢磨，还是改名吧。思忖半天，决定将三个女儿名子改成：爱国、爱民、爱党。他写了一张郑重声明，公布于众。

谁知这下惹出大祸。

张木匠被揪进学习班，“造反派”头头说：

“你小子竟敢公开声明爱‘国民党’，纯粹是现行反革命！”头头一锤定调。

随着一声“打”，一阵拳打脚踢，棍棒敲击，张木匠皮开肉绽，弄了个终身残废；三个女儿也受株连，横遭摧残，金花上吊，金环跳井，金枝精神失常……。

●“三家村”冤狱

所谓“三家村”，其成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在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以“三家村札记”为栏目，化名马南星，连续发表敢于讲真话的文章，谈古论今，议论风生，名重一时。但其时业已“通天”的姚文元率先发难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大抓“三家村”式的“反党小集团”。几百号人的基层单位，也应时大抓“三家村”分店。其打击对象多是舞文弄墨的笔杆子，当然也包括有所谓“反党言行”的普通群众，反正凑够人数即扣上“三家村”的帽子，罪名皆可用“莫须有”来概括。

“三家村”的三位当事人在受迫害中更是首当其中。

邓拓，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邓拓被控为“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1966年3月，北京城同往年一样，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但一股看不见的政治空气却与大自然的气候显得极不协调。31日，康生从上海带回了“最高指示”，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会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反省。不准外出。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邓拓写的文章总共一

百七十一篇。

1961年3月21日，邓拓发表了以倡导掌握更广博的知识为主题的文章《欢迎杂家》。文中写道：现在我们如果不能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姚文元声称他抓住了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领导工作”。然后无限上纲。姚文元写道：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小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地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的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姚文元又写道：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提出的。

姚文元这里对“杂家”二字一注释，再来个无限上纲，邓拓当然就冠以反党分子，妄图篡党夺权。轻轻松松一篇杂文，让姚文元这一引申，便成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文章了。

邓拓另一篇文章《堵塞不如开导》，他讲的是鲇和禹治水的两种不同方法：一个是堵，一个是导。前者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失败；后者这个方法符合自然的规律，结果胜利了。邓拓以此希望人们从中能领悟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凡事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否则就要失

败。

姚文元抓住文章中“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这半句话，从另一句中找出“一切事物”四个字，拼接成一句话加以批判。并对“一切事物”解释为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经姚文元这样一拼接一解释，邓拓便成了要求我们对“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的’”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了。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欲加之罪，竟用了“移花接木”法。

邓拓另一篇文章《说大话的故事》中，引用马谡真人真事和季孙氏、赵国方士的故事，并借用管仲的一句名言：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意在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邓拓写道：……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姚文元抓住《说大话的故事》《多学少评》《两则外国寓言》《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个鸡蛋的家当》几篇，诬陷邓拓利用这些文章刮起反党妖风，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种经济上的困难，集中掀起一股攻击总路线的黑风。

邓拓被扣上好几顶大帽子；以反对说大话，行反对大跃进之实；攻击大跃进是“吹牛”、“升虚火”、“发高烧”……

批判邓拓文章，所采取手段：移花接木、偷天换日、混淆是

非性质、断章取义、寻词摘句、索隐发微、牵强附会、无限上纲。

邓拓预感到，他在劫难逃了。

进入五月份，形势更加险恶，仿佛北京城要炸裂一样。声讨之声，如雷贯耳；翻开报纸，每天都有通栏标题：《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三家村”黑帮是民族败类》。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也尽是“彻底铲除”、“愤怒声讨”之声。这分明已经远远超出思想斗争、学术讨论的范畴。

5月16日，更大的打击降临到邓拓头上。《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宣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

“叛徒！”邓拓看到这顶吓人的帽子，一下子昏了过去。

经过一天的熬煎，即5月17日深夜，在一家人熟睡之后，邓拓拿起笔，写下自己最后的“申辩”。他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这几句话，已经流露出邓拓在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声讨声中，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紧接着，他给妻子写了封绝命书。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得很不规则，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

了，今后你们永远解脱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这是我国历代仁人志士恪守不渝的信条。就这样，一块晶莹的宝玉打碎了。这是5月18日。

邓拓是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用宝贵的生命，作了最后的抗争，实现了他曾立下的誓愿——艰危一命轻。

邓拓火化时，用的是假名。除亲属外，谁也不知道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什么人。

吴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三家村”黑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各种报刊杂志对吴晗实行围剿。这些声讨文章说：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又写了《海瑞罢官》，实际上都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很显然，吴晗在为被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一场文字狱案降临到吴晗头上。

1966年3月，北京市委做出决定，要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市郊昌平区大东流公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市委的这项措施，意在让吴晗换个环境，使他免遭“文斗”之苦。在农村，吴晗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听到声讨之声，不是“砸烂”，就是“打倒”。吴晗下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回北京，在民

盟接受批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从此，从围剿吴晗、《三家村》，扩大到在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揪《三家村》、《四家店》，揪各级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是以报刊杂志为阵地，进行所谓的“讨论”，演变扩大成以“批斗台”、“揪鬼台”为阵地，进行愤怒声讨式的“文斗”。很快，这种“文斗”不过瘾了，迅速发展进化为以揪斗，毒打，坐“喷气式”等各种形式的武斗。

1966年6、7月份以后，吴晗几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斗、揪斗、毒打。起先还文明点，只是在台上低头认罪、接受批判；不久，他就“坐上了‘喷气式’”。并遭毒打。揪斗必揪头发，后来头发也被扯得精光，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

当时，毒打所谓的黑帮分子是不分场合的。有时在批判台上拳打脚踢，有时在临上批判台前在台下先打，给你个下马威，在路上打，在关押的地方打，在家里打，总之是随时随地可以批、可以斗、可以打。

1968年3月，以“叛徒”为罪名，将吴晗逮捕入狱。至此，吴晗的悲剧并没有结束，法西斯式的毒打审讯，使吴晗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而且由于挨打造成的内出血，使他说话呼吸都十分困难。1969年10月11日，残酷的虐待使吴晗口吐鲜血，猝然死去。时年60岁。他没有倒在同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斗争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文字狱”中。痛惜！

目击者回忆吴晗挨斗情景——1966年秋，“造反派”在北大东操场上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很多人都被拉出来，吴

晗也在被揪斗之列。只见吴晗被两名红卫兵左右抓住胳膊，推上台来。

——从1966年到1968年3月这一段，我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天1—2场，有时一日三场。每场都是倒背两手，弯腰低头（喷气式）。有天晚上在食堂吃饭，吴晗也去打饭，我看他低头很痛苦的样子，看看没人，忙问：你怎么样？他用手指着胸口，没有说话，接着是一阵干咳，看样子他被打得重多了。

——不久，深夜里的猛烈的砸门声就常常把人惊醒了。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他们将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

——“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我们都受着“群众专政”，常常被拉出去一起批斗。忽然间我们都成了台上的“演员”，说也奇怪，“斗争会”好象也要由“著名演员”来挑头牌。不如此便不能招来群众。吴晗名气大，因此“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两派之间为了争夺“演员”，常常要在夜间把吴晗劫走，脸上还要涂上五颜六色，象个大花脸。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被对立派认出来。这实在是荒唐的恶作剧。忽然间吴晗不见了，过了几天，忽然又送回来了，有时为了参加一场“演出”，还要在夜间不断转移，那种奇特的生活真神秘莫测。

多么荒唐滑稽，多么残酷的精神打击！

吴晗惨死了。他的家呢？用四个最通俗的字就可概括：家

破人亡。

吴晗被关进监狱后，封建法西斯株连家属的魔爪便伸向吴晗夫人袁震头上。她百病缠身，却被强行送进劳改队，并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小浴室里。精神的重压、病魔侵袭、和法西斯的待遇，她很快垮了，全身瘫痪不能自理。仅靠年仅13岁的女儿小彦照顾。小彦每天要奔波几十里去照料母亲，还要照顾弟弟，还要替妈妈干分给“黑帮”的活。

1969年3月，袁震才被允许由两个孩子接出治病。当天半夜，袁震病情突然加重，两个孩子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可袁震是“大黑帮”吴晗的夫人，医院未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致使袁震病情急骤恶化，开始昏迷不醒。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她想喝口稀粥，儿子小彰赶快去找粥，粥还没找来，袁震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彦担起了照料弟弟的生活担子。

生活上超负荷的磨难，使小彦那脆弱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1973年6月，小彦患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或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她将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床头，日日哀悼。1975年8月，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提出：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去的书籍。

1975年秋，社会上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小彦与好友小李议论过“四人帮”，灾难来了，以影响“首长安全”和“攻击首长”的罪名，她被逮捕入狱。这一意外打击，使她神经更加错乱，她哭闹，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殴打。门牙被打掉了，头被打出血，头发扯得七零八落。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毫无人道的监护人员竟跑到医院非法审讯她。

在医院的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但小彦已被折磨得身心俱残。走投无路。在绝望中她选择了死。

1976年9月23日，小彦结束了自己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

“四人邦”被粉碎后，党中央给吴晗平了反。吴小彰也考入了清华大学分校，并有了个幸福的家庭。

廖沫沙：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1966年春天，这位被称为“三家村”里小兄弟的廖沫沙，正参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晨，收音机里播音员正用不同寻常的声音播送《北京日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历数了吴晗、邓拓和他的“罪状”。他一下子大惊失色。

廖沫沙的主要罪状是用文章攻击“伟大的党”、“社会主义事业，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进入夏秋之际，那种主要是“愤怒声讨”的精神摧残，被肉体摧残、灵魂毁灭所代替。他被揪出去没完没了的批斗，坐喷气式更是家常便饭。1968年，廖沫沙被关入临时性的“监狱”。这个监狱是一所学校改装的，囚室的窗户都按了铁栏杆，玻璃涂上油漆。从此，他与世隔绝，一晃竟达八年之久。八年中，在这铁栏杆封锁的小屋里，他精神备受摧残，肉体惨遭折磨。受审时，回答不上所提问题，便拳脚相加，打他踢他，他胸口猛挨一拳，立感心口绝闷，几乎晕倒。有一回，看守人员将毛巾塞进他嘴里，按在床上痛打一顿。看守走后，廖沫沙一抽毛巾，鲜血直流，一排牙齿被打松动了。1975年的一天，廖沫沙被管理人

员叫去。

“中央决定下放你去江西。”

“让我回家看看吧！”

“来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们用车送我和家人见个面也行。”

“不行，到江西后亲属可以去探望。”

这完全是流放啊！

廖沫沙终于没能与家人见面，他被遣送到江西一个林场，化名唐家权。

流放生活，从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历时三年。从1966年蒙冤，1968年入狱，非人生活竟达十年。

廖沫沙终于回到了百花争艳的北京城，经过二年多的治疗，他那受尽创伤的身体才得到恢复。

在“三家村黑店”里，他算是最最幸运的一个了。

“三家村”文字狱案，拉开了疯狂的“十年浩劫”文字冤案的序幕。

●“山药蛋”派鼻祖留遗憾

赵树理被誉为“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

山西省沁水县有个尉迟村，村子很小，总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相传原来的村名叫“吕窑村”。唐朝时，开国大将尉迟恭不满朝政，打死了脏官何宗，逃匿到吕窑村，隐姓埋名，以柳编为生。于是后来改村名为尉迟村。其实，这不过是望风捕影的传说，并无据可证。不过尉迟村确实有祖传柳编手艺的人不少。人民作家赵树理在清朝光绪三十二年阴历八月初七日，出

住在尉迟村。

一九四三年冬天，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到解放区采访，访问了边区的党政领导人之后，提出要见赵树理。他在边区访问的过程中，感到在人民群众当中，除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而外，赵树理是个无人不晓的人物。

大跃进的年月，到处在放高产卫星。一天，赵树理在山西下乡，他来到到一个大炼钢铁工地。

工地上人来车往，的确热闹非凡。在一个土高炉旁，堆放着很大一堆铁器，有犁铧、犁镜、铁釜、铁锅……有破旧的，也有好的还能使用的。他问一位干部说：

“把这些东西堆这儿干甚？”

干部回答说：“炼铁。”

“有的家俱都还能用呀！”

“这叫废物利用。马上要实现机械化了，用这些原始工具作甚？”

赵树理随手掂起一口八成新的铁锅问道：“这也是废物？”

“都吃食堂了，还要这私有财产有啥用？”干部们嘿嘿地笑着。

赵树理出席县委会，直接了当地提出所见所闻。谁知会上没一个人支持他的意见。对他这样有名的作家，照对一般干部批判他“右倾”、“观潮”、“秋后算账”、“否定群众大跃进成绩”……不好，他不但是作家，还是人大代表、八大代表。可他的意见又不能支持同意啊！

赵树理明显感到，他的思想越来越和时代不“合拍”了。他

在家乡搞试点,也十分不顺利。“五风”席卷全国,哪是一个公社的事?他决心将自己的想法、看法写出来,寄给《红旗》,也算给上级作个参考吧!可是,《红旗》主编陈伯达拿到赵树理的文稿,即摘录印发给全国文联,让作批判用。

赵树理被召回京,接受批判,说他写的“万言书”跟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都是大肆攻击“三面红旗”。

赵树理从内心感到困惑。

一九六四年,文艺界率先进行整风。

邵荃麟首当其中,他在大连“黑会”上,提出了反动的“《中间人物》论”。

赵树理是写“中间人物”的代表。因为在赵树理的作品里,看不见英雄人物,唯见“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卷了过来,赵树理当然难以幸免。

早在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中,就将所谓“写中间人物”论列为“黑八论”之一,要对其代表人物和作家以予批判。

赵树理早就上了“黑名单”。

在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指导下,《文艺报》发表了题为《“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已经将矛头对准周扬和赵树理等人。很快,周扬被点名,于是,六月间,在山西晋城街头的大字报中,除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之外,已经给赵树理贴出一些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即把赵树理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黑标兵”,给予批判。

次日,《山西日报》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提出

“打倒赵树理”的口号。

在赵树理下乡的晋城，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赵树理“独领风骚”。江青已经给他定了罪：一是和彭德怀“一样反动”；二是周扬“文艺黑线”树立的标兵；三是反动“权威”。有这三条“大罪”，当然该“打倒”了。

揪斗开始了。一天，晋城剧校的“红卫兵”揪斗赵树理，会场布置得十分森严，下边黑压压坐满了人。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赵树理被压上批判台。只见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赵树理”，还用红墨在名子上打了个大大的叉子。押解人员硬压着赵树理弯下腰，低下头。赵树理趁押他的人松手之际，立起身子把牌子摘下来，撂到一边。

“红卫兵”猛地愣住了，会场突然静悄悄起来。

“头头”一看冷场了，大声喝斥道：

“赵树理，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今天非叫你看看我们的厉害不可！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

“头头”领呼，下边黑压压人群忙举拳头，跟着呼叫起来。押解人将牌子给赵树理挂上，将头压下去。“头头”问：

“赵树理，你是不是黑帮？”

赵树理没有吭声。

“头头”的嗓音提高起来：

“赵树理你是不是黑帮？”

赵树理还是没有吭声。

“头头”气火了，声音变成了吼叫：

“赵树理你是聋子？还是哑巴？你说，你是不是黑帮？”

赵树理不聋不哑，对每句问话听得很清楚，但他不予置问。

“头头”暴怒了，举起拳头在赵树理眼前晃着：“赵树理，你说不说？”

赵树理这时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说：“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只不过是棵豆芽小菜。”

这下子惹恼了“红卫兵”，于是决定分成三班，摆开车轮战，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赵树理休息，用疲劳战逼迫他承认自己是“黑帮”。

一连批了两天两夜，赵树理还是不承认。第三天，还是轮番“战斗”。赵树理精疲力尽，实在支持不住了，便给娃娃们开了个玩笑。

他低声说：

“你们说是，那就是！”

赵树理有意把末尾的声调向高提了提，又缓缓地降下来。“红卫兵”心急火燎，光想早日取得“战果”，顾不上听仔细，便认为大功告成，总算攻下这个“顽固堡垒”了。他们欢呼一阵，唱起“语录歌”，后恐赵树理口说无凭，让他立个字据。赵树理毫不犹豫，写了个纸条。“头头”如获至宝，往语录本里一夹。

赵树理这才得以睡了一夜。

隔了两天，“红卫兵”召开“欢庆胜利”大会，赵树理又被压上主席台。“头头”让赵树理当众承认自己是“黑帮”，赵树理又不认帐了。“头头”庄重地从语录本里拿出赵树理写的纸条一念，这才发现，“你们说我是黑邦，那就是”这句话后边，带着个

很小的问号。变成“你们说我是黑帮，我就是？”语气成反问句，又不承认了。

“红卫兵”发觉受了捉弄，气得嗷嗷叫，一个劲地呼喊“打倒赵树理”的口号。

六六年八月下旬，晋东南地委也开始揭发批判赵树理。他被揪到长治，白天看大字报，晚上接受批判。有张大字报使赵树理猛吃一惊：

《请看赵树理的野心》：赵树理六一年去大庆油田参观，写了首诗。他写道：

任它冰封与雪飘，
江山再造看今朝，
钻林不做银蛇舞，
也与天公试比高。

“赵树理‘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他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狼子野心！还想和毛主席争高下！”

赵树理很清楚，写这张大字报的人，不是“红卫兵”娃娃，也不是与他不认识的干部，这些人能够根据赵树理亲笔写的从未发的诗来作文章，可见关系交往是紧密的。有人偷偷宽慰赵树理，赵树理感叹地说：

“我为这种故意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坏风气生气，这样下去，不知有多少人要无辜地蹲文字狱。”

赵树理平时说话幽默风趣，堪称农民语言大师。有人攻击他，说他解放后写的作品全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批斗会上，他惋惜地说：

“‘大毒草’，我还真不知是咋种的哩！”

批判赵树理的浪潮越来越猛。上海的“一月风暴”，夺了市委的权；

山西紧步上海后尘，是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

就在这时，姚文元在《红旗》发表文章，发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长文，硬把从“左联”时期以来的文艺史照着江青的《纪要》说成是“黑线专政”史。于是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等人都遭批判，有的迫害致死。又指名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是“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来个彻底打倒。

赵树理几乎天天被一帮不知从哪里来的“战斗队”揪出去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赵树理被长时间罚站。会后，两腿肿胀，一步也挪不动了。被人架着拖到会场外的卡车前，但他无力上汽车。这时，有个不长脑袋的家伙猛扑过来，照赵树理腰窝里就拼命连打几拳，赵树理被打得昏了过去。

赵树理的两条肋骨被打断了。然而，上门来揪斗的，还是接连不断。

后来，赵树理被关进“牛棚”。

赵树理被打得不成样子，但还是据理力争。有一回，一个什么“团”、“队”之类的一伙子人开着卡车把他拉到一个地方批斗。一张嘴就要他承认小说《锻炼锻炼》是株大毒草，他不承认，照例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

赵树理回到“牛棚”，有时背向火炉，一手捂着肋部，一手拿笔，坐在小板凳上度日熬夜。他的心在滴血，一个人民作家，怎么可能与人民“为敌”？他要用诙谐的笑话来驱散“牛棚”里沉闷的空气。夜深人静，看守人员不在，他就讲笑话。还忍着

伤疼，扶着床沿口打锣鼓点，小声唱上段“上党梆子”。以此宽松那冷酷的“牛棚”囚徒生涯。

一九六九年底，由于赵树理的内伤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治疗，胸腔发炎，引起严重的肺气肿哮喘。呼吸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坐在一只小板凳上通宵达旦不能入眠。他去看病，医生接过病历，惊讶地望着他说：

“作家赵树理就是你？”

赵树理忍疼说了句诙谐的俏皮话：

“大夫你说，到了这个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

一九七〇年，全国上下开展了“清队”，“一打三反”，赵树理头上又多了顶“皇冠”：叛徒。他被揪到晋城，又揪到长治，又揪到太原。斗来斗去，他的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六月间，他被军管专案组接管，寄押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绝。

这时，江青在一次会上又点了赵树理的名。六月二十五日，山西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展开群众性的大批判，写出高质量、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七月二十四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大块文章《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向赵树理发起更大规模的讨伐！《山西日报》辟有专栏，三日一个版，五日一个版，到年底发表批判赵树理的大小文章七十六篇。

一九七〇年九月份，几经交涉，才恩准亲属去探望囚禁中的赵树理。

亲属看过赵树理仅十一天，即九月十七日，在太原湖滨会

堂，举行万人大会，再次公开批判赵树理。会场内杀气腾腾，气氛恐怖。赵树理被拖到台上，他浑身已瘫软得一点气力没有了。押解人员还是强要他站到台中台口上，他咬着牙站了没两分钟就一头栽倒昏了过去。会场里一片混乱。

等他从昏迷中醒来，又逼他在囚室里写检查交代材料。五天之后，即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人民作家赵树理受尽“四人帮”的折磨摧残，含恨饮痛去世。

时年虚岁只有六十五岁。

“山药蛋”派鼻祖在黑暗中陨落了。

○尸骨难存，魂荡何处？

邵荃麟，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作家协会，为落实毛泽东这个指示精神，开始整风。

邵荃麟在整风中受到批判，罪证是，他在大连召开的小说创作会上，提出了“中间人物论”。在文学创作中，鼓吹写“中间人物”，用以抵制歌颂无产阶级先进人物。

“文革”开始后，对邵荃麟又来了次彻底清算。

他被扣上“黑帮”分子的帽子，运动伊始就被揪了出来。

邵荃麟和被揪出的“黑帮”分子一起，被赶出去游街示众。他们披麻戴孝，抬着个大大的纸糊的棺材，边走边唱“黑帮”之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是罪人……

多么巨大的人格侮辱！

1968年2月，邵荃麟被秘密抓走了。

那时，邵荃麟已患有肺气肿，不停地咳着，呼吸急促而困难。

邵荃麟被关在哪里，亲属谁也不知道。

直到1971年6月，干校军代表通知邵荃麟亲属：邵荃麟死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在退回的遗物中，只有一堆破烂被褥、衣物，还有一只表，几本书。那旧棉被上、裤子上都是粪便，裤子破得不能再破了，上面歪歪斜斜缝了好多长长的针脚。邵荃麟弥留之际的景象，可想而知了。

他的躯体已经不存在了，他的骨灰也找不到了。那冤魂呢？魂游何处？

留下的，是两顶沉沉的帽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名门之后坠楼身亡

郭沫若是当代文坛巨匠，谓大手笔。郭世英就是名门之后。

郭世英体格魁梧，聪明过人。据说长达20万言的《古文观止》，他默读两遍，就能基本背诵下来，可谓奇才。

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其时，正逢全国正掀起学哲学的高潮，就连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杂志不断刊登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运用“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中的各种各样的矛

盾的文章。“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的法宝。面对这种局面，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敢于提出许多十分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他们将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

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

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

.....

他们的讨论十分认真热烈，常常通宵达旦，甚至于放了假还利用书信交流来探讨。他们不断提出新的X。

X小组的行动和言论，引起北京大学和公安部门的注意，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在当时都是犯禁的。

有关部门从秘密截获的有关材料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有凑巧，被中国批判的赫鲁晓夫的名子，俄文拼写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顺理成章”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

当时，中苏正在论战。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这种厚待，是因为他是名门之后。

“文化大革命”运动象筛子，不会漏下一个角落。1968年4

月，郭世英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被四肢绑捆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续三天三夜，受尽了人身折磨和凌辱。4月26日清晨，他的手被反绑着，含恨从关押他的房子，一个三层楼上的窗口，“飞”了出去。

肝脑涂地，鲜血染红楼前的土地。死时，年仅26岁。

因为他议论的命题犯禁。虽是名门之后，仍落个坠楼身亡。对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可谓“效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他突然失踪被秘密绑架

峻青，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笔下的人物，丰满而深沉，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使人百看不厌。

《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山鹰》《丹崖白雪》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脍炙人口，广泛流传。

1968年2月27日下午5时多，峻青挨过批斗后，走出上海作家协会大门，在巨鹿路的常熟路口，被一个戴大口罩的人拦住去路。

这个戴大口罩的人是受“四人帮”干将吴法宪指使行动的。

峻青被秘密绑架。

经过突击审讯，峻青被用三叉戟连夜送往北京卫戍区关押。

在上海，谣言四起：峻青是特务，现行反革命。

人们传言，他已经死了。

峻青突然失踪后，“造反派”立刻抄了他的家。没收小说

《决战》初稿和《海啸》创作题纲，并包括采访素材。他的妻子也遭迫害折磨，逼她交代峻青的罪行。

峻青的二女儿，年仅15岁，含辛茹苦靠捡破烂攒钱，于1973年8月到北京，向国务院接待站提出申诉。

峻青后来被放。“文革”后才平反。

●骇人听闻的千古奇冤

由小说《刘志丹》炮制的是一桩千古奇案、奇冤。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妇。她选择写刘志丹这个题目时，起先曾有些犹豫。刘志丹被毛泽东称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誉他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李建彤觉得这个题目太大，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都还不够，加上和刘志丹的斗争经历相联系的，还有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她恐怕自己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后来，在工人出版社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李建彤才下决心动笔，投入紧张的创作。

一九五九年夏天，李建彤已经写了三稿，出版社想公开出版。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看过后，认为还不成熟，未到公开出版的时候。于是作者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写了四稿、五稿，写到第六稿，报纸便先发了其中若干章节。

大阴谋家康生素来对小说不感兴趣，从来不看这类作品。有一天，一个好拨弄是非的亲信对他说：

“你知道最近发表《刘志丹》这部小说不知道？”

康生摇摇头：“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很值得深思。”亲信煽动说：“写刘

志丹，我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以美化刘志丹为名，行替高岗翻案之实！”

“哦！”康生不动声色嗯了一声。亲信走后，康生卧在沙发上琢磨开了。第二天他即下令：所有报刊，一律停发小说《刘志丹》，又责令工人出版社突击印出六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康生不亏是位头脑发达的奇想“专家”。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颂扬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不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么？不是抬高一直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的地位，为他翻案吗？他苦苦思索着，谁是从陕北出来的？谁参与了这件事？对，习仲勋是从陕北出来的，又是西北局的副书记，又参与了炮制《刘志丹》这部小说。

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一张小纸条，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刘志丹》小说的作者，编辑出版者和曾看过小说稿子的人，都祸从天降了。

习仲勋不是小说作者，但看过小说，自然是“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了。

没过多久，毛泽东将康生写的条子，正式公布于众。康生有了尚方宝剑，语气更是凛人：

“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你们心里也明白，赤裸裸地为高岗翻案，没这个胆量，只能通过影射文学，来达到翻案的目的。……利用小说替高岗翻案，也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写了八万言书，而你利用小说美化高岗，实际上，也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

越扯越厉害，越吓人！

康生的本事不只是煽动对作者开火，他还有更高的一手，就是顺蔓摸瓜，上下左右，大刮株连之风。

习仲勋在劫难逃了。康生一口咬定：“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目的是为高岗翻案。”

真是舌头底下压死人。

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康生对着习仲勋的面喊道：

“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上有头目，下有手脚。你们的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有的在后台摇雕翎扇子，有的在前台冲锋陷阵，你们是想翻天哩！”

康生抢到了专案组组长的头衔。

康生亲自挂帅，进行“三堂会审”，先从李建彤下手。他们抢去李建彤的采访笔记本，按记录上的名单，跟踪追击。凡是笔记本上记名采访过的人，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这些被株连出来的，都得照康生的需要招供，又让一些受株连的人互相厮打、乱咬，谓之“敌打敌”、“分化瓦解”。又迅速将此案范围扩大到五个省份，最后下令，把五省有关人员统统调进北京“学习”。

这样，《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从一九六二年八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仍然没有结案。

“文革”旋风一到，《刘志丹》反党小说一案，自然升了级。

康生亲临小说作者李建彤的工作单位，质问这个单位的“造反派”：

“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斗这些人，你们还算得上革命派吗？”

“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也叫喊：

“反党小说《刘志丹》的要害，就是为高岗翻案。那些策划小说出版的、看稿子的，一个个全是反党野心家！”

《刘志丹》被定的罪名五花八门：

为高岗翻案；

为习仲勋篡党篡国捞取政治资本；

剽窃毛泽东思想；

以陕甘宁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

习仲勋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流放河南洛阳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受审16年，关押八年；

贾拓夫，国家经委副主任，早被撤职，“文革”时被弄到北京郊区某个地方囚禁起来，最后惨死在囚禁地；

马文瑞，劳动部部长，受株连关押6年；

白坚，一机部副部长，曾同刘志丹一起工作过，熟悉刘志丹的情况，向李建彤提供过素材，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尽凌辱，被揪斗致死；

刘宗焕，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不分昼夜地批斗、毒打，被沉入河中，含冤而死；

高丽生，工人出版社社长，被捕之后施以车轮战术，被肉刑折磨而死；

吕宁，工人出版社干部，被毒打成内伤；

周培林，遭受电刑折磨；

何家栋，小说《刘志丹》责任编辑，全家被赶到农村，工资停发，全家六口，每人每月只给五元生活费。饥寒交加，陷入绝境，他母亲和两个儿子生病时，求借无门，在病困中死去；

王悦贤、刘景华，普通群众，李建彤去陕北采访，路不熟，王、刘二人好心带路，惹下大祸。两位无辜者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含冤而死；

1962年以前，习仲勋曾吃过饭的一家饭馆的经理，有一天突然被几个不速之客抓走。

经理莫明其妙，后来审讯他时才恍然大悟，他被“内定”为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

由这位经理，开始了“滚雪球”，株连到烤鸭店经理；由烤鸭店经理又株连到湖南饭店经理。结果呢，仅一个饮食行业，便株连上五十九户，逮捕了十几个人，其中被折磨而死的就有五、六个人。

《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从一九六二年始，到一九七九年结束，长达十七年。仅在陕甘宁边区，被诬陷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爪牙”而遭迫害的就达万人之多！

最后，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给受冤屈的人平反，为冤死的人昭雪。

制造出这样一桩骇人听闻的奇冤奇案，在中国酷吏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野火烧不尽的小草

作家李英儒，以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著称于世。

“文革”开始后，李英儒被江青点名。随即以“莫须有”的罪

名，被隔离审查，后来被关押。在李英儒身边，有军队专案组，有奉江青之命的中央二办专案组，有地方文艺团体联合组成的专案组。

对李英儒，大会“煮”，中会批，小会斗，轮番战斗，实施精神摧残。

最初的审讯还算文明。

李英儒被押进一间会议室，主持人斯斯文文拿着一本书。李英儒瞥了一眼就看清了，那是他写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

主持人问：

“这本书是你写的吗？”

李英儒点了点头。

“那好，咱就谈谈这本书的问题。”主持人说，“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你自己，抗战期间，你动摇妥协，进入保定城。后来你——就是主人公吧，就被捕入狱……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你老实交代，先说你是如何进入保定城的吧！”

李英儒解释道，这是文学创作，主人公不是他。小说中虽然有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但确是经过艺术的概括虚构加以构思的。

专案组一听就恼火，文明面具撕掉了，由文“攻”变成了“武攻”。一拥而上，推搡叫骂，长达二个小时。人群有人骂他是“汉奸”，不许回去吃饭，只有原则上承认才能回去。李英儒眼黑头晕，嗓子冒火，滴水难咽。

李英儒如实陈述着，自己的确是受党委派，才去保定的。委派人就是后来的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李英儒心想，

周小舟是“庐山会议”的败将，这一说说说不定又往哪里附会呢！

主持人当然不同意这种诉说。他怒叫道：

“我们认为你不是组织上派去的。你是先和敌人通了气，由敌方接你进入保定城。后来你想和抗日方面联系，敌人得知把你逮捕了，你又叛了党！”

李英儒果断地说：“我从未被俘被捕过！”

主持人摇着头说：

“白纸黑字，有你写的书为证，铁证如山。”并告诉李英儒“你不要再抵赖了，你的同案犯金环银环也正在被审查呢！”

李英儒哭笑不得。如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那么，把小说人物被捕的情节扣到作者头上，不也是一大创新吗？

在其后的三年中，李英儒家多次被抄，大大小小的斗争会，累计有上千次。有时一天好几场。写检查更家常便饭，检查材料页数之多，实在惊人。古人讲写作等身，李英儒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摞起来，差不多等于他1米78的身高了。

斗争他的人卖弄地说：

“坦白地告诉你，你的情况我们每天都向‘她’汇报。”

李英儒清楚，这个“她”就是江青。她握有生杀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时至1969年底，部队和文艺单位的四个专案组，对李英儒加紧斗争。囚禁地也不断地换。每天最少三批三斗，从早晨到深夜，中午也不休息。李英儒想，自己的问题将要发生变化了。只要给个结论就行，那怕边塞充军，比这无休无止的批斗强多了。他已经50多岁了，家被抄多次，“造反派”碎门破壁砸

玻璃，全家被打伤，亲人被逼死。他只希望解除幽禁，当一名老百姓，自食其力，割柴捡粪也行。

1970年，已经夜深人静了，估计已经午夜，忽听开电门的声音。囚室亮了，进来几个穿警服的警察。警察问过姓名，立即命令他穿上衣服，跟他们走。

“到哪里去？”

“不许问。”

李英儒穿好衣服，什么也不让带，跟着走了。

李英儒被带上警车，坐在前边的警察回头盯着他说：“汽车要穿行北京市，不许你说话，更不许喊叫！”说完，熄灭了车内的灯。

经过长时间的急驰，警车停在依山而建的一座建筑的墙外。不一会儿，李英儒被拽下警车，拉进一间室内登记。并进行搜身，衣兜里的烟被扣留，钢笔手表全部没收。然后被领着，穿过深深的长巷，真感到是从阳世间朝阴间地狱走去。最后在夜色中眼前出现一幢两层楼房，几排狭小的窗棂，黑森森的如同怪兽。

这就是秦城高级监狱。

李英儒被带进楼内，来到一间囚室。他看见门口挂着的牌号：7003。

李英儒被关进囚室。这时铁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从巴掌大的小方孔，露出一张森人的脸。

“从现在起，你已变成犯人，要长期坐牢了。”

“不许说话，不许喊叫！”

“白天可以坐在床头，但不许躺下！”

“夜间睡觉，要脸朝外；我每次拉亮灯，你必须表示回答！”

吓人的声音向他宣布一条条监规。

李英儒的头脑，翁地一声涨大了！“犯人”、“长期坐牢”几句话把他撕裂开来。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李英儒克制住自己，冷静下来，想着往事。

当时，李英儒是“中央文革”文艺组副组长，金敬迈是组长。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曾送过一包材料到文艺组，李英儒曾发誓根本没拆看过。后来才知道，那包材料是江青30年代资料、照片。

就为这，将文艺组江青认为有关的人全部关押。

天理何在？

关你是为封你的嘴；找借口打你、批你、斗你也是为堵你的嘴。将你打成“叛徒”你还能发言吗？谁会相信一个“叛徒”的话呢？

鸡蛋里挑骨头也是“文革”中大行文字狱的一种特殊伎俩。

漫长的囚徒生活，光有决心和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坚韧的毅力和精神，否则长期坚持是不可能的。

时间不长，李英儒身体垮了下来。心脏加上咯血，吐得地上满是血痰。为了生存，为了和江青比谁活过谁，李英儒开始锻炼身体。先在囚室里冲拳，开始只冲20次左右便气喘，后来日渐增到百拳、五百拳、千拳、三千拳，冲完浑身是汗；为了全身运动，他改成跑步。囚室回旋小，跑一圈不到五米。李英儒估算步子，每750步算一华里。他由每天跑8——15华里，后

来跑到30华里，达不到指标不休息。脱下棉裤穿单裤跑，夏天，就穿裤叉打赤脚跑。跑呀，跑呀，一气跑了三个春夏秋冬。

李英儒觉得他用双脚围着地球跑了一圈。

多么坚韧的毅力！

因为他的信念没有泯灭。

他想到了写作。身陷囹圄，他要在狱中写长篇小说。

家人来看他，秘密地给他捎来了纸。

李英儒得到了纸和笔，信心倍增，险恶的环境早忘到九霄云外。

他全身心投入到《女游击队长》的创作中。

1973年冬天，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写完了。当家人来探监时，他将书稿藏在裤裆里。和家人见面时，他急使眼色，全家人会意，妻子、女儿和两个监狱人员交涉，两个儿子用身子遮挡着，李英儒掏出手稿，大儿子飞快装进自己的口袋。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7月的一天，李英儒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但不准回家，又被直接送到河南许昌附近的一个部队农场的分场劳动。

劳动就劳动，比暗无天日的囚室分明是天地之别了。

妻子女儿赶到许昌，与分别8年的李英儒相见。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年头，李英儒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才正式出版，得见天日！

李英儒身陷牢狱，但信念不灭，追求奋斗不止，在当代文学史籍上，该大书一笔。

第五章

“文革”酷吏脸谱

●他光着腓躺在被窝里
“升堂”提审○旦夕难测的“打
手”●他要突破四十个女人的
“大关”○他的身后紧追着愤怒
的冤魂●从“河东”到“河西”

中国古代常把喜施酷刑的官吏称之为“酷吏”。自《史记》以下的封建“正史”，大都列有这类人物的列传。

“酷吏”的存在，直接造成了刑法的酷滥。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旧时的酷吏有形象的描述：书中的主人公老残听说曹州知府王贤是个有名的酷吏，遂沿途查访他的“政绩”，某日来到曹州境内的一处小店，“看柜台里边的人，约有五十多岁光景，就问他：‘……你们王大人好吗？’”那人道：“是个清官！是个好官！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难得有天把空得一个两个的。”……老残道：“那有这么些强盗呢？”那人道：“谁知道呢！”老残道：“恐怕总是冤枉得多吧？”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残道：“听说他随便见着什

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有这话吗？”那人说：“没有！没有！”只是觉得那人一面答话，那脸就渐渐发青，眼眶子就渐渐发红。听到“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这两句的时候，那人眼里已经闹了许多泪，未曾坠下……”

中国是一个“盛产”酷吏的国家。

酷吏无疑都怀揣着一颗魔鬼的心脏！而且，这颗心脏中流淌的血液，不是黑的，就是绿的。黑得尤如乌鸦的羽毛！绿得好似饿狼的眸子！

“文革”中的“酷吏”，其心脏、其血液，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光着腚躺在被窝里升堂提审

在中国，几千年来衡量英雄的标准是：成者王侯，败者寇。

败者做了阶下囚，其沮丧、悲哀、嫉恨、报复是不言而喻的。胜利者成了英雄（王侯），其心态却极难描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黎民百姓几乎不知道禁錮在紫禁城的皇上是怎样施威和生活的。灿烂耀眼的金銮殿、温馨的三宫六院、荣华富贵、美酒佳肴、轻歌曼舞……这庄稼人嘴上眼里的帝王生活图景，可以说是从戏剧舞台上感受到的。

这一切，充满着巨大和不可抗拒的诱惑。

于是，有人终日做着帝王梦。

乱世出英雄。便是做帝王梦的人的一句豪言壮语。

我们不知道他做没做过帝王梦，但他喜遇良机，得以威武光宗耀祖。

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古怪。和他共事

的人都知道他的执拗和别扭。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处事，总喜欢扭着劲儿上。越古怪，越无能，用古怪掩盖无能。如果不是突然刮起“文化革命”旋风，他也许永远是他。真是乱世出英雄，“文化革命”狂风骤起，他一下子成了M县的风云人物。

豺狼只有急红了眼才能看出其凶残。

他的生活环境、他的血液里、他的耳濡目染，全是在污秽中铸就的。一九六六年初，M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就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

他沉默不语为的是窥测时机，大展宏图。

这个时机，魔幻般降临了。

不用细致描述他造反起家的发迹史。从他登上“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起，在清查“国民党”的台风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确是“功勋卓著”。不然那“三代会”二号人物的头衔怎能戴在他的头上？请看一帮造反弟兄对他的肉麻吹捧：

他病了，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道——

“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革命需要他好好休息。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多么威严！多么风光！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他父亲说：

“别让他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简直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

“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是祖上的阴德，祖上的风水，上可耀祖，下可流芳。进不了紫禁城坐天下，当个“土皇上”，也是一方霸主，唾沫能淹死人，跺脚也能地动山摇。

古老的浅薄和卑微，将流寇一样的草头王视若光耀祖宗的招牌，不也是一种传统的悲哀吗？

在县里，他那一身军便装在当时是最时髦的。要权有权，要物有物，说整谁就整谁，他施尽威风，出尽风头，“土皇上”不可一世的权欲享受他已经完全领略。可梦中的帝王生活是怎样的呢？他急不可耐地想尝试一下。他终究按照自己的想象找到了一种渲泄的办法。

他抛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

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炕上一下子躺了六天不起。

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唤随到的侍者。

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想问他爹，你有过这种享受吗？旧社会村里的地主在炕上躺过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但心里有言不尽的满足和舒坦。这一切都不用问，因为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陌生、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五村，祖宗八辈都没他这份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

组”抓获的“国民党”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王八盒子”，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

一声叱喝，“国民党”就浑身哆嗦。

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这威风凛凛的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三班衙役，恭候助威，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大衙、督察院、金銮殿，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欲念中的帝王梦，就不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真情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一声叱喝，“犯人”被押走了。

活生生的现实。

他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

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

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

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的场面。经他描绘，画面是这样的：他穿着洗过几水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方桌旁边的太师圈椅原来是给他老爹准备的，他老爷子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村革委会主任在另一侧直立恭候，他上穿件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红宝书”袋巴掌大小，红背带却极长，挎在肩上，颇与今天时髦女郎挎的高级背包相似，只是色彩全红。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

今天的年轻人看罢这段描述文字，一定忍不住发笑，这不伦不类的装扮既粗俗又滑稽。

他声嘶力竭地讲着，唾沫星子满天飞。虽然现已无人能完整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

他激情满怀地讲着。

老爷子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

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不敢把那些严厉的话往心里记。

这场面，这气势，也许是他的梦，也许是他老爷子的梦。两代人的梦重合了，虽然它比不上紫禁城内帝王的显赫、气魄，但心理上同样得到满足后的平衡。紫禁城的帝王残忍，他也残忍；紫禁城的帝王狂妄，他也狂妄；紫禁城的帝王是真龙天子，他也是贵人下凡。

传统的小农思想，浅薄的农民意识，为这种残忍、狂妄、光宗耀祖提供了可卑的温床，“乱世”一到，它便滋生蔓延，溢出祸水，殃及百姓。

梦必是梦，“乱世”结束了，梦也如同肥皂泡，虽然也放射出过五彩光芒，但旋即便破灭了……

○旦夕难测的“打手”

时间：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七月×日下午。

地点：××公社办公室。

天气异常闷热，似乎要下场大雨了。公社革委会核心组的七名成员围坐在大方桌前，刚吃完三个大西瓜，听核心组长、原公社武装部长大黑脸传达县上关于抓“小爬虫”行动的部署精神。桌子上乱扔着被啃的豁豁牙牙的瓜皮和从不同嘴里吐出来的带着粘汁的瓜籽，一片狼籍。南北对过的两个窗户大开着，外面不时地传进几声“知了”的尖叫。

“这回的抓‘小爬虫’的行动，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的一次关键性的决定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大黑脸嘴里喷着唾沫星，极尽全力地讲着。他讲话爱带“的”字，并且每个“的”字都用力很大，语调很重，因而“的”字是他讲话时唾沫星发射的集中点。

“这回的行动，主要的就是为了纯洁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造反派队伍，坚决的彻底的干净的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小爬虫’！”

核心组的成员们，听出了组长讲话的火药味，个个捋臂磨拳、捶胸顿足。

“坚决跟着黑大哥，揪出睡在我们造反派身边的小爬虫！”核心组副组长、第一成员“打头炮”率先发言。他历次行动总是紧跟着大黑脸，打头炮往前冲，所以被人叫起了这么个名儿。他刚才多吃了几块西瓜，这会儿正憋尿，但一听大黑脸讲有这样重大的行动，便忍着尿打响了头一炮，并决心坚持到底。

“对，小爬虫不揪出来，我们造反派的红色政权就有变色的危险。”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核心组成员紧接着发了言。

“小爬虫妄想叫咱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贫代会代表也抢着表了态。

.....

众核心小组成员很快便异口同声地形成了决议：

“坚决把小爬虫揪出来，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办公室里一片沸腾，大有开水溢出锅外之势。这声音和气势冲出南北两个大窗户，在公社大院的上空回荡。立即，公社大院里的造反派们闻声而动，迅速全副武装（上身着草绿服，手持大木棒，腰束宽皮带、塑料带、布带、麻绳等）围聚到办公室的窗户周围，并且陆续不断地有公社街上的造反派和部分狂热的群众也围聚而来。

核心组长大黑脸显然心情非常激动，他满面通紫地提高了嗓门，大声讲道：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这回，县革委的核心组里就揪出了三个小爬虫，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造反派的又一伟大的胜利！”

顿时，室内外一齐呼喊起来：“热烈庆祝无产阶级造反派

的又一伟大胜利!”

“坚决打倒小爬虫!”

……

“但是，”大黑脸用力地挥动了半天双手，才使大家平静了下来。“我们公社的小爬虫还没有揪出来！根据县上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的指示精神，我们公社的小爬虫就在革委会的核心组内！”

大黑脸停住了话头，目光威严地在从核心组成员的脸上扫了一遍，本来就很黑的脸上显得更加阴森逼人。

这咄咄逼人的目光，使众核心组成员不寒而栗，他们一个个相互观望着有点傻了眼，头上大汗小汗地冒了出来。办公室内外霎时一片可怕的寂静。

大黑脸到底是颇有搞运动经验的老手，他立刻用眼神示意“打头炮”发言。

“打头炮”是公社里的头号“职业打手”。每次公社里揪斗“牛鬼蛇神”，都是他“打头炮”，不仅首当其冲，而且下手最狠最毒。他独自发明了无数酷刑方法，仅在他手中惨死的人命就有数条。

“打头炮”自然心领神会，可无奈他尿憋得厉害，几乎就要撒到裤裆里了，很是难受。但也只好忍耐着坚持再打头炮了。那么，打谁呢？他脑子里极迅速地转着圈，小爬虫既然在核心组里，就不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最好是位置仅次于自己的第三、四把手。按说第三把手、负责理论宣传的核心组成员最适合，这小子狗屁用不顶，光会胡扯蛋，可这家伙的老婆长得太鲜嫩了，况且刚和自己沾上关系，那滋味还没尝够……不

看僧面看佛面，暂且饶了这小子吧！那第四把手、贫代会代表也是个饭桶，可这小子他四姨的公公爹是县上的贫代会主任，得罪了他，以后……真他娘的，随便找一个算了……坏了，要尿……

“打头炮”提着裤子就往外跑。

外边，红了眼的造反派和狂热的群众正心急火燎地等着抓小爬虫，久等没有结果，便喊起了口号：

“小爬虫滚出来！”

“小爬虫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

“打头炮”被尿憋得急头急脸地跑出来，正好被外边的造反派和群众当成了小爬虫，大家蜂涌而上，将其按住，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就有两名彪形大汉将其拎了起来，拖往公社的小礼堂。

十几分钟以后，大黑脸和公社革委会核心组的其他五名成员端坐在公社小礼堂的主席台上，主持了全公社揪斗反革命小爬虫——“打头炮”的大会。大黑脸首先对造反派群众揪出了钻进核心组、担任要职的小爬虫“打头炮”这一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历数了“打头炮”伪装积极、蒙蔽群众、篡党夺权的一系列险恶用心。负责理论宣传的核心组成员和贫代会代表分别愤怒地揭批了打头炮妄图改变红色政权颜色和妄图让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的滔天罪行。核心组所有成员一一上阵，台下的造反派积极分子个个上台，把“打头炮”批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人也上台去，打了“打头炮”两个耳光，并声泪俱下地揭发打头炮企图调戏她这位核

心组成员的家属。此时的“打头炮”被那两个彪形大汉反拧着胳膊站在台前，头和腰弯成了九十度，两条裤腿湿淋淋的，散发出一股尿臊味，令人煞是厌恶。

当晚，“打头炮”可怜巴巴地站在核心组长大黑脸的家门口，痛哭流涕地诉说冤情：

“黑大哥，我可是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您干的呀！下午多吃了几块西瓜，急着撒尿，叫他们一帮瞎眼的给捉了小爬虫，您可得为我作主啊！”

“作个屁！你小子撒尿也不看个时候，活该。”

“啪”的一声，核心组长的家门关上了。

“文革”中的许多“打手”都是这样，今天夜里还在耀武扬威地“大打出手”，明日早晨可能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另外比他还革命的“打手”送上“绞架”。

●他要突破四十个女人的“大关”

“文革”中的许多“酷吏”不仅靠着淫威垒砌着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且，还不时地在私下里将他们色迷迷的眼睛扫视在异性同胞的身上，为了泄欲，他们不惜以官相诱，以刑相逼，要尽阴谋、使尽暗算……

西王庄，是个中等村子，最大的优势不言而喻：离县城近。西王庄，住进了县里派下来的“工作队”。

“工作队”队长姓耿，我们且隐其真名，就叫耿××吧。

耿××“文革”前只是个银行营业员，由于“造反”有功，已成为县革委政治部宣传组组长，真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他

时时想象着描绘着自己未来的光明前途。

来到西王庄，他凭借手中的权力，首先改组了大队领导班子。拿掉视为“软散”的班子，换上一个雷厉风行的班子，这个班子，其码是最“忠于”他的。这个内涵，是不可外传的，只能心领神会。

耿××住着三间落成没几年的砖瓦房，院子很大，显得有些空旷、荒凉。

这几年的闯荡，他也摸透了政界升迁的秘密。经验教训都有。要想出人头第，必须先出名。而出名的最佳途径是“爆冷门”。“冷门”选准了，又“爆”得恰到好处，真真假假干上一场，就会名扬四海，就会名成功就。

“耿队长，吃饭了吧？”

一声轻柔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开开门，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

“啊，是小曹呀！”

进来的是曹××，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黑红的脸盘上，长着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黑眼珠一转，蛮有神哩。半尺长的小辫在脑后甩来甩去，满利索精神。

耿队长住的三间瓦房，就是曹××三叔几年前盖的，一直没住人。所以耿队长对小曹是很熟悉了。

在西王庄，曹××也是崇拜耿队长的青年之一。在曹××眼里，耿××简直是神。你看人家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连个稿都不拿，报上、书上都能解得开。人家不光是党员干部，还是个大组长呢！全县大组长有几个？况且人家又是个正的，真有两把刷子。耿××说话和气，很注意培养年轻人，尤其对女青

年,更是重视,村上整风骨干一半以上全是闺女家。成立宣传队那天,人家耿队长把全村的闺女都找来了,一个一个地挑,见了闺女们嘻嘻哈哈地,没一点架子。曹××知道,有啥为难事,耿队长准会热心帮忙的。

“小曹,找我有事吗?”耿队长客气地问道。

曹××脸一红,说:“没啥大事。”

昨天晚上,村宣传队活动完已经很晚了,曹××回到家,娘还没睡,在等她商量婚姻大事呢!……

“耿队长,他……他家老催俺……”

“催啥?”耿××知道曹××已经有了婆家,风传快要典礼了。

“催俺……催俺……”

“呵,催你结婚是不是?”耿队长大大方方将问题挑明了。

“他要再催俺,俺就把那三块布料退给他,俺正想跟他吹哩!”

耿××听后,脑子里立刻闪出个光彩的题目来:退彩礼!

对耿××来说,曹××提供给他的这件小事太重要了,几千年的旧观念,何时才能与之彻底“决裂”?这“退彩礼”不就是“决裂”的具体化吗?他高兴起来,欣喜地说:

“小曹,你想退彩礼,真是太好了!这可是反潮流精神,咱们西王庄要干出件大事了!”

曹××从没见过耿队长这么高兴过,不解地笑了笑,返身回家了。

耿××从县里叫来最“硬”的笔杆子,以曹××的名义,写

了篇《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文章，让曹××看过后，立即派人送往报社。

耿××事先嘱咐过曹××，将来有人问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你就说是你“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千万记住！

几天之后，×报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刊登了J县西王庄贫农女社员曹××的来信。内容是她如何冲破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顶着各种讽刺、挖苦，退了彩礼……

真是雷厉风行。两天之后，团地委、地区妇联发出联合通知，号召全区的共青团员、青年、妇女向曹××学习，争做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派。

曹××的名子立即引起极大震动！有人说：“嘿，别看西王庄盐碱地里不长苗，‘卫星’放得可不低呀！”

耿××如愿以偿，“爆”了个冷门。

曹××一下子成了大红人，红得发紫。三天两头，她被请去做报告，地委、县委的大门，过去连见也没见过，现在经常出出进进的，公社那个“小衙门”更是如走平地。

那天，曹××又坐上“小蛤蟆”车外出了。她伸手一摸，嘿，这车座比自家衣裳包袱还喧呼呢！突然，一个阴影又袭上心头：我这不是弄虚做假骗人吗？我算啥与旧观念决裂的闯将？可是，又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那是耿队长亲切的话语：“这不叫骗人，这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形式。以前我抓的几个典型都是这么成名的。其实，全国各地的各种典型全是这么一夜之间就红起来的！”

她很兴奋，自己身边全是书记、主任、部长……人家全是老干部，都这么热情接待自己，夸讲自己；每每做过报告，台下

便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怎么能说是骗人呢？

不，这全是“真”的。

她心安理得，感到十分满足。一个种地的大闺女，能有今天，全是沾耿队长的光呀！

耿队长，那可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

现在，曹××全身的每根神经都似乎膨胀起来，充满了“革命”的朝气，她牢记各级领导的嘱咐，琢磨着别的“闯将”们的先进经验，她决心继续“前进”，拿出新的成绩向耿队长汇报。

耿队长对她的“培养”的速度也在加快。

这天，曹××要举行入团宣誓了。

大队办公室四壁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批判文章。耿队长亲自出席到会。

耿队长坐在中间，四周是又说又笑的男女青年。谁知他坐下刚喝了两口水，便捂着肚子哼了几声。青年们知道，耿队长爱肚子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曹××一见就急了，说：

“唉，耿队长没明没夜为咱们，都累出病了，这可咋办？”

一伙年轻人也搓手捏拳，无计可施。

曹××突然想起耿队长曾对她说过，战争年代，在战场上，一个女护士为革命的胜利，给受伤的首长脱裤子洗伤口……想到这儿，曹××让另一位闺女过来，两个人一起给耿队长揉起肚子来。

两双热乎乎又软又细的小手，在耿队长肚子上揉搓起来，不重不轻、不快不慢，耿队长起先还一个劲地哼哼，揉了一会

儿便不哼了。只有他心里明白，两个大闺女摸得他浑身痒痒的，麻麻的，简直要酥了。

“好了，就这样吧，比刚才强多了。”还是耿队长说了话，两个姑娘才从耿队长怀里把手取出来。

在这庄严神圣的入团宣誓之前，谁也没有去过多的考虑这个情节还有什么弦外之意。

宣誓结束了，大家刚把拳头放下来，只见耿队长脸一黑，严肃地说：

“团员同志们，今天是你门入团的头一天，是党考验你们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敢不敢冲锋陷阵的关键时刻。现在把混入党内的坏蛋朱××和张××揪出来，狠斗猛批，批倒批臭！”

耿队长话音刚落，几个刚入团的青年蹭地一声，窜出办公室，不一会儿，便将朱××和张××揪来了。

朱××和张××二人都是原村党支部的委员。

此时此刻，“阶级斗争”的弦已经被耿队长拧得紧绷绷的，一伙热血青年的血沸腾了！曹××见耿队长一使眼色，扑上去就在两个“坏蛋”身上拧起来，紧接着，拳头象雨点般落下来。

两个“坏蛋”被无缘无故收拾了一顿，已是鼻青脸肿。不知谁喊了一声：“用电灯烤！”

“好，好主意！”耿队长一边夸赞着。

出主意的人马上将二百度的灯泡拉过来，放到紧挨两个“坏蛋”头皮的地方。

曹××只觉得一股“醋”意袭上心头，埋怨自己太笨，怎么就想不起这整人的法儿呢？她急中生智，举起拳头，喊了句“革

命”口号：“打倒朱××！”

一声喊，众人应，办公室被口号声震得嗡嗡直响。“打倒张××！”

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两个“坏蛋”已被烤得眼花缭乱，小飞虫助纣为虐，直往眼里、耳朵里、鼻孔里乱钻，还不许动弹，一动就是不老实，就得挨揍。批判结束后，耿队长对两个“坏蛋”说：

“你俩要是胆量，就到县里去告我。我在县革委可是大红人。弄不好给你俩头上发顶帽子，这辈子就彻底交代了！哈哈！”

耿队长乐了。曹××经受了新的“革命”洗礼。

耿队长果真“爆”出了“冷门”。

西王庄出名了。一个出名的地方，必然会推出一位“出名人物”，而这个“名人”反过来能将这个地方的名气扬的更高更远。西王庄出名，因为有了“革命闯将”曹××。

耿队长成了慧眼识宝的珠宝商。

这时，耿队长正躺在西王庄他的临时“公馆”的床上，美滋滋地吸烟呢！

他清楚，这“公馆”虽无门卫，但绝对安静，无论谁找他，进院就得先喊：“耿队长在吗？”这是规矩，谁敢私闯“禁地”？

他张开嘴，吐出个烟圈，又吐出一个，他在心里默数着：三个，五个……十个……二十……四十……烟雾将他团团裹住，他真有点飘飘欲仙了。

要知道，四十个，可不是烟圈，是被他玩弄过的女人。

啊，再憋一把劲，就能突破四十大关了！

他原是当年“联合兵团”的政委，后来又学了实权，宣传组管学习，头一个不就是个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吗？她找他要像章，他收藏的像章多着呢！他给了她像章，满足了她；她反过来也满足了他的情欲。

后来是谁呢？记得好象是在招待所开什么座谈会。大伙正热烈发言，他将她叫到另一间小屋，说有个事要说说。进得门，他趁关门之机将门栓插上了。她不敢喊叫，隔壁就在开会、传扬出去自己的家不就完了吗？丈夫、孩子……就站在门后边，他玩弄了她。

他常下乡跑，结识不少姑娘，谁不想飞出农村，去谋个挣钱不出力的活呢！不少姑娘求他，他量入而行，有的帮，有的不帮，那就看能否满足他的需要了。

现在，西王庄这个小“阎将”，不已经是自己掌中之物了吗？

“耿队长，大晌午也不歇会儿？”说着话，曹××已经推门进来了。看得出她来这“禁地”比过去随便得多。

“共产党员，就得拼命为党多拉几年套。”耿队长说着，坐了起来。

耿队长这句话，到勾起曹××的心事，好几天了，她想没说不好意思开口，刚入了团又想攀高枝呢！现在，她顺着耿队长的话，将心事托了出来。

“还是当个党员好。耿队长，你看俺够不够入党条件？”

“是啊，年轻人是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耿队长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小“阎将”啊，你离开我耿×，就一事无成。

“那咋个靠拢法？”

“先写申请呀！”

“俺不会写。”曹××害羞起来。

“我帮你写。”耿××说，“小曹，你呀事事都离不开我。”

耿队长拿出稿纸，摊在桌子上。他让曹××坐下来，说：“我说你写，这才算你自己写的。”

曹××坐下来，拿起钢笔，在稿纸上写下头一行：入党申请书

突然，她的手被身后的耿队长猛地攥住了。

她一时不知所措。

他的心咚咚直跳。这手又软又绵，多诱人呀！但理智告诉他，欲速则不达。他很快平静下来，笑着说：

“小曹，我摸你这手，你天生是个坐办公室的料，在农村是屈材，屈了你这双手啊！好好干吧，等有机会，我介绍你出去当工人！”

曹××也平静下来：“真的？”

“我啥时骗过人？”耿队长沉下脸说。

讨论曹××入党，耿队长费了不少心思。他怕党员不举手，一个一个做“工作”。村里通过后，公社党委又有人不同意，耿队长请来上级“头头”打招呼，又亲自出马，公社党委开了四次会才定下来。

曹××入党了。没几天，又被任命为村革委会主任。

真是一步一层天，比坐飞机还升得快。

这天，耿队长到曹××家吃派饭。

曹××的娘是个农家妇女，对闺女这一阵子的所做所为，

心里直犯嘀咕，可又说不出什么。但一想到闺女有出息，将来还能出去上班，就从心里感激起耿队长来了。

她支起鏊子，抱来麦秸烧火烙饼。在当时的农村，吃饼，炒鸡蛋也算好饭了。

“闺女，你陪耿队长屋里喝水吧！我一个人忙就行。”

屋里，只剩下耿队长和曹主任。

突然，耿队长的肚子又疼开了。他克制着，不敢大声吭出声。曹主任已见到不止一回。她说：“是凉着了吧？喝口热水就会好的。”

“不，不用，你，你给我揉揉就行！”耿队长说道。

“行！”曹××说着，撩起耿队长的衣襟，在他肚子上轻轻地揉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耿队长的裤带已经松开了。他哼哼着：“小曹，这一揉好多了，真舒服，哎，下边，下边还疼，往下点揉！”

她的手稍为向下滑动了一下。

“对，哎，再往下，病根在下边，再往下点……”

她的手又往下揉去。突然，她的手象被蜇了一下，“刷”地抽了出来，脸蓦地红了，心怦怦慌跳着。

他必是情场老手，就在曹××手拿出来的当儿，他一双强有力的臂膀将曹主任紧紧抱住。没等曹主任反应过来，他的手已从她的衣襟下伸了进去，嘻笑着说：“礼尚往来，让俺也帮你揉揉肚呀！”

“不，别，耿队长，俺娘……”

“不怕，她正烙饼呢！”耿队长说着，那只有力的手已经敏捷地伸到隐秘处去了。

“不，不，不要这样，不要……”

被欲火烧烤的耿队长已经完全从精神上制服了这位“女闯将”。他知道，她不敢呼叫的。

“我要把一切幸福带给你……”耿队长说着，已将她按倒在炕沿上。他强制她初尝人生禁果。

事毕，他整好衣服说：“小曹，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女孩，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将来的一切也全由我去安排。今天的事你宣扬出去也不怕，我最多丢了官写份检查了事，你呢？一个闺女家，一辈子就完了！”

耿队长一席话，将曹××一下子击垮了！如同一只羔羊，任人去宰割吧！

老娘已经做好饭，笑盈盈地端进了屋。屋里早雨住风平。老太太说：

“耿队长，饿坏了吧！农村没啥好吃的，凑和点吧！”

耿队长大嚼大吃起来。

曹××第一次觉得，娘做的饭一点滋味也没有。

一个工作队队长，一个村革委会主任，不论白天，黑夜，经常在一起，已经是名正言顺了，谁还去怀疑什么呢？晚上开会，开各种会，还要研究工作；白天，检查生产，视察社员在地里干活情况。

俗话说，决堤的渠水，是不好堵的。有了第一回，不愁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是需要、是变态？她竟离不开他了。

晚上开过会，在村巷找个树荫，两个心灵被扭曲的男女便偷情一回；

白天去地里转悠，青纱帐里，也成了他们淫乱的场所……

这天，天气太热，两个人去地里检查完社员干活，浑身已经汗津津了。天热，两人欲火更热，已经到了要爆炸的地步。他们急切切往回赶，想赶回“禁地”小屋，美美享受一遭。

谁知天下巧事太多，决非笔者杜撰。

耿队长的钥匙找不着了。来到“禁地”门口，进不了屋。

窗户下，房子的主人不知啥时垒起个鸡窝，眼下无人喂鸡，正闲着。

两个被欲火烧得失去理智的男女，在鸡窝边上退去裤子，在鸡窝上摆开了“肉搏”大战。

他们战得酣畅淋漓。

巧事又出现了。隔壁一位老太太近几天喂的鸡老是丢蛋。这时，她颠着小脚，越过早已坍塌的土墙头，到工作队队长住的“大院”找鸡。鸡没找着，却看见了鸡窝上的“肉搏战”。

耿队长没有发现有人在背后看见了这场“戏”；曹主任却看得很清楚，是谁看见这令人羞愧无地自容的一幕！

事后，耿队长安慰曹主任：“别怕，谁敢诬陷工作队，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谁敢诬蔑村革委会，就是攻击‘红色政权’！”

耿队长估计对了，在西王庄，的确有位年轻人，早注意上他们了。

这个青年姓刘，叫刘××

对工作队在西王庄的所做所为，刘××早就看不惯了。一次开批判会，他在外边偷偷往会场扔土坷拉，被“暗探”抓住。

耿队长和曹主任派人将他捆起来，一顿毒打，以“破坏革命”为名，满街游斗。他娘找到工作队，磕头求饶。天正下雨，耿队长在屋里玩扑克，不理他娘。老人走不敢走，动不敢动，整整在雨地里淋了一晌。最后，耿队长玩烦了，才大叫一声：“滚走吧！”

老娘站起来，揉揉麻木的腿，转身刚要走，耿队长又叫：“滚回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将老人折腾了三遍。回到家，老人大哭了一场。

刘××换了斗争方式。他四处搜集情况，准备写成材料上告。村里一位被罢了官的支委找着他说：“孩子，你这么干是捅马蜂窝，要吃亏的！”

“我不怕！”刘××说。

经过调查摸底，刘××抓住了耿队长在西王庄留下的罪恶：

捆绑吊打干部二十多人；将原支委当“四类分子”批斗；大年初一，将原支委朱××、张××扫地出门，把刚一岁的孩子从窗户扔到院里雪地上；

虚报农业产量，明明每亩产四百斤，上报的是六百斤；

与曹××乱搞男女关系，另外还和七、八个女青年有不正当关系，其中二人打胎……

耿队长怕什么？上上下下全是昔日“造反”起家的哥儿们。

刘××的上告信寄上去了，一连几个月，杳无音讯。他并不知道，那封揭发耿××、曹××的信，已经一级一级转下来，转到了耿××、曹××手里。

有人要摸老虎屁股了，那还了得！

上告信，攥在耿××手里，可他摸不清是谁写的。他先在村里划圈子，找出重点人。第一个将下台支委赵××扣起来，十七天不许回家；又将张××、董××扣起来，拳棍相加，逼他们承认写“黑信”。最后，矛头对准了刘××。

经过严密的布署，定下突击审讯刘××的日子。

天刚亮，刘××还在地里忙乎着。昨晚浇了一夜地，浑身被露水打湿了，还溅了不少泥点子。

他正准备收拾收拾回家，地头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刘××，跟我走一趟！”

“干啥？”

“到大队就知道了。少罗嗦！”

不由分说，刘××被带到大队一间小屋。曹主任正半仰半躺在床上，几个横眉鼠眼的人立在一旁。刘××进屋后，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照事先分工由民兵连长主审。

“刘××，咱村形势咋样？”

“不赖。”

“那为啥有人说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办不利于团结的事？”

“不知道。”

曹主任一拍桌子，大吼：

“不老实，站起来！”

大队“贫农协会”副主任肖××猛扑上去，掐住刘××的脖子说：“别装鸡巴洋蒜啦，说，信是你写的吗？”

“……。”

“不说，拿绳子来！”

几个壮汉三下两下便将刘××捆了起来。刘××想，我写信全是实事，承认了又咋着。他说：

“是我写的。”

“谁叫你写的？后台是谁？”曹主任一边逼问着。

“我自己要写的。”

“胡说！村革委会是一级政府，你敢随便诬蔑！”

一阵拳打脚踢，刘××倒在地上，不住地呻吟着。

经过商量，认为一下也问不出头绪，社员正在下工，留下两个民兵看守，其它人回家吃饭，下午接着审讯。

说真心话，曹主任当“阎将”可以，审人不行，况且审刘××，心里太怕，太虚；但不审又不行。必须先压住这“黑信”，才能保住她和耿队长。

下午，她推说组织理论学习，交给别人去审讯刘××。一开始，刘××还是那句话，自己要写的。

他被吊在梁上。棍棒、皮鞭死劲抽来。他惨叫着，衣服全扯破了。

打一阵，审一阵，最后从梁上放下来，命他写交代。

他干了一夜活，又审了一天，肚里又饥又渴，此刻更是象着了火似地，想讨口水喝。

“水，我渴……”

肖××看看刘××那干渴的样子，心想，干脆要了这小子命算了，你爹当干部时，还批评我倒卖银元呢！这年头乱烘烘的，死个穷社员，谁管？他照准刘××耳根，又是重重的两拳。刘××只觉疼痛难忍，“啊呀！啊呀！”惨叫着。

肖××趁人不备，找来小半杯“一六〇五”剧毒农药，兑上

水，正巧刘××昏迷中一个劲喊渴：“水，水……水……”

肖××将水递过去，刘××接过，一气喝了个底朝天。肖××见刘××已经喝下肚，马上让民兵押着刘××送他回家。

刘××进门就扑在娘怀里，吃力地叫着：“娘啊，我活不成了，我……”话没说完，便被押送的民兵呵斥住了。

这时，药性发作了，刘××只觉得五脏六腑好象着了火一样，眼前金花飞溅。他使足了力气，喊了一声：“娘啊！”说罢，一头栽倒在地下。

这时，肖××赶来，拽住刘××两只脚就往门外拖，边拖边骂：“他妈的，真会装！”骂罢，朝刘××肚子上猛踢几脚。

刘××最后睁睛看了娘一眼，那微弱的目光里充满了仇恨和冤屈。

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孩子死了，最痛的是娘！

娘知道儿子是好孩子，知道孩子是屈死的，冤枉啊！

第二天，老娘亲找来排子车，拉上孩子的尸体，到县城鸣冤。她走一步喊一声：“冤枉啊！老天爷，你咋不睁眼呀！冤枉啊！……”

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西王庄离县城又近。她拉着孩子尸体转一圈，又返回村里。第二天又拉上尸体出村进城……她记不清几天了，孩子的尸体已经腐坏变质，那又腥又臭的黑水从排车底盘的缝隙流下来，令人目不忍睹！

沿路的人看到这惨景，忙将脸扭过去。老娘亲拉尸游街，感天动地啊！

实在拉不出去了，老人又将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长久地凝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

○他的身后紧追着愤怒的冤魂

李大胡子是H市纺织厂的造反派“头头”，他利用凶残的酷刑，把好几位“牛鬼蛇神”的冤魂送入了地狱。

李大胡子打人的手法非常地狠毒。

他从车间的胶皮传送带上裁割下一段，在上面钉满铁钉，密密麻麻的钉尖全部都露在外面。在归他管辖的“牛棚”中，关押了十多位“牛鬼蛇神”。每天，他都要到“牛棚”中，用他那条独特的“刑具”，抽打“牛鬼蛇神”，对不服气的“牛鬼蛇神”，他还会把他吊上大梁，用钉满铁钉的胶皮带不分头脸地使劲抽打，这种胶皮带打在身上，马上就会鲜血直冒，如果抽打的同时，再用力撕扯，一块块血肉就会沾满这条胶皮带。

李大胡子如此这般地施暴仍不过瘾，他还经常地从车间里找来工业碱面，浸泡溶解在水桶之中，当“牛鬼蛇神”满身上下都皮开肉绽时，就用大毛刷子，蘸着碱水往鲜血直流的伤口上刷抹，美其名曰：“消毒”。

没有受伤的皮肤被碱水浸泡，一般人都受不了，何况是把碱水涂抹在翻着血肉的伤口之上……

李大胡子用这种酷刑接连致死了数人。

一天夜里，他又亲手送一个“走资派”上了西天，将近黎明，他才疲惫不堪地走回到家中。

他衣裳也没脱，就爬到了老婆的身边，“呼呼”地大睡过

去。

天刚亮，他老婆正要起床穿衣，躺在床上的李大胡子突然打了一个寒战，抱起被子就蒙住了头。从被子里传出了他异常惊恐的喊叫：“滚开！滚开！你不要追着我！你不要追着我！”

他老婆搞不清他是怎么了，就用手去扯蒙在李大胡子头上的被子。

这下就更不了得了。

李大胡子死命地揪住被子不松，从被子里传出一阵强过一阵如同杀猪一般的嚎叫。

李大胡子的老婆也吓坏了，衣裳也没顾上穿，就打开房门去叫左邻右舍。

邻居们挤满了李大胡子的房门，有几个青年工人一齐上去，用力才将李大胡子蒙在头上的被子拽下。

李大胡子被迫松开了被子，马上就像子弹出膛一样从床上“射出”，疯了似地向门外跑去。

一伙人跟在李大胡子的身后追赶，李大胡子一边不住地回头张望，一边更加没命般地狂奔。好似身后追赶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要向他索命的小鬼……

人们在市郊的田野上才找到了李大胡子，只见他跪在松软的土地上，用手使劲地向下刨挖着，人们刚一围上，他就把头扎进刚挖出来的小土坑中，而且还没命地用头去拱着土坑……

李大胡子显然是疯了。

只要没有人看管他，他就会去刨地挖墙，

最后，他的十个手指甲全部都挖掉了，手指头也磨烂了，

白花花的手指骨都露在了外面……

人们都说是屈死的冤魂在追杀着他……

●从“河东”到“河西”

梦一样残酷的“乱世”结束了。但留给历史的绳索却是无尽的。

几乎谁都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有首歌就有两句这样的歌词：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按照有种有收的自然规律，种下仇恨就该收到仇恨，得到报应。几千年来，不就延续着这种善恶报应吗？当然，罪恶应受到惩处，善恶应该清算，可如果将这种“报应”再传递到更多的人身上，或者说用近似“株连法”，无休止地“报应”下去，冤仇又何时能了呢？

如果把社会、人生、生活比作一个圆，邪恶和善良都在圆的规迹上追逐，那么，冤与仇就可以周而复始，代代相传！

无休止的“窝里斗”，是几千年民族心态中的一个毒瘤。

一代一代的先人，留给我们贫穷，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嘱咐人复仇的遗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仇不报非君子”、“父帐子还”。

电影《老井》中的村民，为口井世代结冤，酿成一场流血的械斗，触目惊心。老一代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嘱咐子孙：不要忘了这仇，忘了就不是自家的子孙！冤仇一代传一代，一旦暴发就是一场流血惨案！

还是M县“三代会”那位曾经躺在炕上六天六夜提审犯人的二号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他干尽罪恶勾当，民怨沸腾。落实政策文件一下达，他尤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落入法网，关进大狱，得到应有的惩处。

他恶贯满盈，征外了他，冤仇本该了清，其结果并非那么简单。

孤儿寡母涌到他家，又哭又闹。这是痛苦的发泄，悲愤的呼喊，但同时还带着复仇的感情色彩。发泄、呼喊，为的奚落、嘲弄、讥讽，以求心理上的短暂平衡。而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理智完全失控，报复占了上风，于是，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家的门楼砸了。

也许街门楼在那时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坍塌了，门楼岂容它存在？

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孤儿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是胆颤心惊，不敢言语。但内心服气吗？怕谁也说不清楚。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谁还愿与这样的家庭结亲呢？他的儿子早已到了婚配年龄，但无人上门提亲，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增大，无奈，用闺女与人换亲，给儿子换回个媳妇。可过门没多久，他的闺女跑了回来，儿媳妇呢，自然也回了娘家。如果，他爹还是耀武扬威的县级领导，他的儿女能这么悲惨吗？

道士在超度亡灵时，有这么几句唱词：“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亡人的冤和孽，解了生前结，生前所作孽；又解死后冤，死后冤消灭。”

连道士尚且懂得人死冤灭，而常人却不能理解冤有头，债

有主的道理。

何以让他人代人受过？

无休止的“窝里斗”，使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一种怪圈，一种怪圈。

还是发生在这个村里。

专政组长是专政组的头头，揪谁、斗谁、打谁，全得经他的手。这样的人罪孽能轻啦？

几年后他的父亲死了，死在五黄六月。

在穷困的农村，没有冰冻设备，这种时候死了人，搁三天就得出殡下葬。

对与他结下冤仇的人来说，天赐良机。

这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死了老子小三辈。当孝子的见人就得磕头。可眼下磕头不管用了，既没人帮忙，又不让他出丧。

无奈何，他挨门磕头，当然要数说自己的罪孽，哀求宽恕。就这样，第八天头上才允许他出丧，葬埋死人。天又闷又热，尸体散发出一股股呛人的腐臭。

报复是成功的。

复仇者心理上也是平静的。

在另一个村里。也是在几年以后。

一位曾当过“专政组长”的家里正给儿子娶亲。

院子扫得干干净净，鲜红的对子映出满院喜气。亲朋好友挤满了院子。

突然，一个大花圈抬进院子，放在院子中央。

抬花圈的是十几个年轻人。领头的却是位年纪七旬的老者。

事主的心“咯登”一沉，全明白了。这是在报复他呀？煞费心机地选中了这么个日子。“文化大革命”中，老者被关进专政组，罪名是：日本人是他引进中国的。

一个旧社会出苦力的泥腿子，有何神通能把日本人引进中国？一句荒唐言，将老者折磨个半死。他没有忘记祖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后冤仇也不会淡忘，何况没有十年呢！

有人曾问过老者，何苦花二三十块钱去买个大花圈呢？一个工才挣一毛钱呀？三十块，也许就是他一年的劳动收入。

“闹闹丢人呗！这比打他两巴掌还解恨！”

真是人穷志不穷，在“复仇”心理作用下，如此不惜血本！

千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习惯将希冀托付给“青天大老爷”，而没有寄托给法律的习惯，所以在“青天”不能为民伸冤时，便以靠自然的“复仇”来解决问题。就是这种脱离法制的自发“复仇”，使中国人的“窝里斗”愈发变得无休无止。……

结束语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文革”十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但是，对于蒙受着天大灾难的当事人——中国人来说，却好似熬度了十个世纪。“文革”极“左”的滚滚铁轮，无情地辗断了炎黄子孙的脊梁。……

回忆有时是幸福的，有时却是痛苦的。但不能因惧怕痛苦而割断回忆。

当我们回忆这充满灾难、充满血腥的十年，并非是让痛苦成为压迫我们沮丧的包袱，更不是要让我们整日痛苦地泪眼涟涟。而是要让国人认清野兽的人性对民族命运的威胁！让中国人重新续起被“文革”极“左”铁轮辗断的脊梁！让这根脊梁充满钙质！让这根脊梁担起沉重的东方古大陆，走出悲剧！走向夜幕！走向二十一世纪灿烂的文明！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作者除进行大量采访外，还参考如下书目

- 1 林青山《康生外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2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
- 3 新潮文史书系《历史的疯狂》中州古籍出版社
- 4 杨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 5 冯骥才《100 个人的 10 年》江苏文艺出版社
- 6 马格 佩璞 马泰泉《国防部长沉浮记》昆仑出版社
- 7 张占斌 孙建军《“三家村”沉冤》三环出版社
- 8 高捷等《赵树理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 9 文章《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
- 10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